



大会

Distr.: General
3 June 201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八届会议

2016年5月2日至6月10日和

7月4日至8月12日，日内瓦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第三次报告

特别报告员玛丽·雅各布松提交

目录

	页次
一. 该专题一般概述和新情况	2
A. 导言	2
B. 报告的目的	3
C.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2015年)进行的协商	6
D. 大会第七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辩论(2015年)	8
E. 对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的回应	14
二. 适用于冲突后局势的特别相关规则	24
A. 一般性意见	24
B.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惯例	42
C. 法律案件和判决情况	51
D. 战争遗留物	66
三. 结语和今后的工作方案	74
附件	
一.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拟议原则草案	76
二. 选定书目	78



一. 该专题一般概述和新情况

A. 导言^{*}

1. 2013 年，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第六十五届会议上决定将“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并决定任命玛丽·雅各布松为本专题特别报告员(A/68/10，第 131 段)。

2. 本专题于 2011 年列入长期工作方案。本专题的审议于 2012 年第六十四届会议上开始进入非正式协商，并在 2013 年第六十五届会议上继续进行，其间，国际法委员会举行了更多的实质性非正式协商。这些初步协商为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提供了一个就今后的方向进行反思和评论的机会。在 2014 年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交了初步报告(A/CN.4/674 和 Corr.1)，在该报告基础上，国际法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一般性辩论。¹

3. 特别报告员在 2015 年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上提出了第二次报告(A/CN.4/685)。第二次报告的重点是找出对“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问题具有直接相关性的现有规则。委员会在该报告基础上举行了一次一般性辩论，并决定将该报告中所载的原则草案转给起草委员会，但有一项谅解，其中转交的关于“用语”的规定其目的是为了便于讨论，起草委员会在该阶段暂不定夺。²起草委员会研究了原则草案，并暂时通过了一份案文草案，内含关于原则草案范围和宗旨的规定，以及六项原则草案。并未要求国际法委员会就这些原则草案采取行动，因为其提交仅供参考。³国际法委员会注意到起草委员会提出的导言部分规定草案以及各项原则草案。预计，原则草案的评注将在下届会议上审议。⁴

^{*} 特别报告员由衷感谢 Cyrus R. Vance 国际司法中心以及环境方案主任 Susan M. Kath 给予的支持。要特别感谢 Cleary Gottlieb Steen & Hamilton LLP 公司在本报告的研究工作中提供的宝贵协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在日内瓦)的 Henrik Slotte 和 David Jensen 继续为研究工作提供支助，促成了与环境署的协商。特别报告员感谢环境署的 Kron Amanda 为编写本报告提供了具有根本意义的支助，还要感谢比勒陀利亚大学的 Jeanique Pretorius 所作的重要贡献。特别报告员还感谢三位实习生，即 Matilda Lindén、Anna Karlén 和 Julia Taavela 所作的贡献。特别报告员还感谢 Rutgers 大学、即新泽西州立大学的 Cymie R. Payne 教授和环境法研究所的共同主任 Carl Bruch 给予支持及合作，安排了 2015 年 10 月 29 日在纽约举行的关于这一专题的第二次国际研讨会。还要感谢该研讨会的参加者以及随后的非正式智囊团参加者分享其知识和思想，感谢瑞典外交部和纽约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各自的贡献，并感谢北欧同事们的贡献。最后但特别重要的是：要感谢几位图书管理员。没有他们，我们的工作就无法进行，他们是：日内瓦万国宫的 Irina Gerassimova 和 Rachel Forman 以及斯德哥尔摩政府图书馆的人员。

¹ A/69/10，第 192 至 213 段。

² A/70/10，第 133 段。关于这一辩论更全面的介绍，见简要记录 A/CN.4/SR.3227 至 3221。

³ A/CN.4/L.870。

⁴ A/70/10，第 134 段。

4. 本报告摘要概述了 2015 年在国际法委员会中以及在大会第七十届会议(2015 年)第六委员会中进行的辩论。报告还概述了各国对国际法委员会所列特别感兴趣的的具体问题的答复。

B. 报告的目的

5. 本报告的主要重点是确定冲突后局势中适用的规则。⁵ 报告研究与战争遗留物以及其他环境挑战有关的法律问题。还载有关于冲突后措施、获取和分享信息以及冲突后环境评估及审查的提议。然而, 本报告并不严格局限于冲突后阶段。为综览这一专题, 还将讨论防止措施, 因为迄今只提出一项关于这一阶段的原则草案。⁶ 本报告还载有一项关于土著人民权利的原则草案。

6. 因此, 本报告由三节组成。第一节将概述在国际法委员会中进行的协商, 并反映各国在大会第七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中表达的意见。还列有一份关于各国应国际法委员会邀请提交补充资料时所作答复的实质摘要。

7. 第二节讨论在冲突后局势中适用的特别相关的规则。该部分首先介绍一些一般性意见, 包括讨论与该专题特别相关的法律领域, 如环境法具体条约的适用, 以及土著人民权利。其中还有一节专门讨论信息的获得和分享, 包括一般合作义务。

8. 第三节扼要分析这三个阶段迄今所进行的工作。还提出若干关于今后工作方案的建议。

9. 附件载有特别报告员提议的九项额外原则草案。

方法和来源

10. 关于这一专题的研究工作继续采用一个假设前提, 即武装冲突法是特别法。由此可推, 武装冲突法优先于国际法其他规则, 或可能与后者并存。⁷ 为了将讨论限于这一传统的法律假设前提, 特别报告员决定不论述正在进行的关于战后法的学术讨论。关于这一概念的法律-政治讨论范围大于实在法, 且与正义战争理论有明显关联。⁸

⁵ [A/CN.4/685](#), 第 230 和 231 段。

⁶ 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案文见 [A/CN.4/L.870](#)。

⁷ 例如, 见 [A/CN.4/674](#), 第 5 和 6 段。

⁸ 战后法是莱顿大学一个主要学术项目的重点课题, 在其网页上有许多研究材料可供查阅。网址: <http://juspostbellum.com/default.aspx>。另见 Carsten Stahn, Jennifer S. Easterday and Jens Iverson (eds.), *Jus Post Bellum: Mapping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and Carsten Stahn and Jann Kleffner, *Jus Post Bellum: Towards a Law of Transition from Conflict to Peace* (The Hague, T.M.C. Asser Press, 2008)。

11. 本报告不讨论冲突后建设和平所涉更具政治性的层面。若不划定此界限，则本专题将没有终了之时。因此，与重建和机构建设以及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战略和筹资有关的事项被视为超出本专题的范围。⁹

12. 土地管理和水管理是建设和平阶段两个最重要的领域。这两个领域几乎应该单独成为一个议程项目。但若超出敌对行动后紧接着的阶段而讨论这两个事项，就会使本专题离题太远。¹⁰ 本报告不具体论述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水保护问题，因为本报告旨在研究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方面更具一般性的问题。虽然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水保护因此不属于本报告的范围，但它是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或许本身便是一个值得委员会注意的问题。¹¹

1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开展的在受冲突和灾害影响国家加强国家环境管理能力的工作对于理解冲突后措施至关重要。联合国系统和会员国吁请环境署公

⁹ 见 www.un.org/en/peacebuilding/index.asp。

¹⁰ 关于在建设和平阶段土地和水管理方面所面临问题的精辟描述，见 Erika Weinthal, Jessica J. Troell and Mikiyasu Nakayama (eds.), *Water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New York: Earthscan, 2014) and Jon Unruh and Rhodri Williams (eds.), *Land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New York: Earthscan, 2013)。

¹¹ 见 Mara Tignino, “The Right to Water and Sanitation in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Water International* vol. 36 (2011), p. 241; Mara Tignino, “Wate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2, No. 879 (2010), p. 647; Mara Tignino, “L’eau et la guerre: éléments pour un régime juridique (Brussels: Bruylant, 2011); Mara Tignino, “Water Security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in Hans Günter Brauch and others (eds.), *Fac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Environmental, Human, Energy, Food, Health and Water Security Concepts* (Berlin: Springer, 2009), pp. 726-740; Mara Tignino, “Water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in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ed.), *Re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Water Disputes in Papers Emanating from the Sixth PCA International Law Seminar* (8 November, 2002) (The Hague, London, New York: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3), p. 319; Mara Tignino, “The right to water and sanitation in post-conflict legal mechanisms: an emerging regime?” in Erika Weinthal, Jessica J. Troell and Mikiyasu Nakayama (eds.), *Water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New York: Earthscan, 2014), pp. 383-402; Mara Tignino, “Reflections on the legal regime of water during armed confli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Pan-Europ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 The Hague, 9-11 September 2004), available from www.afes-press.de/pdf/Hague/Tignino_LegalRegime_Water.pdf; Gamal Abouali, “Natural resources under occupation: the status of Palestinian water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Pac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10, No. 2 (1998), p. 411; Eyal Benvenisti, “Water conflicts during the occupation in Iraq”,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7 (2003), p. 860; Théo Boutruche, “Le statut de l’eau en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No. 840 (2000) p. 887; ICRC, *Water and War: ICRC Response*, (Geneva: ICRC, July 2009); Nikolai Jorgensen, “The protection of freshwater in armed confli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2 (2007), pp. 57-96; *Water and War: Symposium on Water in Armed Conflicts* (Montreux, 21-23 November 1994) (Geneva: ICRC, 1995); Ameer Zemmali, “The Protection of Water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No. 308 (1995), p. 550; Ameer Zemmali, “The right to water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in Liesbeth Lijnzaad, Johanna Van Sambeek and Bahia Tahziblie (eds.), *Making the Voice of Humanity Heard* (Leiden/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04), p. 307.

正评估武装冲突的环境后果。环境署已多次评估了武装冲突和危机的环境方面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冲突后局势之中。¹²

14. 与以往报告一样，本报告载有关于国家惯例的资料，是在直接从各国收到的资料基础上整理的。各国通过其对国际法委员会所提问题的答复，或通过在大会议第六委员会中就本专题所作发言，提供了这些资料。此外，还通过各国和有关组织官方网站获得资料。上述资料来源是第一手的。虽然这些资料并非面面俱到，但提供了对本专题具有相关性的重要信息。

15. 仍然难以获得在非国际武装冲突方面的国家惯例以及非国家行为体惯例。¹³ 在第二次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因此认为，此种资料即使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国家惯例”，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该报告还提到，国际法委员会 2014 年关于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专题的讨论呈现了国际法委员会内的一个明显倾向，即不把非国家行为体的惯例列为习惯国际法概念的一部分。¹⁴ 特别报告员还指出难以获得非国家行为体惯例的资料。不过，有些同事建议不要因此不研究此类惯例，而应加以考虑。¹⁵ 他们认为，关于在“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专题下不讨论非国家行为体惯例的决定不应影响本专题工作。特别报告员在对辩论的总结中回顾，虽然尝试找出这种惯例，但很难找到。原因是，了解非国家行为体惯例的行为体无法透露所知情况的来源，甚至也无法透露惯例的内容。公开可查的例子很少。¹⁶ 对本报告所依据的资料而言，情况也是如此——虽然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即和平协定。

16. 本报告还有一节专门叙述相关案例法，主要是国际和区域法院的案例法。

17. 在开展工作期间，有些国家和委员提到占领局势中的环境保护。应当指出，占领局势的持续时间可能有很大差异，有的是持续仅数天的短期占领，有的则是持续多年的长期占领。在审议环境保护问题时，长期占领局势尤其具有相关性。许多法院和法庭的决定确认，在环境方面确实已经适用了关于交战方占领期间保护财产的规定。¹⁷ 虽然注意到占领局势对本专题具有相关性，但本报告不具体

¹² 环境署的“环境合作促进建设和平”方案与建设和平之间有着关联，因为该方案一直在帮助联合国系统和会员国了解并应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在冲突和建设和平方面的作用，但在本报告中不会论述这一问题。

¹³ A/CN.4/685，第 8 和 9 段。

¹⁴ 同上，第 8 段。

¹⁵ 例如，见 A/CN.4/SR3265，特拉迪先生的评论。

¹⁶ 见 A/CN.4/SR.3269，特别报告员的发言。

¹⁷ 有许多处理过这一问题的案例。仅举数例，请参看：刚果境内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判决，《200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Prosecutor v. Hermann Wilhelm Göring et al (1 October 1946)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vol. 1; Prosecutor v. E. W. Bohle et al. (19 April 1949)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 10, vol. XIV; Prosecutor v. Mladen Naletilic aka :Tuta”，

论述这一问题，因为本报告旨在仅仅研究冲突后阶段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问题。虽然必须注意到，占领局势确实往往在积极军事行动停止后继续存在，而且可能会对私有财产权利有影响，但占领局势不仅仅局限于武装冲突的冲突后阶段。此外，因违反占领法而进行的补偿可能与因违反诉诸战争权规则而进行的补偿和因违反占领国义务规则而进行的补偿同时相关。这与私有财产权有着密切的相互关联。虽然在本报告中不加直接论述，但在占领局势中的环境保护仍对本专题具有相关性。

18. 对自然资源的法律保护与自然环境的法律保护之间的关联，进行了部分论述，因为各国在第六委员会的发言中以及据报在其国家法律法规中确立了这一关联。

19. 对海洋环境进行了具体论述，因为它带来的法律难点与陆地有所不同。部分原因是海的法律地位，从内水到公海，很繁杂。海洋环境的法律保护实际上很薄弱，对进行合法军事行动(诉诸战争权法)的交战方不能追究其责任，除非其违反了武装冲突法(战时法)。因此，很难援引赔偿责任和国家责任。然而，可能需要采取补救和恢复措施，确保战争残留物(如残留爆炸物和化学物、泄漏的沉船)不会继续破坏海洋环境，不会威胁人类利用环境时的安全。国际合作不可或缺。

20. 如同以往报告，严格限制对文献的直接引用。第二次报告(A/CN.4/685)在附件二中更完整地列出了参考文献清单。将在今后的评注中叙及那些曾为此套法律准则作出过贡献的作者的评论和分析。

C.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七届会议(2015 年)进行的协商

21. 在其第六十七届会议(2015 年)上，委员会在特别报告员提交的第二次报告(A/CN.4/685)基础上举行了一般性辩论。委员会 2015 年报告概述了这一辩论的情况。¹⁸ 下文扼要复述辩论情况，重点是与本报告的范围尤其相关的意见。

22. 委员们普遍重申了这一专题的重要性。一些委员对关于第二次报告侧重于武装冲突法的决定予以了肯定。然而，讨论还围绕另一问题进行：即必须解决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及其他有关条约/法律体系的继续适用问题，并表示，这一研究应基于 2011 年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原则草案。一些委员

Vinko Martinovic aka “Stela” (Trial Judgement), IT-98-34-T, 31 March 2003; *Corrie v. Caterpillar, Inc.*, 403 F. Supp. 2d 1019, 1023-27 (W.D. Wash. 2005) affirmed in 503 F.3d 974 (9th Cir. 2007)。又见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任命的专员小组的报告，载于文件 S/AC.26/2001/16、2002/26、2003/31、2004/16、2004/17 和 2005/10。如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A/CN.4/684，第 74 段)所述，联合王国的军事手册中体现了与占领局势有关的环境因素的相关性，该手册禁止大范围毁坏自然环境，除非有军事必要性的理由。见 United Kingdom, *The Joint Service Manual of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Joint Service Publication 383, 2004 Edition), para. 11.91。可在下列网址查阅：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7874/JSP3832004Edition.pdf。

¹⁸ 见 A/70/10，第 137 至 170 段。关于这一辩论更全面的介绍，见 A/A/CN.4/SR.3264 至 3269。

认为，这一分析对本专题具有核心意义，并表示这有助于避免在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方面出现法律空白。

23. 还讨论了工作方法，一些委员援引非国家行为体的惯例作为一个重要的指导来源，表示对此类惯例应当加以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24. 虽然若干委员认为，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成果若是条款草案，则可能更具相关性，但委员们普遍支持拟订原则草案。关于这些原则的总体结构，委员们基本都认为，这些原则应按三个时间阶段来安排结构，但同时承认要严格划分三个阶段之间的界线并不切实际。具体到原则草案的术语方面，有些委员认为，原则草案应当有标题，且减少绝对化的表述，以“应”代替“须”。还对“环境”和“自然环境”两个用语进行了大量讨论。委员们实质上确认，不论选择那一用语，都必须确保一致。

25. 委员会讨论了本专题范围的限制。与会者广泛支持将非国际武装冲突作为本专题的一部分加以研究。然而，有些委员告诫难以在这方面找到足够的惯例和习惯国际法。对人类环境的不同方面、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区以及与本专题有关的文化方面进行了讨论。虽然有些委员认为，自然资源的开采不直接涉及本专题的范围，但有委员指出，开采及其他与自然资源有关的行动的人权影响可能具有相关性，应予研究。

26. 还有人就序言所述原则草案范围、用语和宗旨，提出了建议。若干委员认为，范围和用语应列入执行部分案文，而不是序言部分，还有数位委员建议，宗旨也应被列入执行部分案文。此外，一些委员认为，“防止和恢复措施”这一用语的限制性过大。

27. 若干委员建议，需要一项关于用语的规定，以澄清原则草案的整体范围。与会者确认，特别报告员尝试概述的对“环境”和“武装冲突”这两个用语的界定，为本专题之目的，将被视为“工作定义”。一些委员认为“环境”这一用语表述在这一上下文中过于宽泛，建议将这一表述局限于与武装冲突局势相关的环境。关于“武装冲突”这一用语的表述，若干委员表示支持，认为其有足够的宽泛性，能够涵盖非国际武装冲突，并指出，此类冲突越来越普遍，环境破坏力越来越大，往往难以规管。委员们还指出，根本不能把针对和平时期局势的文书的术语移用于武装冲突局势。

28. 关于特别报告员拟议的具体原则草案，委员们对环境代表民用或军事目标的可能性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若干委员建议，对该项原则加以修改，以反映出，不可将环境的任何一部分作为攻击目标，除非且直至其成为军事目标。

29. 一些委员支持在案文中提及确保通过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原则和规则进行尽可能强有力的环境保护，而其他委员则告诫不要这样做。在这方面，有委员指

出，环境因素在战时法中和在诉诸战争权法中被认为具有不同的地位。还注意到，在评估相称性和必要性时，应考量环境因素。

30. 虽然禁止对自然环境的报复的规定得到许多委员欢迎和支持，但其他一些委员对其在习惯国际法中的地位提出质疑。

31. 关于设立具有重大生态意义的保护区的建议，委员们设法澄清，指定此类保护区具有何种实际和规范性效力。委员们讨论了单方面声明设立此类保护区可能产生的效力、该原则应否涵盖自然及文化遗址问题以及文化因素在指定此类保护区方面的潜在作用。委员们还提出，可增加一项单独的关于无核武器区的原则草案。委员们表示，关于重大生态意义区的规定应适用于所有三个时间阶段。

32. 为补充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原则，委员们建议列入关于若干主题的原则草案，如列入一些反映禁止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破坏、特定武器、培训和传播要求的特定原则，并考虑特别制度，如土著权利制度。

33. 委员们建议，第三次报告应就国际组织如何有助于对环境予以法律保护以及通过履行合作义务或分享信息保护环境，提出理由和建议。对特别报告员打算在她的第三次报告中讨论占领问题，委员们表示欢迎。总体上，委员们认为，应考虑在何种程度上这一专题的最后工作成果可构成逐渐发展，且有助于拟议法的发展。

34. 若干委员特别欢迎特别报告员打算继续其与区域组织以及环境署、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等国际实体的合作。他们还建议，在第三次报告中载有一份拟议原则草案的提纲，以便利今后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此外，委员们普遍一致认为，各国若能继续提供实例，说明国内和区域法律及案例法，将会有所裨益。

D. 大会第七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辩论(2015 年)

35. 在大会第七十届会议期间，约 35 个国家在国际法委员会 2015 年第六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A/70/10)的基础上讨论了该专题。¹⁹

¹⁹ 奥地利(A/C.6/70/SR.24, 第 66 至 70 段)、白俄罗斯(A/C.6/70/SR.24, 第 15 至 16 段)、中国(A/C.6/70/SR.22, 第 74 段)、克罗地亚(A/C.6/70/SR.24, 第 86 至 89 段)、古巴(A/C.6/70/SR.24, 第 10 段)、捷克共和国(A/C.6/70/SR.24, 第 45 段)、萨尔瓦多(A/C.6/70/SR.24, 第 96 段)、法国(A/C.6/70/SR.20, 第 22 段)、希腊(A/C.6/70/SR.24, 第 2 至 4 段)、印度尼西亚(A/C.6/70/SR.23, 第 30 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2 至 9 段)、以色列(A/C.6/70/SR.25, 第 77 至 78 段)、意大利(A/C.6/70/SR.22, 第 116 至 120 段)、日本(A/C.6/70/SR.25, 第 30 至 31 段)、黎巴嫩(A/C.6/70/SR.24, 第 58 至 60 段)、马来西亚(A/C.6/70/SR.25, 第 47 至 49 段)、墨西哥(A/C.6/70/SR.25, 第 103 段)、荷兰(A/C.6/70/SR.24, 第 28 至 31 段)、新西兰(A/C.6/70/SR.25, 第 101 至 102 段)、挪威(代表北欧五国: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A/C.6/70/SR.23, 第 106 至 107 段)、帕劳(A/C.6/70/SR.25, 第 26 至 28 段)、波兰(A/C.6/70/SR.25, 第 18 至 19 段)、葡萄牙(A/C.6/70/SR.24, 第 78 至 80 段)、大韩民国(A/C.6/70/SR.25, 第 82 段)、新加坡(A/C.6/70/SR.23, 第 121 至 124 段)、斯洛文尼亚(A/C.6/70/SR.24, 第 39 至 41 段)、西班牙(A/C.6/70/SR.25, 第 109 段)、瑞士(A/C.6/70/SR.25, 第 96 至 98 段)、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70/SR.24, 第

36. 一些国家讨论了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 6 项原则草案。4 个国家主要仅就特别报告员最初提议的 5 项原则草案发表评论。²⁰ 有国家指出，原则草案的评注将成为该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该项目将有助于继续分析。²¹

37. 各国提供的大多数发言均强调了这一专题的重要性。²² 有国家称，保护环境被认为是人类的共同关切。²³ 一些国家还特别提出了保护海洋环境的问题。²⁴ 也有国家提出，由于环境为人口服务，保护环境是保护人类健康和促进可持续性的一种重要手段。²⁵

38. 一些国家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采取的临时办法。²⁶ 有一个国家对所选办法的可行性表示怀疑，²⁷ 还有一些国家对该专题方向不确定性表示了关切。²⁸ 有国家指出，委员会应避免处理在武装冲突期间同时适用不同法律体系的问题，²⁹

21 至 22 段)、美利坚合众国(A/C.6/70/SR.25, 第 63 至 68 段)和越南(A/C.6/70/SR.25, 第 40 至 42 段)。可在下列网址查阅发言全文: <https://papersmart.unmeetings.org/ga/sixth/>。不过,本报告仍将遵循国际法委员会惯例,尽可能援引辩论的简要记录。

²⁰ 白俄罗斯(A/C.6/70/SR.24, 第 16 段)、斯洛文尼亚(A/C.6/70/SR.24, 第 40 至 41 段)、意大利(2015 年 11 月 6 日在第七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发言)和马来西亚(2015 年 11 月 11 日在第七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发言)。

²¹ 印度尼西亚(A/C.6/70/SR.23, 第 30 段)、意大利(2015 年 11 月 6 日在第七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发言)、马来西亚(A/C.6/70/SR.25, 第 49 段)和大韩民国(A/C.6/70/SR.25, 第 82 段)。

²² 白俄罗斯(A/C.6/70/SR.24, 第 15 段)、古巴(A/C.6/70/SR.24, 第 10 段)、萨尔瓦多 2015 年 11 月 10 日在第七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发言、印度尼西亚 2015 年 11 月 9 日在第七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发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2 段)、黎巴嫩(A/C.6/70/SR.24, 第 58-59 段)、墨西哥(A/C.6/70/SR.25, 第 103 段)、新西兰(A/C.6/70/SR.25, 第 101 段)、挪威(代表北欧国家)(A/C.6/70/SR.23, 第 106 段)、帕劳(A/C.6/70/SR.25, 第 26 段)、波兰(A/C.6/70/SR.25, 第 18 段)、葡萄牙(A/C.6/70/SR.24, 第 78 段)、斯洛文尼亚(A/C.6/70/SR.24, 第 39 段)。

²³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2 段)、古巴(A/C.6/70/SR.24, 第 101 段)和新西兰(A/C.6/70/SR.25, 第 101 段)。

²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6 至 7 段)、黎巴嫩(A/C.6/70/SR.24, 第 58 段)和帕劳(A/C.6/70/SR.25, 第 28 段)。

²⁵ 以色列 2015 年 11 月 3 日在第七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发言。

²⁶ 萨尔瓦多(A/C.6/70/SR.24, 第 96 段)、意大利(A/C.6/70/SR.22, 第 116 段)和黎巴嫩(A/C.6/70/SR.24, 第 60 段)。

²⁷ 西班牙(A/C.6/70/SR.25, 第 109 段)。

²⁸ 捷克共和国(A/C.6/70/SR.24, 第 45 段)、美国(A/C.6/70/SR.25, 第 63 段)和西班牙(A/C.6/70/SR.25, 第 109 段)。

²⁹ 美国(A/C.6/70/SR.25, 第 64 段)。

委员会应重点分析国际人道主义法如何与环境相关的问题。³⁰ 一些代表团重申了不应试图修订武装冲突法，这一点有重要意义。³¹

39. 有国家提出，可以研究武装冲突对于环境协定的影响以及武装冲突法的特别法性质。³² 一些国家谈到解决武装冲突法和环境法之间的交叉部分，并鼓励特别报告员进一步分析在这方面适用国际环境法的有关规则和原则的情况。³³ 在这方面，各国特别提到 2005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研究中的规则 44、《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第 55 条中规定的关照义务以及环境法规定的不损害规则和预防原则。³⁴ 有一个国家建议应分析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之间的交叉部分，³⁵ 其他国家则提出应警惕将人权问题作为本专题一部分处理会带来影响。³⁶

40. 关于范围，一些国家对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提出了关切。³⁷ 然而，若干国家认为，这两个类别均应该处理。³⁸ 有国家建议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和国际武装冲突之间的差异应体现在该专题方法的制订中。³⁹ 也有国家表示，内部动乱和紧张局势等未达到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程度的局势不应在本专题的范围内处理。⁴⁰

³⁰ 以色列(A/C.6/70/SR.25, 第 77 段)、日本(A/C.6/70/SR.25, 第 30 段)、新加坡(A/C.6/70/SR.23, 第 121 段)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70/SR.24, 第 21 段)。

³¹ 克罗地亚(A/C.6/70/SR.24, 第 86 段)、新加坡(A/C.6/70/SR.23, 第 121 段)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70/SR.24, 第 21 段)。

³² 意大利(A/C.6/70/SR.22, 第 117 段)。

³³ 奥地利(A/C.6/70/SR.24, 第 66 段)、白俄罗斯(A/C.6/70/SR.24, 第 15 段)、克罗地亚(A/C.6/70/SR.24, 第 86 段)、希腊(A/C.6/70/SR.24, 第 2 至 3 段)、意大利(A/C.6/70/SR.22, 第 117 段)、黎巴嫩(A/C.6/70/SR.24, 第 59 段)、波兰(A/C.6/70/SR.25, 第 18 段)和斯洛文尼亚(A/C.6/70/SR.24, 第 39 段)。

³⁴ 意大利(A/C.6/70/SR.24, 第 2 至 3 段)。

³⁵ 意大利(A/C.6/70/SR.22, 第 117 段)。

³⁶ 奥地利(A/C.6/70/SR.24, 第 66 段)、白俄罗斯(A/C.6/70/SR.24, 第 15 段)、新加坡(A/C.6/70/SR.23, 第 121 段)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70/SR.24, 第 21 段)。

³⁷ 中国(A/C.6/70/SR.22, 第 74 段)、大韩民国(A/C.6/70/SR.25, 第 82 段)和越南(A/C.6/70/SR.25, 第 41 段)。

³⁸ 奥地利(A/C.6/70/SR.24, 第 70 段)、克罗地亚(A/C.6/70/SR.24, 第 86 段)、萨尔瓦多(A/C.6/70/SR.24, 第 96 段)、意大利(A/C.6/70/SR.22, 第 118 段)、黎巴嫩(A/C.6/70/SR.24, 第 60 段)、新西兰(A/C.6/70/SR.25, 第 101 段)、葡萄牙(A/C.6/70/SR.24, 第 78 至 79 段)、斯洛文尼亚(A/C.6/70/SR.24, 第 40 段)和瑞士(A/C.6/70/SR.25, 第 98 段)。

³⁹ 法国(A/C.6/70/SR.20, 第 22 段)。

⁴⁰ 克罗地亚(A/C.6/70/SR.24, 第 86 段)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70/SR.24, 第 22 段)。

41. 各国对于是否和如何处理文化遗产和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地区⁴¹ 以及自然资源⁴² 表示了各种不同看法。一些国家建议, 特定武器和此类武器的环境影响应在本专题范围内处理,⁴³ 而其他一些国家则提出应将这一主题排除在外。⁴⁴ 一些国家明确强调必须处理使用核武器的后果问题。⁴⁵ 有国家强调, 重建工作、有毒战争遗留物和贫化铀⁴⁶ 是该专题的重要方面。⁴⁷ 有国家认为, 原则草案中提到的区别、相称、军事必要性和攻击中的预防措施等规则和原则与该专题关系尤其密切。⁴⁸ 有国家指出, 应当考察保护环境和军事必要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原则的实际适用。⁴⁹

42. 此外, 有国家提出, 可以审议环境损害的不同阈值的问题。⁵⁰ 有国家特别提到与可持续发展和有关条约的联系。⁵¹ 也有国家提出, 原则草案应当探讨部署武器的环境影响评估⁵² 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的必要性。⁵³ 此外, 还有国家表示, 虽然原则草案应侧重于一般规则 and 标准, 但评注也应探讨一些受管制的作战方法, 如使用燃烧武器, 或攻击含危险力量的工事或设施。⁵⁴

43. 各国对原则草案中使用“自然环境”⁵⁵ 和“环境”⁵⁶ 这两个用语表达了不同倾向。一些国家表示没有倾向, 而只是指出, 为了一致性, 应当二者择一并连

⁴¹ 克罗地亚(A/C.6/70/SR.24, 第 87 段)、以色列(A/C.6/70/SR.25, 第 77 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8 段)、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70/SR.24, 第 22 段)和美国(A/C.6/70/SR.25, 第 66 段)。

⁴² 以色列(A/C.6/70/SR.25, 第 77 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9 段)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70/SR.24, 第 22 段)。

⁴³ 奥地利(A/C.6/70/SR.24, 第 67 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2 和 3 段)和墨西哥(A/C.6/70/SR.25, 第 103 段)。

⁴⁴ 以色列(A/C.6/70/SR.25, 第 77 段)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70/SR.24, 第 22 段)。

⁴⁵ 奥地利(A/C.6/70/SR.24, 第 67 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3 段)和墨西哥(A/C.6/70/SR.25, 第 103 段)。

⁴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3 段)。

⁴⁷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5 段)和越南(A/C.6/70/SR.25, 第 42 段)。

⁴⁸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2 段)、墨西哥(A/C.6/70/SR.25, 第 103 段)和挪威(代表北欧国家)(A/C.6/70/SR.23, 第 106 段)。

⁴⁹ 荷兰(A/C.6/70/SR.24, 第 29 段)。

⁵⁰ 希腊(A/C.6/70/SR.24, 第 3 段)。

⁵¹ 黎巴嫩(A/C.6/70/SR.24, 第 59 段)和帕劳(A/C.6/70/SR.25, 第 26 段)。

⁵² 越南(A/C.6/70/SR.25, 第 40 段)。

⁵³ 帕劳(A/C.6/70/SR.25, 第 28 段)。

⁵⁴ 希腊(A/C.6/70/SR.24, 第 4 段)。

⁵⁵ 大韩民国(A/C.6/70/SR.25, 第 82 段)和美利坚合众国(A/C.6/70/SR.25, 第 68 段)。

⁵⁶ 意大利(A/C.6/70/SR.22, 第 118 段)。

贯一致地适用。⁵⁷ 有国家认为，不可能仅仅将一项处理和平局势的文书内的定义或规定照搬到武装冲突局势中，反之亦然。⁵⁸ 还有国家指出，必须确保所选择的定义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和国际环境法。⁵⁹

44. 关于“武装冲突”这一用语，一些国家提议利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的现有定义，⁶⁰ 但也有国家提出目前应保留工作定义。⁶¹ 还有国家表示，界定该用语会使委员会的工作复杂化，并固化其定义和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相关门槛，从而可能在无意中减少在武装冲突中对自然环境的保护。⁶² 还有国家建议委员会像 2001 年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第 2 条一样，增加一项单独的条款，其中包括各种用语的定义。⁶³

45. 关于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原则草案，⁶⁴ 一些国家认为，这些草案总体上措辞太绝对，而且超出了他们认为反映习惯国际法的范围。⁶⁵ 还有国家表示，不妨增列一项关于各国有义务通过国家立法措施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原则草案，这可能是一项重要的新内容。⁶⁶

46. 有几个国家强调，定义防止措施⁶⁷ 和补救措施⁶⁸ 很重要，也有必要这样做。有国家建议，防止措施和补救措施均应在评注中加以界定。⁶⁹ 此外，一些国家提出冲突后阶段的赔偿和补偿问题。⁷⁰ 还有国家提到了合作的必要性⁷¹ 以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⁷²

⁵⁷ 法国(A/C.6/70/SR.20, 第 22 段)和黎巴嫩(A/C.6/70/SR.24, 第 60 段)。

⁵⁸ 萨尔瓦多(A/C.6/70/SR.24, 第 96 段)和马来西亚(A/C.6/70/SR.25, 第 48 段)。

⁵⁹ 墨西哥(A/C.6/70/SR.25, 第 103 段)。

⁶⁰ 奥地利(A/C.6/70/SR.24, 第 66 段)和克罗地亚(A/C.6/70/SR.24, 第 87 段)。

⁶¹ 新西兰(A/C.6/70/SR.25, 第 101 段)。

⁶² 荷兰(A/C.6/70/SR.24, 第 28 段)。

⁶³ 希腊 2015 年 11 月 10 日在第七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发言。

⁶⁴ A/70/10, 脚注 378。

⁶⁵ 以色列(A/C.6/70/SR.25, 第 77 段)、新加坡(A/C.6/70/SR.23, 第 122 段)、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70/SR.24, 第 21 段)和美国(A/C.6/70/SR.25, 第 63 段)。

⁶⁶ 克罗地亚(A/C.6/70/SR.24, 第 89 段)。

⁶⁷ 希腊(A/C.6/70/SR.24, 第 3 段)、斯洛文尼亚(A/C.6/70/SR.24, 第 40 段)、越南(A/C.6/70/SR.25, 第 40-42 段)和大韩民国(A/C.6/70/SR.25, 第 82 段)。

⁶⁸ 希腊(A/C.6/70/SR.24, 第 3 段)、黎巴嫩(A/C.6/70/SR.24, 第 60 段)、大韩民国(A/C.6/70/SR.25, 第 82 段)和越南(A/C.6/70/SR.25, 第 40 至 42 段)。

⁶⁹ 希腊(A/C.6/70/SR.24, 第 3 段)。

⁷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5 段)、新西兰(A/C.6/70/SR.25, 第 102 段)和越南(A/C.6/70/SR.25, 第 42 段)。

⁷¹ 帕劳(A/C.6/70/SR.25, 第 27 段)。

⁷² 帕劳(A/C.6/70/SR.25, 第 27 段); 大会第 69/15 号决议, 附件。

47. 若干国家讨论了原则草案二-1, 其中有几个国家特别强调, 环境不应被列为民用性质⁷³ 或民用物体。⁷⁴

48. 一些国家表示支持审查原则草案二-2 和二-3 处理的问题,⁷⁵ 也有国家认为这些原则可以合并, 并把重点放在武装冲突法对环境的适用问题上。⁷⁶ 此外, 一些国家要求进一步澄清并提供起草建议, 包括关于“环境因素”一词的实际适用的建议。⁷⁷

49. 有几个国家支持将关于禁止报复的原则草案二-4 纳入,⁷⁸ 一些国家认为此类禁止在习惯国际法下的地位不确定, 或是此类地位尚未确立。⁷⁹

50. 许多国家提到了保护区问题。一些国家认为, 保护这些地区是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⁸⁰ 一些国家质疑对这种地区的可能性质和其设立依据的法律渊源,⁸¹ 以及保护区与非军事区等国际法相关制度设立的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⁸² 还有国家表示关切的是, 原则草案二-5 规定保护区应具有重大

⁷³ 荷兰(A/C.6/70/SR.24, 第 30 段)、斯洛文尼亚(A/C.6/70/SR.24, 第 40 至 41 段)和克罗地亚(A/C.6/70/SR.24, 第 88 段)。

⁷⁴ 白俄罗斯(A/C.6/70/SR.24, 第 16 段)、萨尔瓦多(A/C.6/70/SR.24, 第 96 段)、荷兰(A/C.6/70/SR.24, 第 30 段)、斯洛文尼亚(A/C.6/70/SR.24, 第 40 至 41 段)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70/SR.24, 第 21 段)。

⁷⁵ 挪威(代表北欧国家)(A/C.6/70/SR.23, 第 107 段), 2015 年 11 月 6 日在第七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发言。

⁷⁶ 奥地利 2015 年 11 月 10 日在第七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发言。

⁷⁷ 以色列(A/C.6/70/SR.25, 第 78 段)、荷兰(A/C.6/70/SR.24, 第 29 段)和美国(A/C.6/70/SR.25, 第 68 段)。

⁷⁸ 奥地利(A/C.6/70/SR.24, 第 70 段)、意大利(A/C.6/70/SR.22, 第 120 段)、挪威(代表北欧国家)(A/C.6/70/SR.23, 第 107 段)、新西兰(A/C.6/70/SR.25, 第 102 段)和瑞士(A/C.6/70/SR.25, 第 97 段)。

⁷⁹ 以色列(A/C.6/70/SR.25, 第 78 段)、意大利(A/C.6/70/SR.22, 第 100 段)、新加坡(A/C.6/70/SR.23, 第 122 段)、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70/SR.24, 第 21 段)和美国(A/C.6/70/SR.25, 第 63 段)。

⁸⁰ 白俄罗斯(A/C.6/70/SR.24, 第 16 段)、克罗地亚(A/C.6/70/SR.24, 第 88 段)、萨尔瓦多(A/C.6/70/SR.24, 第 97 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4 段)、意大利(A/C.6/70/SR.22, 第 120 段)、黎巴嫩(A/C.6/70/SR.24, 第 60 段)、挪威(代表北欧国家)(A/C.6/70/SR.23, 第 107 段)、新加坡(A/C.6/70/SR.23, 第 123 段)和瑞士(A/C.6/70/SR.25, 第 98 段)。

⁸¹ 日本(A/C.6/70/SR.25, 第 31 段)和黎巴嫩(A/C.6/70/SR.24, 第 60 段)。

⁸² 奥地利(A/C.6/70/SR.24, 第 68 段)、克罗地亚(A/C.6/70/SR.24, 第 88 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4 段)、意大利 2015 年 11 月 6 日在第七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声明、新加坡(A/C.6/70/SR.23, 第 123 段)、瑞士(A/C.6/70/SR.25, 第 98 段)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70/SR.24, 第 21 段)。

环境和文化意义，因而可能削弱原则草案二-1 提供的保护。⁸³ 有些国家试图澄清指定受保护区会对第三国产生的影响，并澄清协定的非缔约国将不受其约束。⁸⁴ 各国就此类地区中是否应包括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地区发表了不同意见。⁸⁵

51. 虽然一些国家倾向于依旧采用原则或准则草案作为工作成果的形式，⁸⁶ 但也有国家提出条款草案或结论草案可能更适当。⁸⁷ 也有国家认为，目前的形式应不妨碍今后可能采用不同的形式。⁸⁸ 一些国家只是提到“原则草案”，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评论。还有国家指出，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章程第 1 条，这一专题可能具备一个重要的“逐渐发展”要素。⁸⁹

52. 在辩论期间，一些国家举例说明了立法、案例法和军事手册等形式的国家和区域惯例。⁹⁰ 它们还介绍了自己经历的武装冲突的环境后果。⁹¹ 特别报告员一如既往感谢这些有益的评论，并鼓励其他国家为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提供这种国家惯例的实例。

E. 对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的回应

53. 在其关于第六十七届会议工作的报告中，委员会按照惯例要求提供资料，回答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⁹² 该请求部分重复了第六十六届会议报告中所载请求。⁹³ 委员会还希望“各国提供资料，说明它们是否有旨在在武装

⁸³ 荷兰(A/C.6/70/SR.24, 第 31 段)。

⁸⁴ 奥地利 2015 年 11 月 10 日在第七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发言和美国(A/C.6/70/SR.25, 第 65 和 66 段)。

⁸⁵ 意大利(A/C.6/70/SR.22, 第 120 段)和美国(A/C.6/70/SR.25, 第 66 段)。

⁸⁶ 荷兰(A/C.6/70/SR.24, 第 28 段)、新加坡(A/C.6/70/SR.23, 第 124 段)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70/SR.24, 第 21 段)。

⁸⁷ 波兰(A/C.6/70/SR.25, 第 19 段)。

⁸⁸ 意大利(A/C.6/70/SR.22, 第 116 段)。

⁸⁹ 白俄罗斯(A/C.6/70/SR.24, 第 16 段)和葡萄牙(A/C.6/70/SR.24, 第 78 段)。

⁹⁰ 克罗地亚(A/C.6/70/SR.24, 第 89 段)、古巴(A/C.6/70/SR.24, 第 10 段)、捷克共和国(A/C.6/70/SR.24, 第 45 段)、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4 段)、黎巴嫩(A/C.6/70/SR.24, 第 59 段)、新西兰(A/C.6/70/SR.25, 第 102 段)和帕劳(A/C.6/70/SR.25, 第 27 段)。

⁹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70/SR.25, 第 7 段)、黎巴嫩(A/C.6/70/SR.24, 第 58 段)和帕劳(A/C.6/70/SR.25, 第 26 段)。

⁹² A/70/10, 第 25 和 27 段。

⁹³ 同上, 第 27 段:“委员会很希望各国提供资料, 说明在它们的实践中, 在涉及国际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时, 国际或国内环境法是否被解释为适用。委员会特别希望收到下列方面的实例:

- (a) 条约, 包括有关的区域或双边条约;
- (b) 与本专题有关的国内法律, 包括执行区域或双边条约的国内法律;

冲突背景下保护环境的文书”，包括但不限于：“国家法律和规章；在国际行动期间适用的军事手册、标准操作程序、接战规则或部队地位协定；以及涉及防卫相关活动的环境管理政策”。⁹⁴ 委员会强调，它对涉及预防和补救措施的文书特别感兴趣。⁹⁵

54. 下列国家对委员会的请求做出了回应：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荷兰、黎巴嫩、巴拉圭、斯洛文尼亚、瑞士、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55.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交了一份内容广泛的实质性材料，其中强调了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指出，组成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数百个岛屿曾长期作为战场和军事活动集结地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尤其如此。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土地和海洋上到处丢弃着军用船只和飞机残骸以及数量庞大的武器和未爆弹药。例如，丘克州泻湖一个只有 65 公里宽的区域内有 60 艘军用船只残骸，而且这些沉船内仍有大量石油，据报已开始泄漏。另一个例子是乌利西环礁的一艘军用船只泄漏的石油进入环礁周围的水中，“造成数百万美元的环境损害并破坏了乌利西居民的海洋食物供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对本专题表示出浓厚兴趣。⁹⁶

56.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支持特别报告员采用的时间阶段划分办法，并指出交战方根据国际法承担的有关保护环境的潜在和实际义务涵盖了特别报告员指出的全部三个阶段。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认为武装冲突不是在真空中出现的，一场冲突的规划往往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损害，而且冲突后阶段通常也不会完全没有对环境的影响。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体上支持“武装冲突”和“环境”的工作定义。关于武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可接受特别报告员目前倾向于不侧重于具体武器，但有一项谅解，即委员会对该专题的审议涵盖“任何和所有类型可能被用于武装冲突的武器”。⁹⁷

57. 此外，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极力强调委员会必须审议保护环境与维护文化遗产特别是土著人民的文化遗产之间的联系。具体而言，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土著人口

(c) 对涉及武装冲突的争端适用国际或国内环境法的判例法。”

2015 年下列国家提交了资料：奥地利、比利时、古巴、捷克共和国、芬兰、德国、秘鲁、大韩民国、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见 A/CN.4/685，第 29 至 60 段)。

⁹⁴ A/70/10，第 28 段。

⁹⁵ 同上。

⁹⁶ 2016 年 1 月 29 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第 1 段。

⁹⁷ 同上，第 2 至 4 段。

认为，环境和文化完整之间的关联很重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出，“交战方有法律义务确保它们保护那些依赖环境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遗产和习俗。”⁹⁸

58.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缔结了一些相关多边和区域公约，包括《日内瓦四公约第一议定书》。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完全赞同第 35 条和第 55 条中规定的禁止事项，并认为“根据国际法，为获得军事好处而蓄意破坏自然环境是一种令人憎恶的总体战，在人口依赖自然环境维生的情况下尤其如此。”⁹⁹

59.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加入了一些“(至少间接地)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裁军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由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环境的义务包括多个时间段，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认为试验、扩散和部署上述文书所涵盖的武器是违反这些义务的行为。¹⁰⁰

60.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列举了其缔结的一些国际和区域条约，并认为这些条约直接或间接适用于武装冲突。这些条约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6 年《保护南太平洋区域自然资源和环境公约》(《努美阿公约》)及其两项议定书：《防止倾倒废物污染南太平洋议定书》和《合作抗治南太平洋区域紧急污染事故的议定书》；1989 年《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巴塞尔公约》)；1992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3 年《建立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公约》；1995 年《禁止向论坛岛屿国家输入有害和放射性废物并管制有害废物在南太平洋区域境内越境转移和管理的公约》(《瓦伊加尼公约》)和 2001 年《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¹⁰¹

61.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解释了其关于一些有关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海洋环境的国际规则和原则的立场，包括关于危险废物的立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认为，《巴塞尔公约》缔约方的军事活动产生的“危险废物”必须遵守《公约》的义务和条件，不论该废物产生在武装敌对行动之前、期间，还是之后。¹⁰² 此外，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出，《瓦伊加尼公约》应被理解为适用于军事活动和敌对行动之前、期间和之后军用船只和军事活动排入《公约》覆盖地区的危险废物的管理。

62.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引述《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三条所载最核心原则之一，即其缔约国有责任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致对其他国家或其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引起损害”。这项不损害原则适用于武装冲突，包括在

⁹⁸ 同上，第 5 段。

⁹⁹ 同上，第 7 段。

¹⁰⁰ 同上，第 8 段。

¹⁰¹ 同上，第 9 段。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在第 10 段中强调了“适当顾及”规则的重要性。

¹⁰²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举了一例，即带有保存完好的易燃燃料储存的退役待拆解军舰。见第 11 段。

实际军事敌对行动酝酿阶段和敌对行动结束之后。可以通过指定保护区，在保护区里采取特别保护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来实施这项原则。在发生武装冲突后，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可重建和恢复因冲突而退化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a)条应解释为包含了保护特别可能发生武装冲突和敌对行动的地区的可能性。¹⁰³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还指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规定不应影响缔约方根据其他国际协定承担的现有权利和义务，除非根据第 22 条，“行使这些权利和义务将严重破坏或威胁生物多样性”。这一优先次序在武装冲突的所有三个阶段一直存在，包括在实际敌对行动的酝酿阶段和结束之后。

63. 关于《紧急污染事故议定书》，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认为，该议定书“适用于军舰和军事活动在《公约》地区造成的污染事故，不论是在实际军事敌对行动之前、期间，还是之后”。¹⁰⁴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强调涉及相互援助和作业措施的议定书的规定十分重要，因为这些规定涉及到更广泛的赔偿和补救措施。

64. 此外，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认为，《努美阿公约》规定的合作和防止、减少和控制船只造成的污染的义务适用于军舰在《公约》覆盖地区排放污染物。这些规定适用于军事敌对行动之前、期间和之后，且包括《公约》覆盖地区的紧急污染事故。关于《努美阿公约》，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还提出，设立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的协定缔约方有义务通过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秘书处开展工作，以处理在《协定》覆盖地区开展军事活动造成的任何环境影响。这些行动包括但不限于采取措施管理和防止军舰排放产生的不同类型的环境污染。目前，该秘书处正在制定一项“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船舶造成的海洋污染的区域战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指出了国际合作在这方面的重要性。

65.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在提交的材料中指出，《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规定的义务被认为在武装冲突的所有时间阶段都对其缔约方适用。因此，参加武装冲突的《公约》缔约方在武装冲突期间不得生产或使用任何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用于有限和豁免目的及用途的除外。此外，使用这类污染物时必须采取保护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的环境无害化方式。¹⁰⁵

66.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到了 1992 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和《萨摩亚途径》等国际宣言和其他高级别成果。后两份文件中的有关段落“大力鼓励(甚至

¹⁰³ 见《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a)条，其中规定应建立保护区系统或需要采取特殊措施以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地区。

¹⁰⁴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普通照会，前注 96，第 15 段。

¹⁰⁵ 同上，第 13 段。

要求)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沉船的船旗国开展双边合作，应对这些船只泄油流入受影响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海洋及沿海环境问题。”¹⁰⁶

67. 根据《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环境保护法》(最初在 1982 年通过，2012 年修订为当前版本)，虽然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就某些军事活动作出的努力(例如对军舰造成的环境破坏寻求民事救济)可能面临一些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不能采取步骤，确保其涉及武装冲突的外交行动不会有损该国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指出，即使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不得就某些军舰造成的环境破坏寻求民事救济，但“根据国际法，这些船只的船旗国/所属国仍然有义务处理这些船只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造成的环境破坏。”¹⁰⁷

68.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详细解释了 1986 年与美利坚合众国签订的所谓《自由联系条约》(在 2003 年作了修订)。¹⁰⁸ 《条约》规定，美国有义务捍卫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及其人民，使之免受攻击或攻击威胁，还规定，也可以选择根据《条约》所提到的单独一份协定所规定的条件，建立和使用军事区域及设施。¹⁰⁹ 《条约》规定，美国可以为履行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领土的责任而开展必要的行动。双方签订了《部队地位协定》，对美国的活动作出进一步规定。《协定》规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能够就美国武装部队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开展的国防和安全活动，向美国寻求损害赔偿和其他赔偿。《部队地位协定》还规定，“这种索赔仅限于对美国武装部队‘非战斗活动’的索赔。”¹¹⁰ 这种索赔“可以说适用于为筹备实际战斗行动而开展的和/或在这些行动之后开展的军事活动，特别是(但不限于)涉及美国武装部队的飞机、船只和车辆的活动”。¹¹¹

69. 在管控美国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使用、储存、处置和移动放射性、有毒化学品以及生物武器和材料方面，《条约》的措辞十分严谨，“试图在美国的军事安全和防卫目标以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公众的健康与安全方面取得平衡”。¹¹²

70.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在呈件中阐述了《美国公法第 92-32 号》(《密克罗尼西亚索赔法》)，其中规定了对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内的太平洋岛屿居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不久所遭受损失的补偿。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认为，该法“构成

¹⁰⁶ 同上，第 19 段。

¹⁰⁷ 同上，第 30 段。

¹⁰⁸ 同上，第 20 至 30 段。

¹⁰⁹ 同上，第 20 段。

¹¹⁰ 同上，第 23 段。

¹¹¹ 同上。

¹¹² 同上，第 27 段。

关于补偿武装冲突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影响的国家惯例。”¹¹³ 美国提供特准赔偿，但与此同时，所作补偿“旨在帮助美国履行其‘作为[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管理当局对密克罗尼西亚人民福利的责任’，而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敌对行动的后果影响长久难消，这是美国于理于法应负的责任(但这不同于为战争破坏提供赔偿的法律补偿)”。¹¹⁴ 即便美国根据该法对这些破坏进行补偿是出于履行为托管领土居民提供福利的行政责任，而非出于赔偿战争破坏的法律义务，但是，“该补偿仍将构成一种法律义务，尽管这是提供的补偿是行政性质的，而且该补偿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敌对行动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有关。”¹¹⁵

荷兰

71. 荷兰在呈件中表示，它没有加入任何关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的区域或双边条约。¹¹⁶

72. 荷兰的部分国内法律与本专题具有相关性。原则上，任何关于环境保护的国内法也适用于其武装部队，但在适用时允许例外。¹¹⁷ 例如，《环境管理法》“阐述了荷兰环境管理综合办法，并对国家政府、省或区政府以及市政府的作用作出界定，提供了法律框架”。¹¹⁸ 然而，该法第 9.2.1.5 条还规定了适用的例外情况：如果是出于国防利益，那么该法所规定的一些禁令和义务允许例外。不过，这类例外只能通过立法或敕令作出。¹¹⁹ 《环境管理法》是唯一一部专门提到武装冲突局势的荷兰全国性环境保护法律。¹²⁰ 《环境管理法》第 17 2 篇规定，“若出现环境破坏或面临环境破坏的紧迫威胁，则应采取特定措施”，第 17.8(a)(1)条规定，“该篇不适用于因战争行为、敌对行动、内战或叛乱造成的环境破坏或环境破坏的紧迫威胁”。¹²¹

73. 此外，荷兰指出，“在国际武装冲突中，明知攻击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且就预期的具体、直接的整体军事优势而言这种破坏显然会过度，却仍然故意发动这种攻击”的行为在荷兰刑法中属于犯罪。¹²²

¹¹³ 同上，第 31 段。

¹¹⁴ 同上。

¹¹⁵ 同上，第 32 段。

¹¹⁶ 2016 年 4 月 20 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第 1 段。

¹¹⁷ 同上，第 2 段。

¹¹⁸ 同上。

¹¹⁹ 同上。

¹²⁰ 同上。

¹²¹ 同上。

¹²² 同上，第 3 段(见《国际罪行法》(Wet Internationale misdrijven)第 5(5)(b)条)。

74. 目前没有关于荷兰法院对涉及武装冲突的争端适用环境法的案例法。¹²³

75. 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文书，荷兰指出，其武装部队使用的许多文件都提到了环境保护问题。所有军事人员使用的荷兰军事手册以及军事学院使用的军事法手册都将环境列为武装冲突期间的受保护要素之一。¹²⁴ “国际人道主义法手册”是一份相关文书，因为它详细讨论了环境保护问题。¹²⁵

76. 在确定新的武器或作战手段或方法是否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即《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36 条时，也考虑到了环境因素。¹²⁶

77. 最后，荷兰没有加入任何规定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问题的部队地位协定，并认为国际人道主义法背景下的环境保护问题不适合成为这类条约的主题。¹²⁷

黎巴嫩

78. 黎巴嫩呈件包含 5 个附件，其中 4 个直接涉及“黎巴嫩海岸的浮油”问题。此外，黎巴嫩指出，它是《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化学武器公约》和《集束弹药公约》的缔约国。黎巴嫩还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它认为第 192 和 194(2)条尤其具有相关性。黎巴嫩政府 2007 年通过了国家地雷行动政策，根据这项政策，黎巴嫩政府“应对这些装置产生的人道主义、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应按照国际标准和排雷行动最佳做法，迅速和高效地消除这些装置对黎巴嫩造成的影响”。

79. 黎巴嫩提供的文件表明：以色列空军 2006 年炸毁吉耶发电厂的储油罐导致海上溢油以后，联合国若干机构以及其他国际、区域和国家组织参与评估了溢油事件的影响。¹²⁸ 溢油包括流入地中海的约 15 000 吨燃油，污染了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约 150 公里的海岸线。¹²⁹ 从第六十一届会议开始，大会每年就“黎巴嫩海岸的浮油”问题通过决议。¹³⁰

¹²³ 同上，第 4 段。

¹²⁴ 同上，第 5 段。

¹²⁵ 同上。荷兰指出，这是一本通用手册，“侧重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特定规则，而非防止和补救措施”。

¹²⁶ 同上。

¹²⁷ 同上。

¹²⁸ 大会第 69/212 号决议，第 4 和第 5 段。

¹²⁹ A/69/313，第 4 段。

¹³⁰ 2016 年 1 月 29 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80. 若干决议和其后秘书长的报告都提到了安全理事会第 692(1991)号决议所设联合国赔偿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在这方面，有人建议参考一些索赔案件，为计量和量化浮油损失及确定应付补偿额提供指导。¹³¹

81. 大会第 68/206 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敦促各联合国机关和机构为计量和量化黎巴嫩和其他邻国遭受的环境损害开展进一步研究。¹³² 为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委托开展了一项研究。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银行、环境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国际和国家机构过去开展的研究为计量和量化溢油对黎巴嫩造成的环境损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¹³³ 该研究报告于 2014 年 8 月发布，指出溢油造成的环境损害达到 8.564 亿美元(截至 2014 年年中)。¹³⁴

82. 秘书长在黎巴嫩呈件附件三提到的 2015 年秘书长(关于该专题的)报告中指出：“除了秘书长已向大会提交的关于受浮油影响地区环境影响评估的相应报告，就黎巴嫩及其邻国遭受的环境影响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调查结果”。¹³⁵ 在这方面，报告还指出，环境署“表示，通过对环境影响的进一步研究以了解更多情况，其科学可行性有限”。¹³⁶ 然而，开发署 2014 年报告表明，“应开展定期调查，并就新发现的生态损害提出有关报告”。¹³⁷

83. 黎巴嫩提供的文件还提到大会第 69/212 号决议，其中指出：“浮油严重污染了黎巴嫩海岸并污染了叙利亚部分海岸，对黎巴嫩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渔业和旅游业及人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从而严重影响该国的生计和经济”。¹³⁸

巴拉圭

84. 巴拉圭指出，它是《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的缔约国，并在 1990 年通过第 28 号法将该文书纳入国内法。¹³⁹ 为此特别提到了禁止可能对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损害的各类作战手段和方法的规定以及禁止作为报复而对自然环境进行攻击的规定。国防委员会 1999 年 10 月 7 日通过的国家军事防御

¹³¹ 例如，见大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第 67/201 号决议，第 6 和第 7 段；2011 年 12 月 22 日第 66/192 号决议，第 6 段；A/68/544，第 18 和第 19 段。

¹³² 大会 2013 年 12 月 20 日第 68/206 号决议，第 5 段。

¹³³ 黎巴嫩的普通照会，前注 130；另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计量和量化溢油对黎巴嫩造成的环境损害的报告，2014 年 7 月，第 44 段。

¹³⁴ 同上，第 46 段。

¹³⁵ A/70/291，第 6 段。

¹³⁶ 同上。

¹³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注 133，第 45 段。

¹³⁸ 大会第 69/212 号决议，第 3 段。

¹³⁹ 2016 年 1 月 19 日巴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白皮书”载有与该专题有关的若干规定，包括确保保护和养护环境的义务。改善环境保护被专门列为实现总体国防目标的途径之一。¹⁴⁰ 此外，《巴拉圭宪法》第 8 条规定，环境是国家需要维护的最重要国家利益之一。此外，“白皮书”中有一节专门介绍环境控制，概述了保护环境的义务。

瑞士

85. 瑞士是《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其 3 项附加议定书和《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改变环境技术公约》)的缔约国。瑞士还确认了习惯国际法规定的、特别是与国际人道主义法有关的义务。它欢迎委员会就此专题开展的工作，这有助于加强武装冲突中的环境保护。瑞士指出，应按照国家人道主义法为民用物体提供的保护，给予环境同样的保护。国际人道主义法提供了一个宝贵基础，拟订新的具体保护制度时应予以充分体现。对于国际环境法的适用性，瑞士认为国际环境法条约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适用。瑞士鼓励委员会在评注中纳入对适用法律的思考，并指出委员会的任务包括逐步发展国际法。

86. 保护国内环境的一般义务源于 1983 年《联邦环境保护法》。¹⁴¹ 该法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诸多重要主题，即危险物质的防护、废物管理和受污染地点的补救。这部框架法规定了基本规则，至于具体标准或要求等更详细的规定，可查阅关于各分专题的具体法令和相关材料。在武装冲突局势中，该法在原则上仍然适用，应遵守其规定。此外，一些特定法律规定了环境保护的其他方面，例如保护水、¹⁴² 森林、¹⁴³ 自然和农村地区。¹⁴⁴

87. 瑞士还对拟议原则草案作了评论。关于原则的范围，瑞士强调原则草案对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都有重要意义，并提请注意《改变环境技术公约》所规定义务的重要性，包括不使用任何可能对环境造成广泛、长期或严重影响的改变环境技术的义务。

88. 关于原则草案二-2 和二-3，瑞士强调，军事必要性原则不得克减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现行规则，因为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本身也在军事必要性和人道原则之间取得了平衡。因此，军事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不能成为破坏环境的理由。

¹⁴⁰ Consejo de la Defensa Nacional, Política de Defensa Nacional de la Republica de Paraguay, 7 October 1999, para. I (A), 可在下列网址查阅: www.mdn.gov.py/application/files/1114/4242/5025/Politica_de_Defensa.pdf。

¹⁴¹ 1983 年 10 月 7 日《联邦环境保护法》(LPE, RS814.01), 可在下列网址查阅: www.admin.ch/opc/fr/classified-compilation/19830267/index.html。

¹⁴² 《联邦水保护法》第 5 条(www.admin.ch/opc/fr/classified-compilation/19910022/index.html)。

¹⁴³ 《联邦森林法》第 15 条(www.admin.ch/opc/fr/classified-compilation/19910255/index.html)。

¹⁴⁴ 《联邦自然与景观保护法》第 11 条(www.admin.ch/opc/fr/classified-compilation/19660144/index.html)。

89. 瑞士支持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关于禁止作为报复而对自然环境进行攻击的拟议原则草案(原则草案二-4)。关于保护区的原则草案,瑞士表示感兴趣地注意到该草案,建议将关于保护区的拟议制度与建立其他保护区的类似制度进行比较,还应审查这些区之间的潜在协同作用。

90. 瑞士还提到按照《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并评论了保护含有危险力量的装置及平民赖以生存的物体与保护环境两者之间的关系。

斯洛文尼亚

91. 斯洛文尼亚批准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武装冲突法的所有主要文书,包括《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此外,根据《国防法》,斯洛文尼亚武装部队成员负有纪律责任、刑事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¹⁴⁵ 斯洛文尼亚目前没有关于军事活动违反环境法的案例法。

92. 此外,斯洛文尼亚举例说明了专门针对斯洛文尼亚武装部队与环境保护有关行为的条款,例如对斯洛文尼亚武装部队成员进行环境培训、在国际行动和特派任务中合作执行环境保护措施¹⁴⁶ 以及关于环境意识的一般规定等条款。¹⁴⁷ 在将部队部署到危机应对行动前对其进行环境保护方面的系统军事教育和培训以及提供关于环境保护的具体资料被列为确保环境保护的额外手段。斯洛文尼亚还执行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环境保护标准和政策。

西班牙

93. 西班牙报告说,它加入了关于在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多项条约。西班牙环境法中关于环境责任的第 26/2007 号法提到了武装冲突。该法规定,开展行动者有责任防止、避免和补救环境损害,但将武装冲突引起的环境损害排除于其适用范围。¹⁴⁸ 西班牙指出,该条款没有指明这些冲突是国际还是非国际冲突。¹⁴⁹ 《西班牙刑法》第 610 条还规定:

“任何人在武装冲突情况下,若使用或命令使用违禁的或旨在造成不必要痛苦或过度伤害、或者旨在或可合理地预期会造成对自然环境过度、持久

¹⁴⁵ 《国防法》,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第 103/04 号政府公报,正式合订本,第 4 和 48 条。

¹⁴⁶ 《斯洛文尼亚武装部队服役规则》,第 210 项。

¹⁴⁷ 《斯洛文尼亚武装部队服役法》,第 68/07 和 58/08 号政府公报, ZSPJS-I, 第 17 条。

¹⁴⁸ 10 月 23 日关于环境责任的第 26/2007 号法(2007 年 10 月 24 日第 255 号政府公报),第 3 条。

¹⁴⁹ 2016 年 2 月 17 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和严重损害从而影响到民众健康或生存的作战方法或手段，或若命令不予手下留情，则将被判处 10 至 15 年监禁，且这不妨碍因其造成的损害而予以处罚”。¹⁵⁰

94. 不过，在西班牙各司法机构根据第 26/2007 号法、《刑法》第 610 条或任何其他文书作出的裁定中尚无任何一次是关于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事项的。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95. 联合王国在呈件中指出，多边环境协定一般不涉及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问题，但在国际人道主义法框架内编纂的《联合王国武装冲突法手册》明确阐述了这些问题。¹⁵¹

96. 联合王国还提请注意与《巴塞尔公约》有关的出口废物因而存在接收国是否遵守《公约》义务问题的例子。驻科索沃部队与德国签署了双边协定，出口废物到德国。¹⁵² 同样，联合王国称其“在 2014 年从叙利亚接收了一些化学废物前体。由于联合王国适用了欧洲联盟执行公约条例所规定的一项豁免，因此没有签署双边协定。”联合王国表示，在实践中，其以惯常方式处理了收到的废物，但完成文件的是联合王国国防部，而非叙利亚当局。联合王国指出：“亟需安全销毁化学品，但需要采取保护环境的方法。由于叙利亚当局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联合王国找到了一种方法来遵守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通知制度。化学废物抵达后，联合王国立即确保采取适当的环境控制措施。”

二. 适用于冲突后局势的特别相关规则

A. 一般性意见

97.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第一次(初步)报告(A/CN.4/674)不含任何原则草案。特别报告员当时认为，由于该报告是对适用于潜在武装冲突的相关规则和原则(和平时期义务)的概括性介绍，因而提出原则草案还为时过早。因此，该报告不涉及武装冲突期间或之后需要采取的措施本身，即使在武装冲突爆发前可能需要采取必要的准备行动以实施这些措施。¹⁵³

¹⁵⁰ 《西班牙刑法》(11 月 23 日第 10/1995 号组织法, 1995 年 11 月 24 日发布于第 281 号政府公报), 第 610 条。

¹⁵¹ 2016 年 3 月 24 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联合王国武装冲突法手册》可查阅 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jsp-383)。

¹⁵² 见 www.basel.int/Portals/4/Basel%20Convention/docs/article11/germany-kosovo.pdf。

¹⁵³ A/CN.2/674, 第 49 段。

98. 防止措施和赔偿措施相互关联。因此，本报告再次研究防止措施的一些方面可能会有帮助。虽然本报告的重点是武装冲突后采取的措施，但应看到冲突前和冲突后阶段之间的联系。

99. 本报告述及的防止措施主要是与武装冲突直接相关的措施。由于前一份报告(A/CN.4/685)所述的原因，不可能研究每一项环境条约义务以评估其在武装冲突期间的适用性。因此，初步报告确定了适用于武装冲突局势的国际环境法一般原则。应当重申，武装冲突法是特别法，但与此同时，这一领域的国际法不断发展，并受到国际法其他领域发展的影响。

和平时期协定的适用性，包括对国际组织惯例的援引

100. 有人提议，特别报告员应分析环境条约，审查它们是否也适用于武装冲突期间。¹⁵⁴ 由于多边环境协定数量众多，开展逐一分析将是一项艰巨任务。19世纪末以来，人们称环境条约“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¹⁵⁵ 一篇文章称，全世界的条约总数已超过 500 项。¹⁵⁶ 另一篇文章则称有 700 多项多边协定，双边条约、公约、议定书和修正案的数目则已过千。¹⁵⁷ 无需赘言，本报告不可能逐一研究。

101. 委员会决定，在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影响的研究工作中，不再进行这项分析，特别报告员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需要在本专题工作中使用不同方法。多边环境协定的适用性无疑只有在现行敌对行动期间才会引起关切。冲突前和冲突后阶段发生极少出现(甚至根本没有)与本专题相关的问题)。

102. 委员会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影响的研究工作成果对本专题仍然有用。委员会认识到，适用于武装冲突期间的国际法可能远远超出武装冲突法的范畴。该工作的出发点是，假定条约的施行不因武装冲突的存在而当然终止或中止。¹⁵⁸ 值得回顾的是，第 3 条草案规定了一般原则，即：

“在下列缔约国之间，条约的施行不因武装冲突的存在而当然终止或中止：

(a) 武装冲突当事国之间；

¹⁵⁴ A/70/10，第 142 段。

¹⁵⁵ Philippe Roch and Franz Xaver Perrez,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strive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coheren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 *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vol. 16, No. 1 (2005), p. 1 at pp. 5-6.

¹⁵⁶ 同上，第 6 页。

¹⁵⁷ Ronald B. Mitchel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a survey of their features, formation, and effects”,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p. 429, at p. 430.

¹⁵⁸ A/66/10，第六章，第 E.1 节，第 3 条。

(b) 武装冲突当事国与非当事国之间。”

103. 委员会指出，第 3 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规定了法律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一般原则。¹⁵⁹ 同时，委员会明确指出：“如条约本身载有关于条约在武装冲突情形下如何施行的规定，应适用这些规定。”¹⁶⁰ 委员会还通过了第 6 条，其中列出了条约可能被终止、退出或中止的因素。确定这点的有关因素包括条约的性质，特别是其主题事项。¹⁶¹ 这类条约的指示性清单载于条款草案的附件。评注解释说，该规定“与附件建立了一种联系，附件载有包含一份各类条约指示性清单，列入该名单，表示这些条约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全部或部分施行”。每类条约后都附有评注，进一步作出说明。¹⁶²

104. 附件评注中列出的条约包括《世界遗产公约》、《养护自然和自然资源非洲公约》和《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拉姆萨尔公约》)等。¹⁶³

105. 《世界遗产公约》是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全球最重要公约之一。上一次报告对《公约》进行了讨论。¹⁶⁴ 根据《公约》第 6.3 条，各缔约国“不得故意采取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损害……其他缔约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措施。”(即该《公约》前文指明的物体和遗址)。世界遗产委员会负责将物体和地区列入《处

¹⁵⁹ 委员会在第 3 条评注(A/66/10，第六章，第 E.2 节)中解释说，它“有意决定不采用肯定陈述来确立连续性推定，是因为担心这种做法不一定能反映国际法下的普遍立场，还因为肯定陈述意味着改变条款草案，从规定假设条约继续施行的情况变成指出连续性推定不适用的情况。委员会认为，这种调整过于复杂，不可预料的相反解释会引起诸多风险。它认为，目前采取的办法是仅仅消除任何非连续性假设，并数次指出在哪些情况下假定条约继续施行，这么做的净效果是加强条约关系的稳定。”

¹⁶⁰ A/66/10，第六章，第 E.1 节，第 4 条。委员会决定不列入“明文”这一限定语，原因包括“这种限定词可能会产生毫无必要的限制作用，因为有些条约虽然对此没有作出明文规定，但仍按其含义通过实施第 6 和第 7 条继续执行”(A/66/10，第六章，第 E.2 节，第 4 条的评注)。

¹⁶¹ A/66/10，第六章，第 E.1 节，第 6 条如下：

“为了确定在发生武装冲突时条约是否可能被终止、退出或中止，应参照所有有关因素，包括：

- (a) 条约的性质，特别是其主题事项、目的和宗旨、内容和条约缔约方数目；及
- (b) 武装冲突的特征，诸如其地域范围、规模和激烈程度、持续时间，如果涉及非国际武装冲突，还应考虑外部介入的程度。”

¹⁶² 同上，第 7 条和附件(其中载有第 7 条所指条约的指示性清单)。

¹⁶³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037 卷，第 15511 号)；2003 年 7 月 11 日在马普托通过的《养护自然和自然资源非洲公约》(修订本)，可在下列网址查阅：www.au.int/en/sites/default/files/treaties/7782-file-african_convention_conservation_nature_natural_resources.pdf；《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96 卷，第 245 号)。

¹⁶⁴ A/CN.4/685；例如见第 224 至 228 段。另见《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 11(4)条订立的《处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

于危险的世界遗产目录》。这是一份特殊的物体和地区目录，需采取重大行动，《公约》还要求为其提供援助。目录上的许多地区都在冲突区内。

106. 《拉姆萨尔公约》允许缔约方出于“紧急的国家利益”，删除《公约》订立的《具有国际重要意义湿地拉姆萨尔名册》上的湿地或限制其界限。¹⁶⁵ 应通过指定同一地区或其他地区生境条件类似的另一处湿地为拉姆萨尔湿地，对这种删除或限制作出补偿。¹⁶⁶

107. 《养护自然和自然资源非洲公约》修订本第十五条直接规管了军事和敌对活动。¹⁶⁷ 它不仅包括武装冲突期间应采取的措施，还包括了武装冲突之前和之后应采取的措施。¹⁶⁸ 《公约》的最初版本没有提及军事敌对行动。《公约》修订本尚未生效，但它是反映各国选择处理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问题的一例。¹⁶⁹

108. 《公约》关于武装冲突之前和期间缔约方义务的措词很有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缔约方“承诺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旨在或可预期对环境造成广泛、长期或严重损害的作战方法或手段，确保不发展、产生、测试或转移这种战争手段和方法”。该措辞比《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的对等条款第 35(3)条的措辞更加有力。除了对特定作战手段和措施的使用作出规定外，它还对威胁使用这种手段和措施的行为作了规定。此外，它以非累积要求(对环境造成广泛、长期或严重损害)代替了累积要求(对环境造成广泛、长期和严重损害)。因此，它与《改变环境技术公约》所规定的义务相同，并禁止对自然环境进行报复。对本报告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缔约方作出新的承诺，对武装冲突期间破坏的地区进行修复和重建。¹⁷⁰ 最后，《公约》规定，缔约方有义务开展合作，“建立并进一步发展和实

¹⁶⁵ 第 2.5 条。

¹⁶⁶ 第 4.2 条。只发生过少数几次限制边界事件；例如见 Ramsar Convention Secretariat, The Ramsar Convention Manual: A Guide to the Convention on Wetlands (Ramsar, Iran, 1971), 6th edition (Gland: Ramsar Convention Secretariat, 2013), p.51。可在下列网址查阅：www.ramsa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library/manual6-2013-e.pdf。

¹⁶⁷ 《养护自然和自然资源非洲公约》，前注 163。

¹⁶⁸ 关于军事和敌对行动第十五条如下：

“1. 缔约方应：

- (a) 在武装冲突期间采取所有切实措施，保护环境不受损害；
- (b) 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旨在或可预期对环境造成广泛、长期或严重损害的作战方法或手段，确保不发展、产生、测试或转移这种战争手段和方法；
- (c) 不把摧毁或改变环境当成作战或报复手段；
- (d) 承诺对武装冲突期间破坏的地区进行修复和重建。”

¹⁶⁹ 13 个国家批准了《公约》(截至 2016 年初)。为使条约生效，共需要 15 个缔约国，见 www.au.int/en/sites/default/files/treaties/7782-sl-revised_-_nature_and_natural_resources_1.pdf。

¹⁷⁰ 第十五条，第 1(d)款。

施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则和措施”。¹⁷¹ 《公约》没有对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进行区分。

109.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第 29 条规定了武装冲突期间的国际水道和设施问题。¹⁷² 它规定，这种水道和有关的设施、装置及其他工程“应享有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所给予的保护，并且不得以违反这些原则和规则的方式加以使用。”此外，第 31 条规定缔约国“应同其他水道国进行诚意合作，以期……尽量提供可能提供的资料”，即对其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资料和数据。

冲突后赔偿责任

110. 一些赔偿责任公约明确免除对战争行为或武装冲突造成的损害的赔偿。¹⁷³ 免除这种赔偿责任不能自动得出一项结论，即这些公约本身仅适用于平时时期。¹⁷⁴

111. 其他公约载有主权豁免条款，或明确排除某些行为者。与海洋法事项有关的公约往往属于这种情况，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¹⁷⁵ 其中第 32 条规定，《公

¹⁷¹ 第十六条，第 2 款。

¹⁷² 另见 A/CN.4/674，第 97 至 101 段对《公约》的阐述。

¹⁷³ 《关于危害环境的活动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1993 年 6 月 21 日在卢加诺签订(欧洲委员会，《欧洲条约汇编》第 150 号)，第 8(a)条)，根据此条规定，若能证明“损害是战争行为、敌对行为、内战、叛乱或特殊、无法避免和不可抗拒性质的自然现象造成的”，则运营者在公约下不承担赔偿责任；《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73 卷，第 14097 号)，第三条，第 2 段：“船舶所有人如能证实损害系属于以下情况，即对之不负责任：(a) 由于战争行为、敌对行为、内战或武装暴动，或特殊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抗拒性质的自然现象所引起”；《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063 卷，第 16197 号)，第四条第(3)款(a)项：“若能证明核损害直接由武装冲突行为、敌对行动、内战或叛乱造成，在本公约规定的赔偿责任不应施加于运营者”；《核能方面第三者责任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56 卷，第 13706 号)(经 1964 年、1982 年和 2004 年议定书修正)，第 9 条：“运营者不应为直接因武装冲突、敌对行动、内战或叛乱引起的核事件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奥地利和德国在公约附件 1 所作的保留值得注意，它们表示“关于发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奥地利共和国的核事故，保留规定运营者应承担直接原因是武装冲突、敌对行动、内战或叛乱或特殊严重自然灾害的核事故的损害赔偿权利”。此外，《关于设立油污损害赔偿国际基金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10 卷，第 17146 号)(经 1976 年和 1991 年议定书修正)在第四条第 2 款中排除对武装冲突造成的损害的补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现有国际法及其分析》(内罗毕：环境署，2009 年)第 39 页注意到“这一限制导致无法利用该基金应对 2006 年黎巴嫩吉耶发生的石油泄漏事件。”

¹⁷⁴ 见 Silja Vöneky, “Peacetime environmental law as a basis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caused by war” in Carl Bruch and Jay Aust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98: “建立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的各项国际公约免除了因战争措施及手段造成的损害赔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公约在武装冲突期间的适用性本身被排除了，因为其适用性并非限于平时时期，仅是限于非军事行为而已。”

¹⁷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833 卷，第 31363 号)。另见 A/CN.4/685 第 181 段，脚注 244 和 270，第 216 至 217 段，脚注 287 和 295，第 221 段，脚注 306 援引的资料。

约》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应影响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的豁免权。即使一艘军舰或政府船舶享有豁免权，也未必因此可以认为，船旗国可以免除其遵循《公约》中规则的义务。¹⁷⁶ 各公约通常会包括明文的条款，以明确某些条款无意适用于军舰或某些其他船只或飞机。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主权豁免的第 236 条。¹⁷⁷

112. 类似的规定也见于《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¹⁷⁸ 和《保护地中海海洋环境和沿海区域公约》(《巴塞罗那公约》)。¹⁷⁹ 义务的含义并不总是显而易见。与此同时，应当指出，国际海事组织援引《巴塞罗那公约》作为在吉耶的设施遭轰炸造成地中海大面积石油泄漏后向黎巴嫩提供援助的依据。¹⁸⁰

113. 一些公约载有明文条款，规定缔约国在发生战争或其他敌对行动时有权全部或部分中止施行某个特定公约。《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和《伦敦倾废公约》就是例子。¹⁸¹ 尽管如此，有时公约规定各国义务通知中止(例如，见《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等)，或同其他缔约方和国际海事组织磋商。¹⁸²

¹⁷⁶ 另见 [A/CN.4/674](#)，脚注 113：提及《伦敦倾废公约》，第七条，第 4 段。规定免除的条款其法律性质不同于豁免权条款。

¹⁷⁷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236 条：“本公约关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规定，不适用于任何军舰、海军辅助船、为国家所拥有或经营并在当时只供政府非商业性服务之用的其他船只或飞机。但每一国家应采取不妨害该国所拥有或经营的这种船只或飞机的操作或操作能力的适当措施，以确保在合理可行范围内这种船只或飞机的活动方式符合本公约。”

¹⁷⁸ 《禁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340 卷，第 22484 号)：第 3(3)条载有类似条款，其中确认公约“不适用于任何军舰、海军辅助船舶或其他国有或国营且目前只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但每一缔约方应采取不妨害该国所拥有或经营的这种船舶的操作或操作能力的适当措施，以确保在合理可行范围内这种船舶的活动方式符合现行公约。”

¹⁷⁹ 《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02 卷，第 16908 号)。1995 年修正案第 3(5)条载有一条类似的主权豁免条款，其中排除了对“一国所拥有或经营且从事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军舰或其他船舶的主权豁免”产生任何影响的可能性。然而，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其根据国际法规定享有主权豁免的船只和飞机以符合本议定书的方式行事。

¹⁸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注 173，第 36 页。另见 Ole Fauchald, David Hunter and Wang Xi (e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00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3 and footnotes 114 and 115。

¹⁸¹ 《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327 卷，第 4714 号)，第十九条：“在发生战争或其他敌对行为时，认为受到影响的缔约国政府，无论是作为交战国还是中立国，可在其所有或任何领土上全部或部分中止施行本公约。中止国政府应立即将此中止通知主席团。”《防止倾废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伦敦倾废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046 卷，第 15749 号)，第五条第 2 款：如果由于“对人类健康具有不能接受的危险，并且找不到其他可行的解决办法的紧急情况”而获得特别许可证，则可以偏离此规定。另见 [A/CN.4/674](#) 脚注 113 援引的资料。

¹⁸² 《防止倾废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第五条第 2 款：“该缔约方应与可能涉及的任何国家及组织协商，本组织经与其他缔约方及相应的国际组织协商后，应根据第十四条规定，立即向该缔约方建议应采取的最适当的程序。”

114. 若干条约干脆对其是否适用于武装冲突的问题保持沉默。这些条约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奥胡斯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巴塞尔公约》和《保护移栖物种公约》。¹⁸³

国际投资协定(包括双边投资条约)和环境保护

115. 可以说，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第 5 条及附件已覆盖了作为武装冲突期间较可能适用的条约的国际投资协定。特别是，这些协定可能属于“友好商业航行条约和涉及私人权利的协定”的类别。条款草案的评注指出，“使用人权保护的范畴可以视为赋予友好、通商和通航协议和涉及私人权利的类似协议(包括双边投资条约)之地位的自然延伸。”¹⁸⁴ 而且“和平解决国外私人投资引起的争端的机制”也可以作为“关于私人权利的协定”归属这一类别。¹⁸⁵ 此外，2005 年秘书处汇编的备忘录认为，“在概述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友好商业航行条约“被视为在武装冲突期间和之后均有效”，并援引 Anthony Aust 的观点，即“诸如投资保护协定的条约不得中止，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互相保护缔约国的国民”。¹⁸⁶

116. 关于国际投资协定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适用的另一个强有力的论点涉及这些协定大多载有的“充分安全”条文，其中规定在诸如武装冲突等情形中保护投资(因而表明在这种冲突爆发时相关文书将不停止适用)。

¹⁸³ 《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尽管在关于尽可能就任何严重危及生物多样性的情况通知可能受影响国家的义务的第 3 和第 14 条中对适用性可能有所暗示)。另见 A/CN.4/674，注释 226，和 A/CN.4/685，第 48 段(秘鲁的援引提供的资料)；《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以及公正公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见联合国环境署，第 UNEP/CBD/COP/10/27 号文件，附件，第 X/1 号决定)(尽管注意到第 4 条可能暗示了适用性)；《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61 卷，第 37770 号)(另见 A/CN.4/674 注释 123 的援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另见 A/CN.4/685 第 48 段的援引(秘鲁提供的资料))；《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第 8(2)条就是有一条标准规定指出“本公约的规定不应影响任何缔约方在本公约对它生效前参加的双边、区域或国际协定对它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93 卷，第 14537 号)(另见 A/CN.4/685 第 48 段的援引(秘鲁提供的资料))；《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673 号，第 28911 号)(第 4(12)条注意到，公约不应“在任何方面影响按照国际法确定的各国对其领海的主权，以及按照国际法各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及其大陆架拥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以及按照国际法规定并在有关国际文书上反映的所有国家的船只和飞机所享有的航行权和自由”)；另见 A/CN.4/685，第 66 段的援引(罗马尼亚提供的资料)；《养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651 号，第 28395 号)(第三条第 4 款(b)项：“属于附录一所列移栖物种分布区国家的缔约方应努力(……)以防止、消除、补偿或最大限度地减少严重妨碍或阻止物种移徙的活动或障碍的不利影响。”)

¹⁸⁴ A/66/10，第六章，第 E.2 节，附件评注，第(48)段。

¹⁸⁵ 同上，第(69)段。

¹⁸⁶ A/CN.4/550，第 74 段和脚注 267。

117. 2011 年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国家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的一项研究指出, 这类协定中有六十六个载有关于双方均关切的环境保护条款。¹⁸⁷ 该项研究还指出, 在过去十年中这类条款在新缔结的协定中出现的频率已大幅度增加。就这些条款中环境保护的实质性内容而言, 其表达的环境关切却很宽泛, 这点令人惊讶, 因而也导致经合组织分析家怀疑“投资界和环境决策界之间的交流有限。”¹⁸⁸

118. 在所有区域, 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越来越多, 已成为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家惯例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指标。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 某些国家有很高比例的协定载有关于环境问题的条款, 特别是以下五个国家(按 2011 年载有环境保护规定的国际投资协定的百分比高低排列): 加拿大、日本、墨西哥、新西兰和美国。例如, 2012 年最新版本美国示范条约载有许多关于保护环境的条款, 包括提及“控制对环境有害或有毒的化学品、物质、材料和废物, 并传播与此有关的信息”等。¹⁸⁹

119. 有时, 国家会选择列入一项保留规范环境事项政策空间的条款。¹⁹⁰

120. 因此, 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在涉及外国投资时载有关于环境保护和/或确保进一步保护环境的政策空间的明文规定。¹⁹¹ 因此, 国际投资协定可能为各国提供更多激励措施, 以在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时期都保护环境。应当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 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影响的条款草案的评注认为, 适用性主要是针对个别条款而言, 而不是针对整个文书而言, 并援引了 Clark 诉 Allen 案, 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冲突爆发并不必然中止或废除条约的条款, 此处其所指并非整个条约或文书。¹⁹²

¹⁸⁷ Kathryn Gordon and Joachim Pohl, *Environmental Concer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 Survey* (OECD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2011/01), 可在下列网址查阅: <http://dx.doi.org/10.1787/5kg9mq7scrjh-en>。

¹⁸⁸ 同上。

¹⁸⁹ 美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2012)(可在下列网址查阅: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BIT%20text%20for%20ACIEP%20Meeting.pdf>), 第 12(4)(b)条; 另见第 8(3)(c)条等。

¹⁹⁰ Kathryn Gordon and Joachim Pohl, 前注 187, 另见 Wan Pun Lung, “Pre-Conflict Military Activities: Environmental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tate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4, no. 3 (2015) p.465。

¹⁹¹ Wan Pun Lung 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前注 190。关于国际投资协定的环境政策空间, 另见 Åsa Romson, *Environmental Policy Spac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PhD thesis, Stockholm University, 2012)。

¹⁹² A/66/10, 第六章, 第 E.2 节, 附件评注, 第(33)段。

土著人民

121. 如以往报告所强调，¹⁹³ 土著人民与其土地存在特殊关系。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生物多样性最高、面临威胁最大的 200 个地区中有 95% 是土著领地。¹⁹⁴

122. 土著人民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特殊关系得到国际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等法律文书的承认、保护和维护。¹⁹⁵ 此外，美洲人权法院的大量案例法表明，土著人民的土地和领地必须得到保护，无论其是否拥有这些土地和领地的所有权。¹⁹⁶ 该法院的案例法主要但不完全以《美洲人权公约》第 21 条为基础，该公约保护土著人民与其土地及其世袭领地上的自然资源，乃至由此而产生的无形要素之间的密切关系。¹⁹⁷

123. 在“里奥内格罗屠杀诉危地马拉”案中，法院认为“土著社区成员的文化符合他们在世界中特有的存在、观察和行动方式，并是在他们同其传统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密切关系基础上构成，不仅因为传统土地和自然资源是他们主要的生存手段，而且因为这些土地和自然资源是他们的世界观和宗教信仰的组成部分，因此，也是他们的文化特性的组成部分”。¹⁹⁸

124. 关于土著人民与环境之间联系的很大一部分立法和案例法与土著人民对其土地和领地问题的参与有关。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第

¹⁹³ 例如，见 A/CN.4/674，第 164 至 166 段和 A/CN.4/685，第 224 段。特别报告员在口头发言中也涉及了这个问题。

¹⁹⁴ A/CN.4/674，第 164 段。另见 Gonzalo Oviedo, Luisa Maffi and Peter Bille Larsen, *Indigenous and Traditional Peoples of the World and Ecoregion Conserv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nserving the World's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Gland: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2000)，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wwf.panda.org/wwf_news/?3781/Indigenous-and-Traditional-Peoples-of-the-World-And-Ecoregion-Conservation-An-Integrated-Approach-to-Conserving-the-worlds-Biological-and-Cultural-Diversity-English。

¹⁹⁵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大会第 61/295 号决议，附件)；劳工组织《1989 年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69 号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650 卷，第 28383 号)，该公约修订了《1957 年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 107 号公约)。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和人权与环境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前的人权与环境问题独立专家)的报告很好地概述了土著人民在环境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权利。

¹⁹⁶ 另见 A/CN.4/685，第 117 段。

¹⁹⁷ 例如，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前注 195)。另见 A/CN.4/674，第 166 段援引的资料。

¹⁹⁸ *Río Negro Massacres v. Guatemala*, Judgment (Preliminary Objection, Merits, Reparations and Costs), Case No. C-250, 4 September 2012, para. 177. 如脚注 157 中 A/CN.4/685 所评论，法院交叉援引下列案件：Case of the Yakyé Axa Indigenous Community v. Paraguay, Judgment, Case No. C-125, 17 June 2005, para. 135, 和 the Case of Chitay Nech et al. v. Guatemala, Judgment, Case No. C-212, 25 May 2010, para. 147. 另见，*Afro-Descendant Communities Displaced from the Cacarica River Basin (Operation Genesis) v. Colombia*, Judgment (Preliminary Objections, Merits, Reparations and Costs), Case No. C-270, 20 November 2013, paras. 346, 352, 354, 356 and 459。

23 条也概述了土著人民的参与权，前者要求“酌情采取特殊措施，保障有关人民的人身、机构、财产、劳动、文化和环境”，¹⁹⁹ 后者则被法院解释为允许土著人民通过“自己的机构和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惯例、习俗和组织形式”进行参与。²⁰⁰

125. 此外，美洲人权法院已设立保障措施，要求各国“根据[土著人民]的习俗和传统”获得“他们自由、事先且知情的同意”。²⁰¹ 各国还必须确认，对土著和部落人民财产权利的任何限制(如授予在其领地上的特许权)仍然保存、保护和保障他们与其世袭土地的特殊关系且不危及其生存。

126. 某些国家的立法提供了关于在协商义务及征求土著和当地社区自由、事先且知情同意方面国家惯例的有趣例子。例如，菲律宾的立法规定了自由、事先且知情同意的权利，包括《共和国第 8371 号法案》第 58 条，其中规定在维护、管理和发展“世袭领域或其中的部分领域时”，“应根据其习惯法律、在不妨碍现行法律关于自由事先同意的基本要求基础上征得[土著社区]的同意；而这些领域是在土著社区全面参与的前提下被适当机构确认为是重要分水岭、红树林、野生动物保护区、荒野、保护区、森林覆盖率或再造林所必需的”。²⁰²

127. 对强调土著人民在利用环境自然资源方面的传统知识的还有《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8(j)条以及 201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以及公正公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后者包括具体提及土著和地方社区。例如，第 5(2)条规定，“每个缔约方应根据关于土著和地方社区对遗传资源的既定权利的国内立法，酌情采取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以确保根据共同商定的条件与有关社区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由土著和地方社区持有的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

128. 关于环境的传统知识和对环境的传统利用方式也有助于教育，例如，专家机制关于土著人民受教育权利的第 1 号咨询意见(2009)对此就有提及。²⁰³ 该文件指出，土著人民的受教育权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心理、身体、精神、文化和环境各个层面。”²⁰⁴ 这为《儿童权利公约》第 29(1)(e)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平

¹⁹⁹ 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前注 195)，第 4 条。

²⁰⁰ Case of Yatama v. Nicaragua, Judgment (Preliminary Objections, Merits, Reparations and Costs), Series C No. 127, 23 June 2005, para. 225。

²⁰¹ Case of the Saramaka People v. Suriname, Judgment (Preliminary Objections, Merits, Reparations, and Costs), Series C No. 172, 28 November 2007, para. 134。

²⁰² 1997 年 10 月 29 日《共和国第 8371 号法案》，其目的是：“承认、保护和促进土著文化社区/土著人民的权利，创设一个土著人民事务全国委员会，并为委员会和其他目的建立执行机制，拨付资金”。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www.gov.ph/1997/10/29/republic-act-no-8371/>。

²⁰³ 见 A/HRC/12/33，附件，可查阅：www.refworld.org/docid/4ac1c3822.html。

²⁰⁴ 同上，第 3 段。

行比较, 该公约规定“缔约国一致认为教育儿童的目的应是: [……]培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²⁰⁵

129. 建议下列原则草案:

原则草案四-1

土著人民权利

1. 土著人民在其土地和自然环境方面的传统知识及做法须始终受到尊重。
2. 各国义务与土著人民合作协商, 并在因使用他们的土地及领地而可能对土地产生重大影响时, 征求他们自由、事先且知情的同意。

获取和分享信息与合作义务

130. 在最近几十年中, 越来越多的国际协定就“获取信息”和“分享信息”作出了规定。这两个概念与合作义务密切相关, 因为它们往往依靠合作促进其有效执行。众所周知, 委员会长期以来注重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含义和范围。关于分享信息的各种规定可参见在委员会工作基础上通过的各项公约。²⁰⁶ “合作义务”同样如此, 已有若干公约载有在委员会工作基础上拟订的关于合作的条款。²⁰⁷

²⁰⁵ 《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577卷,第27531号)。

²⁰⁶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96卷,第8368号),第5(c)和第37条;《特别使团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400卷,第23431号),第11(1)(f)条;《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035卷,第15410号),第4(b)、第5和第11条;《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5.V.12),第15(1)(e)和第47条;《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大会第51/229号决议,附件),第9、第11、第12、第14至16、第19、第30、第31和第33(7)条。

²⁰⁷ 《公海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50卷,第6465号),第12(2)、第14和第25(2)条;《捕鱼及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559卷,第8164号),第1(2)和第2条;《特别使团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400卷,第23431号),第231页,序言部分第2段;《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155卷,第18232号),序言部分第2和第7段;《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035卷,第15410号),第4条和序言部分第1和第2段;《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5.V.12),第6、第7和第76条及序言部分第2和第4段;《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946卷,第33356号),序言部分第5段;《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4.V.6),第28(4)条和序言部分第5段;《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1978年3月21日在维也纳签订(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4.V.5),序言部分第9段;《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第5(2)、第6(2)、第8、第14、第23、第25(1)、第28(3)和(4)、第30和第31条及序言部分第6段。

此外，在委员会已经拟订的案文中有许多条款涉及信息分享²⁰⁸ 与合作。²⁰⁹

131. 合作的义务常常被称为一项公认(包括通过委员会的工作予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²¹⁰ 由于本报告的目的不是重复委员会已经在这一领域所做的事情，而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特别报告员是以这一个假设前提作为其出发点的，即“合作义务已被确立为一项国际法原则，可见于许多国际文书”，这是最近关于这一假设前提的表述。²¹¹

132. 如下文所示，即使在武装冲突期间，卷入武装冲突的国家也有义务记录并与保护国分享信息，例如关于失踪人员和身份证件的资料，此处仅举这两例。²¹² 这些国家还有义务记录地雷埋设情况并分享信息，以清除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而每一新条约有关后一项义务的规定都更加严格。²¹³

133. 但是，允许获取并分享信息的义务不仅限于武装冲突法中相对有限的规定。这些义务在国际法其他领域也至关重要。这体现了新的现实状况，包括国际合作日益增加的趋势。除非各国和各组织能获取数据，并愿意与其他相关行为体分享这一信息，国际合作成果将有限。获取和分享信息具有高成本效益。但更重要的

²⁰⁸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国籍问题条款(1999 年)，第 18 条；国际法委员会，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2001 年)，第 8、第 12 至 14 和第 17 条；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2006 年)，原则 5；国际法委员会，跨界含水层法条款(2008 年)，第 8、第 13、第 15、第 17 和第 19 段。

²⁰⁹ 国际法委员会，《消除未来无国籍问题公约草案》，1954 年，序言部分第 2 段；仲裁程序示范规则，1958 年，第 18(2)条；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1994 年，第 26(2)(e)、第 44(2)、第 51、第 53(1)和第 56 条及序言部分第 1 段；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条款，2001 年，第 41(1)条；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2001 年，第 4、第 14 和第 16 条及序言部分和第 5 段款；关于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2006 年，原则 5(c)和 8(3)；跨界含水层法条款，2008 年，第 7、第 11(2)、第 16、第 17(2)(b)、第 17(4)和第 19 条及序言部分第 8 和 10 段；关于保留地对话的结论，2011 年，第 9 条；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的条款，2011 年，第 42(1)条；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条款草案，一读，2014 年(A/69/10，第六章，第 C.1 节)，第 8 条、第 9 和第 10 条。

²¹⁰ 例如，见国际法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发生灾害时人员保护条款草案第 8[5]条的评注第 1 段(A/69/10，第五章，第 C.2 节)。

²¹¹ 同上。

²¹²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附加议定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25 卷，第 17512 号)，第 33 条；《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第一公约》(《日内瓦第一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970 号)，第 16 条；《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第四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373 号)，第 137 条；《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第二公约》(《日内瓦第二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971 号)，第 19 和 42 条；《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第三公约》(《日内瓦第三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972 号)，第 23 条。

²¹³ 见本报告第二节 D。

是，获取信息是人权的一部分。《世界人权宣言》²¹⁴ 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²¹⁵ 载有总括性的信息权利。在《欧洲人权公约》背景下还发展出环境信息权利，Guerra 及其他人诉意大利案就是例证；欧洲人权法院在该案中裁定，根据《公约》第 8 条(家庭生活权和隐私权)，原告有权获取环境信息。²¹⁶《奥胡斯公约》执行指南相应指出：“过去几年，获取信息也作为一种人权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该权利隐含在若干全球和区域条约保障的表达自由权内。”²¹⁷ 此外，获取有关环境的可靠信息，对于环境保护以及证明损害赔偿责任至关重要。

134. 显然，获取并分享关于外国领土的信息须该国同意，同意方式要么是按国际协定的规定予以同意，要么是逐案给予许可。这也是一些公约包含安全和防卫问题相关规定的原因之一。

135. 2014 年的初步报告已在一定程度上提及《越境环境影响评估公约》(《埃斯波公约》)，本文将不再深入讨论。²¹⁸ 但是，就环境影响评估而言，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国际法院关于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之间的合并案件的一项裁决扩大了乌拉圭河纸浆厂一案规定的范围。²¹⁹ 法院认为，必须就可能产生有害影响的任何活动开展环境影响评估，而不仅像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那样，仅涉及工业活动。²²⁰

136. 在全球和区域两级的许多国际法渊源中，都可发现关于收集环境相关信息和数据的要求。鉴于已经在较宽泛的意义上讨论了这些安排的适用性，下一节将侧重于这些安排中概述的、与收集和分享环境信息有关的一些实质性义务。

²¹⁴ 大会，第 217 A(III)号决议，第 19 条。

²¹⁵ 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057 卷，第 14688 号)，第 19 条(自由发表意见)和第 25 条(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²¹⁶ Guerra and Others v. Italy, Application No. 14967/89,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1998。

²¹⁷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奥胡斯公约执行指南》，第二版(2014 年)，第 76 页，可在下列网址查阅：www.unece.org/fileadmin/DAM/env/pp/Publications/Aarhus_Implementation_Guide_interactive_eng.pdf。

²¹⁸ 见 A/CN.4/674，第 150 段。

²¹⁹ 关于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公路(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的合并案件，案情实质，判决，《2015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可在下列网址查阅：www.icj-cij.org/docket/files/152/18848.pdf。另见乌拉圭河纸浆厂(阿根廷诉乌拉圭)，《200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04 段：“现在可以认为，按照一般国际法的要求，在拟议的工业活动可能越界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共有资源产生这种影响的情况下，应该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²²⁰ 《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和《哥斯达黎加沿圣胡安河修建公路》，前注 219，第 104 段。

137. 《奥胡斯公约》²²¹ 于 1998 年签订之时，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原因在于，该《公约》“赋予公众权利，规定缔约方和公共当局在获取信息和公共参与方面的义务。”²²²

138. 《奥胡斯公约》将“环境信息”界定为与各种环境要素的状况、正在影响或可能影响环境要素的各种因素和可能受以上要素影响的人类健康和安全状况有关的任何信息。²²³ 该《公约》还进一步规定，缔约方必须“在国家立法范围内为公众提供这种(环境)信息”。此种公民权利必然要求国家担负收集此类环境信息的义务，以便一旦收到请求，即为公众提供这种信息。²²⁴

139. 其他公约也就公约缔约方之间的信息交流作出规定。例如，其中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²²⁵ 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²²⁶ 还包括《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²²⁷ 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²²⁸ 两项公约均载有关于获取信息的条款。同样，2013 年《关于汞的水俣公约》规定，各缔约方应“推动和促进”获取这方面的资料。²²⁹

²²¹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61 卷，第 37770 号)。

²²²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前注 217，第 15 页。该公约有 47 个缔约方，其中包括欧洲联盟。

²²³ 《奥胡斯公约》，第 2 条。

²²⁴ 同上，第 4 条。

²²⁵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4 和 17 条。

²²⁶ 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例如见第 16 条和第 19 条，其中呼吁缔约方“充分、公开、及时提供”有关防治荒漠化的信息。

²²⁷ 见《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44 卷，第 337 号)，第 15 条。

²²⁸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56 卷，第 119 号)，第 10 条。

²²⁹ 2013 年 10 月 10 日订于日本熊本的《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 18 条。就此还可以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六条提及获取信息，指出各缔约方应：“在国家一级并酌情在次区域和区域一级，根据国家法律和规定，并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促进和便利：[……]公众获取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信息”。最近签订的《巴黎协定》同样在许多段落和条款中提及获取信息，例如在第四条第八款，作为通报国家自主贡献的的国家责任的一部分，以及第十二条中关于气候变化教育和公众获取信息的更宽泛的规定(FCCC/CP/2015/L.9/Rev.1)。

140. 一些软性法律文件也以明确程度或高或低的方式提及信息问题。这些文件包括 1972 年《人类环境行动计划》、²³⁰《里约宣言》²³¹ 和 2002 年《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²³²

141.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赞同获取信息的重要性“我们强调，广泛的公众参与、信息的传播、司法和行政程序，对促进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²³³

142. 学者们将收集环境信息的义务与预防原则以及《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注意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联系起来，指出，“因此，预防原则为交战各方规定了某些预防义务，以采取措施保护自然环境。在这方面，

²³⁰ 见《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报告》，1972 年 6 月 5 日至 16 日，斯德哥尔摩，(A/CONF.48/14/Rev.1)，第一部分第二章，建议 7(a)。相关案文可查阅：www.unep.org/documents.multilingual/default.asp?DocumentID=97&ArticleID=1506&l=en。虽然《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斯德哥尔摩宣言》)本身未谈及获取信息，但《行动计划》建议各国政府和秘书长“用[……]保证取得有关工具和资料的方法，使每一个人都能自影响自己环境的平等机会”。

²³¹ 《里约宣言》原则 10 指出：“在国家一级，每一个人都应能适当取用公共当局所持有的关于环境的资料，包括关于在其社区内的危险物质和活动的资料”，并呼吁各国“应通过广泛提供资料来便利及鼓励公众的认识和参与”。见《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第一卷，《大会通过的决议》，出售品编号：E.93.I.8 和更正)，决议 1，附件一和二)。2015 年《关于里约宣言的牛津评注》指出，即使原则的拟订方式避免使用“权利”一词，“从合理角度而言，如果一国不在某种意义上给予获取信息权，则无法适当地遵守原则 10”，参见 Jonas Ebbesson, “Principle 10: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Jorge E. Viñuales(ed.), *Th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 Commenta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287-311(Rio Commentary), 见第 291 页：“虽然原则 10 是精心起草的，以便不包括权利一词，但是从合理角度而言，如果一国不在某种意义上给予获取信息权，则无法适当地遵守原则 10”。该《评注》还指出，获取信息是环境协定中最经常提及的原则 10 内容，见《评注》第 293 页：“在原则 10 的要素中，公众获取信息是环境协定中作出最广泛规定的要素。将予以公开的信息以及将提供的公众参与机会取决于协定本身的范围和目的。”

²³² 在《斯德哥尔摩宣言》和《里约宣言》所作承诺的基础上，2002 年《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让各国承诺，“保证能获得国家一级的环境信息及关于环境事务的司法和行政记录”，便利获取水资源和管理信息，并“提供当地承受得了的获得信息的办法，加强与荒漠化和干旱有关的监测和预警”。见《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2002 年)，(可在下列网址查阅：www.un.org/esa/sustdev/documents/WSSD_POI_PD/English/WSSD_PlanImpl.pdf)，分别是第 128 段和第 41(e)段。例如，另见第 112 和 164 段。2002 年，国际法协会发表了《关于可持续发展国际法的新德里原则宣言》，其中将获取信息列为七项核心原则之一，并承认公众参与“要求有权查阅政府和工业企业持有的关于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及保护环境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适当的、可明白的、及时的信息，但不让申请人承受过大的财政负担，并适当考虑隐私和充分保护商业秘密。”见国际法协会，《关于可持续发展国际法的新德里原则宣言》(2002 年 4 月 2 日)，第 2/2002 号决议。

²³³ 见大会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第 43 段。

事先收集信息至关重要”。²³⁴ Hulme 提出了类似建议，指出，不收集信息就无法充分保护环境，并指出这种信息收集“不可否认地[……]类似于环境法中所用的环境影响评估概念”。²³⁵

143. 获取环境相关信息对于证明所作军事决定如何与军事必要性规则规定的义务相符也很必要。正如最近的《美国战争法手册》指出，可获取的环境信息反过来影响军事必要性，因为“战争期间可获取的资料有限，且不可靠，从而影响了战争法的发展。例如，它影响到军事必要原则性如何适用的问题”。²³⁶ 该手册还指出，这种“信息的有限和不可靠性[……]在战争法有关人们将如何获取信息的标准中得到确认”。²³⁷

144. 就国际组织有关本专题的惯例而言，值得回顾的是，环境署关于将环境纳入冲突后评估的指导方针提及了公众参与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性，因为在冲突后环境中，“自然资源的配置和管理是以特定、分散或非正规方式进行的”。²³⁸

145. 联合国关于联合国外地特派团的环境政策规定，维持和平特派团应指派 1 名环境干事，以提供与特派团行动有关的环境信息，推动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该政策还包括一项关于传播和研究环境资料的要求，其假定前提是有机会获取实际上可以传播——因而不是保密资料的信息。同样，北约关于环境保护的军事准则载有一项关于“交流有关[环境保护]程序、标准[和]关切(……)的信息”的标准。²³⁹ 此外，1992 年《红十字委员会关于武装冲突中环境保护的军事手册和指令准则》载有关于组织保护的一段。²⁴⁰ 其中可包括收集环境数据的环境组织，以此“推动防止或补救环境损害”，例如利用现代技术通过民间社会组织和个人来收集数据，正如最近有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一份报告所反映的那样。²⁴¹

²³⁴ Cordula Droege and Marie-Louise Tougas,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Armed Conflict-Existing Rules and Need for Further Legal Protection”,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 21, at p. 34.

²³⁵ Karen Hulme, *War Torn Environment: Interpreting the Legal Threshold* (Leiden: Brill, 2004), p.82.

²³⁶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Defense, *Law of War Manual*, (June 2015), p. 17(原文无斜体)。可在下列网址查阅：www.dod.mil/dodgc/images/law_war_manual15.pdf。

²³⁷ 同上，第 18 页。

²³⁸ 见环境署指导说明，《将环境纳入冲突后需求评估》(环境署，2009 年)，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postconflict.unep.ch/publications/environment_toolkit.pdf。

²³⁹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Military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C 469, para. 8(5): Information exchange.

²⁴⁰ 见 A/49/323, 附件, 准则 19, 提及《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63.2 条和《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61 至 67 条。

²⁴¹ 见 PAX, *Amidst the Debris.....A Desktop Study on the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 Impact of Syria's Conflict*, (PAX, 2015), 可查阅 www.paxforpeace.nl/stay-informed/news/amidst-the-debris-environmental-impact-of-conflict-in-syria-could-be-disastrous。应当指出，红十字委员会准则 19 提及了根据各方之间的特别协定或(……)其中一方的许可。

146. 在国际法院受理的乌干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的案件中，挑战之一是缺乏必要数据，以证明违反有关禁止攻击含有危险力量装置的规定的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损害和破坏。²⁴² 为审查北约在巴尔干战争期间的军事行动而设立的委员会给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检察官的最后报告也提及了此种信息的缺乏。²⁴³ 如果信息更完整，而且能够以更系统的方式予以收集，那么收集可靠信息的努力将更易于掌控。提高司法便利性将对此类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都有利。所需证据自然与损害的定义密切相关，这不仅体现于达到《罗马规约》、《改变环境技术公约》和其他国际文书界定的基本要求所需要的证据，也体现于不一定达到上述基本要求，但仍需要对照各种利害关系予以权衡的任何必要性要求。

147. 就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损害”而言，人们注意到，没有关于此种破坏的具体含义的普遍接受的定义。²⁴⁴ 这一概念的定义自然影响举证标准，也影响所需数据的数量和质量。

148. 《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于 2014 年 8 月生效，其中规定缔约方应在善意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使国际水道得到充分保护。²⁴⁵ 该《公约》还要求缔约方事前通知可能严重损害其他跨界水道国的、计划采取的措施，并就此交换资料。重要的是，该《公约》要求缔约方就对国家安全和国防至关重要的信息进行诚意合作。²⁴⁶

149. 根据国际法一般原则，若违反有关分享信息以及将可能影响水道的任何活动和措施通知其他缔约方的义务，则其他缔约方可根据国际侵权法提出索赔。²⁴⁷

²⁴² 例如，见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诉讼请求书，《199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5 和 17 页，可在下列网址查阅：www.icj-cij.org/docket/files/116/7151.pdf。

²⁴³ Final Report to the Prosecutor by the Committee established to Review the NATO Bombing Campaign against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June 2000)，可在下列网址查阅：www.icty.org/x/file/About/OTP/otp_report_nato_bombing_en.pdf，第 22 和 24 段。另见 Mara Tignino, “Wate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2 No. 879 (2010), pp. 647-675, at p.662。

²⁴⁴ 参见 Akiva Fishman and others, “Peace Through Justic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Wartime Environmental Wrongs” in Carl Bruch, Carroll Muffett and Sandra S. Nichols (eds), Governanc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Earthscan, forthcoming 2016), p. 21。

²⁴⁵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大会第 51/229 号决议，附件)第 8 条。

²⁴⁶ 同上，第 31 条。初步报告也提及了这些义务，见 A/CN.4/674，第 100 段。

²⁴⁷ 例如，参见 Alistair Rieu-Clarke, Ruby Moynihan and Bjørn-Oliver Magsig, UN Watercourses Convention User's Guide(IHP-HELP Centre for Water Law, Policy and Science)(可在下列网址查阅：[www.gwp.org/Global/Our%20Approach/Strategic%20Allies/User's%20Guide%20to%20the%20UN%20Watercourses%20Convention%20\(2012\).pdf](http://www.gwp.org/Global/Our%20Approach/Strategic%20Allies/User's%20Guide%20to%20the%20UN%20Watercourses%20Convention%20(2012).pdf))，第 134 页：“可以从国际法一般原则中推断出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效力，例如，根据国际侵权法原则，一个国家可能承担因其未转递有关数据和资料而给各沿岸国造成的损害赔偿赔偿责任。”

150. 就共有资源开展合作和建立信任可以有多种形式，联合机制和联合委员会又是一例。²⁴⁸ 在几种不同的情形下，例如分别在利比里亚、阿富汗和尼日利亚，改善水治理被用作缓解紧张局势，减少敌对行动的手段。²⁴⁹ 东非共同体支持的维多利亚湖盆地委员会可能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范例。该委员会称，其职能是“促进、便利和协调各行为体为实现维多利亚湖盆地的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而开展的活动”，委员会还为此维护一个水生生物多样性数据库。²⁵⁰ 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安哥拉签订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关于共有水道的修订议定书》是人们提及的另一个有用范例，可供效仿。²⁵¹ 该《议定书》要求缔约方“交流有关共有水道水文、水文地质、水质、气象和环境条件的现有信息和数据”，²⁵² 以及更广泛地规定“单独，并在适当情况下，共同保护和维护共有水道的生态系统”。²⁵³

151. 总之，可以看出，在特别报告员与各国之间的许多谘商以及与国际组织的谘商中，基线研究和信息的重要性一再得到强调。如上文所述，提供这种信息对于确定军事必要性和评估冲突后的环境破坏也很重要。军事手册在这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推动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利用国际组织的现有经验和资源也是有益的。²⁵⁴ 有时，武装部队可能已掌握此类数据和信息——或者至少能在不产生高额费用的情况下检索到数据和信息。²⁵⁵

²⁴⁸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第 8 和 9 条。

²⁴⁹ 例如，见 Erika Weinthal, Jessica Troell and Mikiyasu Nakayama(eds), *Water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New York: Earthscan, 2014), 可在下列网址查阅: <http://environmentalpeacebuilding.org/publications/books/water-and-post-conflict-peacebuilding/>。另见 David Jensen, Alec Crawford, Carl Bruch, “Policy Brief: 4: Water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2014), 可在下列网址查阅: www.environmentalpeacebuilding.org/assets/Documents/LibraryItem_000_Doc_425.pdf。

²⁵⁰ 详情见国际水治理网站: www.internationalwatersgovernance.com/lake-victoria-basin-commission-and-the-lake-victoria-fisheries-organization.html。

²⁵¹ 斯德哥尔摩国际水研究所与特别报告员之间的通信。若需了解《议定书》详情，见 2000 年 8 月 7 日订于温得和克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共有水道系统修订议定书》，可在下列网址查阅: www.sadc.int/documents-publications/show/Revised_Protocol_on_Shared_Watercourses_-_2000_-_English.pdf。

²⁵² 同上，第 3(6)条。

²⁵³ 同上，第 4(2)(a)条。

²⁵⁴ 参见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Institut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Report from the Expert Meeting on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Helsinki, 2015 年 9 月 14 至 15 日)，第 2.3.4 段：“据强调，军队提供了落实此项工作的一个机会，因为将环境保护纳入军事框架，可以对该系统产生巨大后续影响，而不产生大笔费用。拟订军事和文化规范的时机已成熟。一个可能的具体措施是在在用于确定攻击目标的数据库中对所有世界遗产所在地都注上不得攻击的标记。”

²⁵⁵ 同上，第 2.3.4 段。

152. 因此，提出关于获取和分享信息的以下原则草案：

原则草案三-5

获取和分享信息

为加强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各国和各国际组织须依照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准许获取并分享信息。

B.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惯例

153. 本节将讨论前几节未述及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惯例的若干形式。这类惯例通常很难细分，例如细分为关于规划一项行动的惯例和关于结束一项行动的惯例。因此，本节提及了一些筹备措施。其目的是介绍国家和国际组织为防止和减轻环境破坏采取了何种相对较新的办法。

和平协定

154. 现代和平协定通常载有关于保护或管理环境和相关自然资源的条款。此类条款各不相同，有的可能仅是予以鼓励，有的可能规定当事方肩负合作义务，有的也可能详细规定主管部门应当如何处理环境有关事务，如防止环境犯罪和实施本国法等。关于自然资源和分享社区资源的规定往往地位突出。意在结束非国际武装冲突的协定通常包含环境保护条款，似乎少有协定完全不含此类条款。下文列举的和平协定实例大多数是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和平协定。

155. 一些现代和平协定述及有关环境事务的责任分配问题。萨尔瓦多政府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签署的《1992 年查普尔特佩克协定》规定，国家民警局环境司应“负责防止和打击破坏环境的犯罪和过失行为”。²⁵⁶ 1998 年的《北爱尔兰和平协定》(《耶稣受难节协定》)是另一例子。其中包括了多方谈判达成的一项一致意见，即农业、环境、水产养殖和海洋事务可纳入北-南合作领域。还指出，联合王国政府将加速进展，尽快“为北爱尔兰制定新的区域发展战略……以保护和加强环境”。²⁵⁷ 1999 年《科索沃和平与自治临时协定》(《朗布依埃协定》)载有的临时宪法规定了哪些主管部门应负责环境保护工作。²⁵⁸ 该临时宪法规定，议会应负责在涉及市镇间问题的情况下保护环境，同时各市镇应负责保护市镇环境。²⁵⁹ 2000 年《阿鲁沙布隆迪和平与和解协定》²⁶⁰ 多处提到保护环

²⁵⁶ 1992 年 1 月 16 日，萨尔瓦多政府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在墨西哥城签署的和平协定(查普尔特佩克协定)(A/46/864, 附件；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peacemaker.un.org/elsalvador-chapultepec92>),第二章。其他规定见附件二，第 13 条。

²⁵⁷ 1998 年 4 月 10 日在贝尔法斯特签署的《北爱尔兰和平协定》(《耶稣受难节协定》)，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peacemaker.un.org/uk-ireland-good-friday98>,第 20 页。

²⁵⁸ 见 S/1999/648, 附件。

²⁵⁹ 同上，第 14 和 25 页。

²⁶⁰ 2000 年 8 月 28 日在阿鲁沙签署的《阿鲁沙布隆迪和平与和解协定》，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peacemaker.un.org/node/1207>，见第 62 页第 12(3)(e)条和第 81 页第 8(h)条。

境，其中一处规定情报部门的任务之一是“尽早发现任何威胁国家生态环境的因素”。²⁶¹ 此外，该协定指出，“分配或划拨新土地的政策应考虑到需要通过保护森林来保护环境和管理国家水系”。²⁶²

156. 2003 年《刚果人政治谈判最后文件》多处提及保护环境及其自然资源。²⁶³ 其中一项决议专门处理“关于重建遭战争破坏的环境的争端”问题。²⁶⁴ 鉴于 1994 年大批卢旺达难民的出现以及 1996-1997 年和 1998 年的战争破坏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生态系统和生活环境，该决议要求并建议“在过渡议会内设立一个特别特设调查委员会，且如有必要，请国家和国际专家参加，以查明遭破坏地点，评估损害程度，厘清责任，查明肇事者和受害者，确定补偿和赔偿的性质和数额”。²⁶⁵ 该决议还要求并建议国际社会承认“刚果民主共和国环境遭破坏状况属世界级灾难。”²⁶⁶ 《最后文件》的第 23 项决议专门处理设立环境紧急方案一事。²⁶⁷

157. 2005 年苏丹共和国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苏丹人民解放军签署的《全面和平协定》载有若干关于管理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条款。该协定特别规定，在环境管理、养护和保护方面，国家政府和州政府拥有并行的立法和行政职权。²⁶⁸

158. 2006 年《达尔富尔和平协议》明确侧重三个方面：分享财富、解决环境退化问题的必要性以及执行可持续发展原则。²⁶⁹ 其中包括开发、管理和规划土地和自然资源。²⁷⁰ 2008 年《朱巴和平协定》包括乌干达共和国政府与上帝抵抗军/

²⁶¹ 同上，《第三议定书》，第 62 页第 12(3)(e)条。

²⁶² 同上，《第四议定书》，第 81 页第 8(h)条。

²⁶³ 载于《最后文件》所附 36 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见 2003 年 4 月 2 日在太阳城签署的《刚果人政治谈判最后文件》，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peacemaker.un.org/drc-suncity-agreement2003>。

²⁶⁴ 同上，DIC/CEF/03 号决议，第 40 至 41 页。

²⁶⁵ 同上，第 41 页。

²⁶⁶ 同上。

²⁶⁷ 同上，第 23 页。DIC/CHSC/03 号决议，第 62 至 65 页。要求刚果当局设立环境紧急方案，以恢复动植物群，尤其是在国家公园、禁猎地等保护区；确保国家公园、禁猎地等保护区的安全；净化城市和农村环境；防止侵蚀和塌方；恢复生态和生态系统，为此更有效地管理人口迁徙；归还非法出口的物种，保护濒危物种；维护刚果民主共和国极其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清除相关农村地区的地雷。

²⁶⁸ 见苏丹共和国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苏丹人民解放军签署的《全面和平协定》第五章，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peacemaker.un.org/node/1369>，第 71 页。其他例子见第三章第 45 页，其中规定指导原则是“遵循在可持续利用和管理自然资源方面的最著名做法”(第 1.10 段)。其他关于石油资源的规定见第 3.1.1 和 4 段。

²⁶⁹ 2006 年 5 月 5 日在阿布贾签署的《达尔富尔和平协议》，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peacemaker.un.org/node/535>，第 2 章，第 21 页，第 17(107)(g)(h)条。

²⁷⁰ 同上，第 30 页，第 20 条。

运动签署的《全面解决办法协定》。²⁷¹ 其中关于乌干达北部和东北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节指出当地冲突造成这些地区环境严重退化，并认为“应采取措施恢复并可持久地管理环境。”²⁷²

159. 还有一些协定规定了如何管理自然资源，而未直接提及环境保护。例如，1999 年的《洛美和平协定》载有关于战略矿产资源的規定。²⁷³

160. 上述例子表明，环境因素已成为和平协定的公认一部分。因此拟议下列原则草案：

原则草案三-1 和平协定

鼓励冲突各方在和平协定中解决因武装冲突受损害的环境的恢复和保护相关事项。

部队地位协定和特派团地位协定

161. 部队地位协定是指东道国与在其领土上驻扎军队的另一国家之间缔结的协定。部队地位协定与租赁协议有些类似。²⁷⁴ 关于环境问题的规定很少列入部队地位协定。同时，应当指出，许多部队地位/特派团地位协定包含尊重当地法律的义务。部队地位协定涵盖特定时限，从短期临时部署到长期部署，长短不一。旧的部队地位协定往往包含豁免条款，例如免除撤离后清理的责任。不过这一点很可能会改变，以反映外国国家一旦撤离驻地或一旦终止协定即有责任妥善恢复当地环境。德国和北约其他国家之间的协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该协定不仅明确规定德国环境法适用于德国设施上的所有活动，而且还就环境损害索赔作出了明确规定。²⁷⁵ 澳大利亚的部队地位协定也载有类似规定。²⁷⁶ 美国和菲律宾 2014 年签署的名为《加强防务合作协定》的新协定是另一好的实例，尽管该协定超出了部队地位协定的范围。与 1947 年协定不同的是，该新协定包含了关于环

²⁷¹ 2007 年 5 月 2 日乌干达共和国政府与上帝抵抗军/运动在朱巴签署的《全面解决办法协定》，可在下列网址查阅：www.beyondjuba.org/BJP1/peace_agreements.php。

²⁷² 同上，第 10 页，第 14.6 段。

²⁷³ 《塞拉利昂政府和革命联合阵线和平协定》(S/1999/777，附件)，第七条。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peacemaker.un.org/sierraleone-lome-agreement99>。

²⁷⁴ Dinah Shelton and Isabelle Cutting, “If You Break It, Do You Own I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egal Studies*, vol. 6 (2015), p. 1 at p. 25.

²⁷⁵ 1959 年 8 月 3 日签署、1971 年 10 月 21 日和 1993 年 3 月 18 日修订的《补充北大西洋公约缔约国部队地位协定的关于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外国军队的协定》(《北约部队地位协定的补充协定》)，(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481 卷)，第 262 页。

²⁷⁶ 《美国驻澳大利亚部队地位协定》(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469 卷)，第 12(7)(e)(-)条。

境和人类健康的条例。²⁷⁷ 美国与菲律宾的这一协定在许多方面涉及环境内容。其环境条款侧重于防止环境破坏。除了规定适用的法律和标准，该协定还规定了审查程序。欧洲安全和防卫政策下的特派团地位协定多次提及环境义务。²⁷⁸ 另一显示部队地位协定缔约方正在考虑环境因素的事实是，最近美国和日本签署了用于补充双方的部队地位协定的《部队地位协定环境说明》，其中载有更严格的环境标准。²⁷⁹ 另一相关例子是美国与伊拉克的协定明确载有如下环境保护条款：

“双方执行本协定的方式应有助于保护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与安全。美国重申承诺在为执行本协定而落实相关政策的过程中，尊重适用的伊拉克环境法律、条例和标准。”²⁸⁰

各国家和国际组织尚未直接向特别报告员提供关于其特派团部队地位协定或部队地位协定现状的资料。不过许多协定都可通过公开渠道获得。

原则草案一-3

部队地位协定和特派团地位协定

鼓励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将关于环境法规及责任的条款纳入其部队地位协定或特派团地位协定。此种条款可包括防止措施、影响评估、恢复和清理措施。

安全理事会决议

162. 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继续述及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第二次报告介绍了安全理事会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相关惯例。²⁸¹ 因此，本节所述仅限于安全理事会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2 日期间的惯例。²⁸²

²⁷⁷ Shelton 和 Cutting, 前注 274, 第 27 和 28 页。

²⁷⁸ Aurel Sari, “Status of Forces and Status of Mission Agreements under the ESDP: The EU’s Evolving Practi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9, No.1(2008), p.67. 康科迪亚部队地位协定第 9 条规定, 部队有义务尊重国际规范, 尤其是关于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规范。见 Sari, *atp*.89。

²⁷⁹ 新闻稿见 www.pacom.mil/Media/News/tabid/5693/Article/620843/us-japan-sign-environmental-clarification-of-status-of-forces-agreement.aspx. See supplement to the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Facilities and Areas and the Status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in Japan, United States-Japan (11 UST 1654, TIAS No. 4510)。

²⁸⁰ 2008 年 11 月 17 日在巴格达签署的《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拉克共和国关于美国部队撤出伊拉克及其在伊拉克暂时驻留期间活动的组织的协议》，第 8 条。

²⁸¹ A/CN.4/685, 第 83 和 84 段。关于在伊拉克-科威特战争背景下通过的决议和随后设立的联合国赔偿委员会，见本报告第二.B 节。

²⁸² 截至 2015 年 1 月 1 日，安全理事会共通过了 2195 项决议，其中 242 项(即 11%)以某种方式述及自然资源。

163. 在这一期间通过的 76 项决议中，许多决议继续述及非法贸易、开采和走私自然资源以及偷猎野生生物问题。这些决议以不同方式表明了上述行径与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之间的联系。²⁸³ 安理会继续强调必须有效管理自然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和平与安全。²⁸⁴ 2015 年通过的决议并未直接述及保护环境。

164. 许多决议继续述及非国家行为体，但并未提及其在国际法中的地位。²⁸⁵

165. 安全理事会时常指出自然资源被用于助长和资助恐怖行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行为的情形。²⁸⁶ 此前第二次报告也提及了这一惯例。但是，本节不讨论这类惯例，因为它不在本专题范围之内。还应补充的是，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若干述及清除地雷的重要性的决议。

166. 总之，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2 日通过的决议延续了第二次报告所述既有模式。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方案

167. 联合国许多部门、基金和方案及专门机构参与了能够影响环境或旨在重建和恢复受损环境的冲突后措施。初步报告曾指出，秘书长设立了“绿动联合国”倡议，旨在使其成为内部环境可持续管理方案。²⁸⁷

168. 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的报告指出，“还应通过改进在全球和当地的宣传，并提高本组织对环境影响的承诺，增强[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影响和积极存在”。²⁸⁸ 为响应这一呼吁，秘书长特别于 2015 年 9 月任命了一名环境与和平行动特别顾问。

169. 2014 年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指出，联合国秘书处的维持和平行动部与外勤支助部为各行动制定了一项联合环境政策，其中规定各行动有义务编写环境基线研究报告和遵守若干多边环境协定。²⁸⁹ 该政策还规定，各特派团在制定环境目标和程序时，应当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斯德哥尔摩宣言》）、《世界大自然宪章》、《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拉

²⁸³ 例如，见安全理事会第 2196(2015)、2198(2015)、2217(2015)、2237(2015)、2253(2015)和 2262(2016)号决议。

²⁸⁴ 例如，见安全理事会第 2202(2015)、2210(2015)、2237(2015)、2239(2015)和 2198(2015)号决议。

²⁸⁵ 例如，见安全理事会第 2196(2015)、2211(2015)、2217(2015)和 2262(2015)号决议。

²⁸⁶ 例如，见安全理事会第 2198(2015)、2199(2015)、2210(2015)、2212(2015)、2213(2015)、2233(2015)、2249(2015)、2253(2015)和 2255(2015)号决议。

²⁸⁷ 见 A/CN.4/674，第 44 段。

²⁸⁸ A/70/95-S/2015/446，摘要。

²⁸⁹ 见 A/CN.4/674，第 43 段。

姆萨尔公约》等条约和文书作为标准加以考虑。此外，该政策指出，各特派团应利用国际环境条约、环境规范及在联合国商定的标准所提供的实用信息，制定最低标准，实现自身环境目标。此外，该政策还提及了能源、水和废物管理、野生动物和植物以及文化和历史资源管理。²⁹⁰

170. 国际和平行动的环境影响从行动的规划阶段一直延伸至整个执行阶段，还涵盖了行动后阶段。最佳目标是国际行动应不留下任何负面的环境足迹。这正是与一国参与国际或非国际武装冲突情况的不同之处：武装冲突总会留下环境足迹，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

171. 而当国际组织经安全理事会授权或应一国邀请开展行动时，情况则不同。一方面，该组织不仅应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还应遵守该组织各部门制定的政策标准。另一方面，国际行动需要目标和能力不一的内部和外部行为体共同开展合作。参与国际行动的各国自身可能有各种环境标准。

172. 多种行为体(例如维和人员、人道主义机构、流离失所者和当地居民)的存在本身就对环境产生了压力。脆弱环境可能承受相当大的累积效应和压力。同时，由于几乎无法厘清关于环境恶化的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因此可能出现的局面是“无人对累积环境足迹负责”。²⁹¹

173. 因此，建议在两项原则草案中具体阐述参与和平行动的各国家和组织应当如何确认和补救这类行动的负面环境影响；一项原则草案针对防止工作，另一项原则草案针对和平行动结束时的审查工作。

原则草案一-4

和平行动

参与和平行动的各国和各组织须考虑这些行动对环境的影响，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减轻和补救其负面的环境后果。

原则草案三-2

冲突后环境评估和审查

[……]

2. 和平行动结束后随即进行的审查应查明、分析并评价这些行动对环境造成的任何有害于环境的影响，以努力在今后行动中减轻或补救这些有害影响。

²⁹⁰ 见 www.un.org/en/peacekeeping/issues/environment/approach。

²⁹¹ Annica Waleij and Birgitta Liljedahl, “The Gap between Buzz Words and Excellent Performance: The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Actors in Crises and Conflict Settings” FOI-R-4246-SE (2016), p. 2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74. 自 1999 年以来,环境署一直参与实地环境评估和旨在加强受冲突和灾害影响国家的环境管理能力的各项努力。这意味着环境署需要确定冲突和人类健康、生计及安全风险造成的环境影响等。由于环境署的工作对于了解冲突后环境措施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简要提及环境署的任务规定并介绍其相关工作。

175. 环境署的总任务规定是,促进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酌情建议相关政策,并提供一般政策准则以指导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的各项环境方案。²⁹² 依照理事会和最近成立的联合国环境大会的相关决议,这一任务有所调整。²⁹³ 当前任务包括促进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执行国际商定的规范和政策。²⁹⁴ 环境署的一份报告建议,委员会对关于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现行国际法进行审查,并就如何对其加以澄清、编纂和扩展提出建议。²⁹⁵

176. 环境署的另一任务是“研究制订旨在减轻军事活动所造成破坏的法律机制的可行性”。²⁹⁶ 相关问题包括消除有害环境的军用武器装备和恢复受军事活动破坏的环境。²⁹⁷ 还鼓励环境署与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以便在武装冲突时期保护某些指定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地区”。²⁹⁸

177. 环境署应联合国系统和会员国吁请对武装冲突的环境后果进行公正评估。在此方面分配给环境署的第一项任务是确定 1999 年的科索沃冲突在多大程度上给人类健康造成了损害和风险。秘书长请环境署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对环境和人类住区所受影响联合开展独立、科学评估。评估侧重与冲突有关的五大影响:工业场址遭轰炸造成的污染、多瑙河受到的损害、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受到的损害、对人类住区的影响以及贫化铀武器的使用。评估还审议了现行的环境管理法律和体制框架以及国家的实施和执行能力。

²⁹² 1972 年 12 月 15 日大会第 2997(XXVII)号决议。

²⁹³ 应当指出,2013 年,理事会实现普遍会员制,改名为联合国环境大会,以反映继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之后环境署发挥的更大作用。见 2013 年 3 月 13 日大会第 67/251 号决议。另见 2012 年 12 月 21 日大会第 67/213 号决议,第 4(a)和 4(b)段,其中论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之后环境署的更大作用和普遍会员制。

²⁹⁴ 环境署,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第 19/1 号决议,《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用和任务的内罗毕宣言》,1997 年 2 月 7 日(UNEP/GC.19/34),见 3(a)、3(b)和 3(c)。

²⁹⁵ 参见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报告(A/66/10)附件 E 所载专题提纲以及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初步报告 A/CN.4/674,第 8 段。另见环境署,《武装冲突期间的环境保护:国际法概述与分析》(内罗毕:环境署,2009 年),第 53 页。该报告由环境署和环境法学会联合编写。

²⁹⁶ 这项任务源于蒙得维的亚方案四。自 1982 年起,环境署环境法方面的活动以“环境法发展和定期审查蒙得维的亚方案”为基础。蒙得维的亚方案四(订于 2009 年)有一节专门论述环境保护与军事活动,其目标是“减少或减轻军事活动对环境的潜在有害影响,并鼓励军事部门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见 UNEP/GC/25/INF/15,D(f)。

²⁹⁷ 关于蒙得维的亚方案的一般资料,见 www.unep.org/delc/MontevideoProgramme。

²⁹⁸ UNEP/GC/25/INF/15, D(d)(三)。另见 UNEP/Env.Law/MTV4/MR/1/5,第 160 段。

178. 为进行评估,环境署成立了巴尔干工作队。²⁹⁹ 对实地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利用流动实验室分析实地样本,并以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分析作为补充。环境署的最后报告详述了冲突对环境的影响,同时提出了消除风险,建设治理能力的建议。³⁰⁰

179. 环境署继设立灾害与冲突次级方案后,目前在四个主要领域开展工作。第一,应各国政府的请求,环境署通过开展深入的实地工作、进行实验室分析以及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进行冲突后环境评估。除对科索沃冲突进行环境评估外,环境署还评估了多个国家的武装冲突和危机造成的环境影响,这些国家包括中非共和国、阿富汗、尼日利亚、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乌克兰、苏丹、塞拉利昂、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黎巴嫩、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拉克、黎巴嫩、卢旺达和索马里。³⁰¹ 通过评估发现武装冲突对环境造成的重大影响,并就如何降低风险,提高国家的环境管理能力向国家当局提出独立的技术性建议。其次,环境署通过实地项目办公室管理危机后的环境复原,其目标是“支持受冲突和灾害影响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³⁰² 第三,环境合作促进建设和平方案一直在通过建立全球证据资料库,在整个联合国系统进行联合政策分析以及促进在这一领域采用良好做法等途径,帮助联合国系统和会员国了解并利用环境与自然资源在冲突和建设和平中的作用。³⁰³ 第四个领域是降低灾害风险,³⁰⁴ 但因不属于本专题的核心范围,所以不在这里讨论。

180. 尽管武装冲突刚刚结束时,有关武装冲突期间和之后环境状况的可靠、中立的技术资料(例如协助补救、恢复和复原工作的基线数据)尤其重要,但往往缺乏这些数据。³⁰⁵ 灾害与冲突次级方案应有关政府的请求,可对冲突后环境进行

²⁹⁹ 巴尔干工作队包括来自联合国 6 个机构、19 个国家和 26 个科学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国际专家以及当地的顾问。

³⁰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索沃冲突:对环境和人类住区造成的后果”(1999 年),可在下列网址查阅: <http://postconflict.unep.ch/publications/finalreport.pdf>。

³⁰¹ 见环境署网站上关于危机后环境恢复的资料,可在下列网址查阅: www.unep.org/disastersandconflicts/CountryOperations/UNEPsCurrentActivities/tabid/54617/Default。

³⁰² 同上。

³⁰³ 见环境署,《论自然资源在冲突和建设和平过程中的作用:环境署环境合作促进建设和平方案提供的进展简述》(内罗毕:环境署,2015 年)。

³⁰⁴ 见环境署网站了解关于降低灾害风险的资料,可在下列网址查阅: <http://www.unep.org/disasterandsandconflicts/Introduction/DisasterRiskReduction/tabid/104159/Default.aspx>。

³⁰⁵ 例如见 David Jensen and Steve Lonergan(eds.), *Assessing and Restoring Natural Resources in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New York: Earthscan, 2012), 第 128 页。最近赫尔辛基一次关于武装冲突时保护环境问题专家会议的成果报告建议环境署应专门、系统地关注环境评估后的后续措施,消除严重的环境危险,防止造成进一步的人道主义影响,见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Institut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Report from the expert meeting held in 2015 年 9 月 14 至 15 日), chap.4(3)。

评估,此外,还可就资源调解、采掘业和在资源管理方面促进性别平等等问题提供技术信息和咨询,帮助缓解这一信息短缺问题。其他项目包括环境署与世界银行合作,应脆弱国家和受冲突影响国家,即“g7+”集团的要求,³⁰⁶解决受冲突影响国家的这一信息差距问题。其中的一项举措是开发一个采掘业的开放数据平台,把权威的采掘数据合并到一个单一平台,为用户提供开放数据许可证,协助社区协商和以参与方式监测惠益分享协定和环保表现。³⁰⁷

181. 环境署继续通过最近关于资源敏感性争端解决调解人最佳做法指南³⁰⁸和题为“妇女与自然资源:发掘建设和平的潜能”的报告等途径,提高在与环境、自然资源和冲突有关事项上的能力,其中报告显示了减轻环境退化、公平获得基本资源与增强妇女权能之间的联系。³⁰⁹

182. 虽然冲突后环境评估所提建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环境署提供的技术信息和咨询显然还是产生了影响。例如,根据环境署提出的科索沃冲突评估结果,2000年至2002年的三个人道主义呼吁都列有环境需求。对阿富汗的环境评估结果反映于国家恢复计划(“保障阿富汗未来”)以及共同国家评估和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中,且自然资源管理和复原被列为全国重建和发展的一项主要优先事项。³¹⁰应鼓励这些国家继续与环境署合作,并利用环境署在武装冲突后环境评估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专门知识。

183. 联合国环境大会2016年5月23日至26日在内罗毕举行的第二届会议通过了关于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地区环境的决议,其中强调,“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保护环境,特别是在武装冲突,且在冲突后期间必须对环境加以恢复。”³¹¹环境大会吁请所有会员国在武装冲突局势中执行有关保护环境的适用国际法,并考虑同意接受其他相关国际协议的约束。还敦促各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相关国际义务……”环境大会请环境署执行主任“继续与

³⁰⁶ 7国+集团是一个“国际政府间组织,负责为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提供一个集体声音,为摆脱脆弱性和冲突开辟道路,并使各国能够相互学习如何实现复原力并使成员国之间相互支持。”更多信息可查阅7国+集团网站<http://www.g7plus.org/en>。

³⁰⁷ 见Map X信息材料,Map X,“Mapping and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Extractive Industries”,可在下列网址查阅:www.mapx.io/data/brochure_map_x.pdf。

³⁰⁸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联合国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妇女与自然资源:发掘建设和平的潜能”(2013年)。可在下列网址查阅:www.undp.org/content/dam/undp/library/crisis%20prevention/WomenNaturalResourcesPBreport2013.pdf。

³⁰⁹ 同上,第15页。

³¹⁰ 例如,见David Jensen and Steve Lonergan(eds.), *Assessing and Restoring Natural Resources in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New York: Earthscan, 2012)第26至27页(regarding Kosovo) and 第31页(regarding Afghanistan)。

³¹¹ UNEP/EA.2/L.16/Rev.1。

国际法委员会互动，根据委员会的请求向其提供相关资料，支持其在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方面开展的工作”。³¹²

184. 联合国环境大会的这一决议是自联合国大会 1990 年代通过关于保护环境各项决议以来首次通过此类决议。³¹³ 该决议非常重要，原因如下。该决议的基本主旨是鼓励各国认识到武装冲突时期为子孙后代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即代际方法)。该决议还强调国际法在武装冲突所有阶段的相关性以及国家之间及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开展合作的重要性。该决议除请环境署执行主任继续向受武装冲突影响国家和处于冲突后局势国家提供更多援助外，还请执行主任尽快向环境大会汇报情况。

185. 尽管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却具有重要的实际影响，因为该决议强调国际合作，还就环境署今后工作向执行主任提出了明确的指令。

186. 因此，有人建议应列入一项原则草案，具体写明参与冲突后行动的国家和组织应如何在这些问题上开展合作。原则草案的案文现拟如下：

原则草案三-2

冲突后环境评估和审查

1. 鼓励各国及前武装冲突各方相互合作，并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以便实施冲突后环境评估及复原措施。

[……]

C. 法律案件和判决情况

187. 如上所述，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判例不算很多，但确实存在。第二次报告全面审查了国际和区域法院和法庭的判例。³¹⁴ 所作分析力求找出符合下列条件的现有案例法：(a) 适用了国际人道主义条约法中直接或间接规定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条款；(b) 明示或默示地认为武装冲突与保护环境之间存在联系。此外还审查了涉及各民族和平民处境的案件。

188. 本报告审查了国际、区域、国家法院和法庭的相关判例，以查明适用或讨论了在武装冲突后(直接或间接)保护环境的国际法条款的案件。

189. 审查重点是审议有关以下方面的案件：恢复和补救具有重大环境意义的地区；直接或间接军事活动伤害造成的环境损害；武装冲突后环境退化对人权和土

³¹² UNEP/EA.2/L.16。

³¹³ 见 A/66/10，附件 E，第 10 至 12 段。

³¹⁴ A/CN.4/685，第 92 至 119 段。

著人民权利条款造成的影响以及对这些条款的援引，特别是在有关补救和恢复工作方面。

190. 分析主要包括彻底审查下列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判决和咨询意见：国际法院、常设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另外还研究了三个区域法院，即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美洲人权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很多，必须作出选择，以便将审查限定在最相关的案件。除上述各法院的判例外，该审查还审议了纽伦堡军事法庭和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相关判例。还审查了美国、联合王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内法院裁决的案件。³¹⁵ 该审查还审议了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的某些报告、太平洋核试验所涉法律问题的某些方面以及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偿委员会审理的一些案件。

191. 未发现常设国际法院、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及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法院有相关案例法。

192. 在此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若干国际法庭的规约规定法庭有权起诉侵害财产罪和/或破坏环境罪。³¹⁶ 但这些法庭有权施行的刑罚大多仅限于监禁(而不是补救等)，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法庭很少审议武装冲突后的环境保护问题。³¹⁷

³¹⁵ 但未发现联合王国、法国或意大利的法院有相关案例法。

³¹⁶ 例如见：《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 8 条(“1. 本法院对战争罪具有管辖权……2.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战争罪”是指……(b)……(四)故意发动攻击，明知这种攻击将附带造成平民伤亡或破坏民用物体或致使自然环境遭受广泛、长期和严重的破坏，其程度与预期得到的具体和直接的整体军事利益相比显然是过分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3 条(“国际法庭应有权起诉违反战争法和惯例的人。违反行为应包括……(b) 无军事上之必要，横蛮地摧毁或破坏城市、城镇和村庄；(c) 以任何手段攻击或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d) 夺取、摧毁或故意损坏专用于宗教、慈善事业和教育、艺术和科学的机构、历史文物和艺术及科学作品；(e) 劫掠公私财产。”)；设立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法第 6 条(“特别法庭应有权审判所有犯下或下令实施严重违反 1949 年 8 月 12 日内瓦四公约行为的嫌疑人，如对这些公约条款保护的人或财产施行下列行为……非出于军事必要性，非法和肆意毁坏和严重破坏财产的行为……”)；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规约第 5 条(“特别法庭有权起诉根据塞拉利昂法律犯有以下罪行的人……b. 与肆意破坏财产行为有关罪行……：一. 放火烧毁住宅-房屋……二. 放火烧毁公共建筑和……其他建筑……”)。另一方面，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的情况不同，该法庭的判例讨论破坏财产时的唯一目的是确立灭绝种族罪(例如，见检察官诉 Elizaphan 和 Gérard Ntakirutimana 案，审判分庭，判决和判刑，案件号 ICTR-96-10 & ICTR-96-17-T，2003 年 2 月 21 日，第 334 和 365 段)。

³¹⁷ 例如，见：《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 77 条(对于被判实施本规约第五条所述某项犯罪的人，本法院可以判处下列刑罚之一：(a) 一定年限的有期徒刑……；或(b) 无期徒刑……除监禁外，法院还可以命令：(a) 处以罚金，处罚标准由《程序和证据规则》规定；(b) 没收直接或间接通过该犯罪行为得到的收益、财产和资产……”)；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24 条(“审判分庭判处的刑罚只限于监禁……除监禁外，审判分庭可以下令把通过犯罪行为，包括用强迫手段获得的任何财产和收入归还其合法所有人。”)；以及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规约第 19 条(“对于被定罪的人……，审判分庭应判处一定年限的有期徒刑……除判处徒刑外，审判分庭可以下令没收非法所得或犯罪行为所得的财产、收益和任何资产，并下令归还其合法所有人或塞拉利昂国”)。

193. 正如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所强调的，很难区分保护环境本身和保护自然环境中的自然物体和自然资源。³¹⁸ 事实上，“环境”可以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财产”，明确区分二者很难。此外，人权与土地和资源所有权之间的关系常常也很密切。

国际性法院的判例

194. 在有关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一案中，国际法院必须做出裁决的一个问题是，乌干达非法开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自然资源是否侵犯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主权。法院最终裁定，有充分证据表明，乌干达人民国防军(乌国防军)人员抢劫、掠夺、开采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自然资源，并认定乌干达对这些行为负国际责任，因此有义务做出赔偿。³¹⁹ 关于赔偿问题，法院的裁决是：“由于当事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赔偿问题应由法院解决，并为此目的保留该案件的后续程序。”2015年7月9日，法院决定再次启动有关赔偿问题的诉讼，并确定了提交书面诉状的时限。³²⁰ 这一阶段的诉讼仍在进行中。

195. 国际法院在《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中指出，修建隔离墙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³²¹ 法院裁定，必须作出赔偿。³²² 国际法院进而重申国际常设法院在 *Chorzów* 工厂案中的一项结论：“赔偿必须尽可能消除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尽最大可能将情况恢复至未发生这一行为时的样子。……”。³²³ 法院最终得出结论称：“因此，以色列有义务归还为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而没收任何自然人或法人的土地、果园、橄榄园和其他不动产。确实无法从物质上恢复原状的，以色列有义务补偿有关人员遭受的损害。法院认为，以色列还有义务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规则，补偿所有因隔离墙的修建而遭受任何形式物质损害的自然人或法人。”³²⁴

区域人权法院的判例

196. 美洲人权法院一直在积极处理对因武装冲突后环境退化而侵犯人权和土著人民权利提出的索赔。*Plan de Sánchez* 屠杀诉危地马拉案涉及危地马拉军队成员

³¹⁸ A/CN.4/685，第96段。

³¹⁹ 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判决，《2005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242、245、250段。

³²⁰ 同上，第259段。

³²¹ 《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2004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33段。

³²² 同上，第152段。

³²³ 同上，见 *Chorzów* 工厂案(德国诉波兰)咨询意见，常设国际法院，A辑，1927年，第9号，第47页。

³²⁴ 同上。

及在军队保护下参与屠杀的文职同伙屠杀 Plan de Sánchez 村 268 名玛雅土著社区居民，摧毁他们的家园和财产。³²⁵ 这一案件中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攻击期间造成的财产损失导致该地区的土壤肥力下降，整个社区收获和销售的作物减少，收入微薄。³²⁶

197. 在 Ituango 屠杀诉哥伦比亚一案中，法院认为：“焚烧 El Aro 的房屋严重侵犯了对民众来说必不可少的一个物件。纵火和破坏 El Aro 人民家园的目的是制造恐慌，造成他们流离失所，以便在对哥伦比亚游击队战斗中获得领土……因此，摧毁房屋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物质财富损失，而且是居民的社会参照基准丧失，因为其中一些居民一辈子都住在这个村子里。除构成重大财务损失外，房屋遭破坏造成居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这意味着此案中的侵犯财产权属特别严重的情况。……基于以上，法院认为，准军事团体与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协作盗窃牲畜和摧毁家园的行为构成了严重剥夺财产使用权和享有权利的行为。”³²⁷ 关于补偿，法院认为，虽然许多受害者在他们的财产被准军事团体摧毁后流离失所，但法院“不会裁决向丧失了家园和流离失所的人进行金钱补偿，因为将以其他非金钱形式赔偿他们受到的损失”。³²⁸

198. X ákmok K ásek 土著社区诉巴拉圭案虽未涉及武装冲突，但却与本报告具有相关性。巴拉圭 X ákmok K ásek 土著社区的成员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权利主张，要求国家退还已成为私人所有财产的祖传土地。法院全面讨论了土著财产权利以及对环境不利活动可能对人民产生的危害。³²⁹ 法院始终强调土著人民与他们的土地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并最终认定，巴拉圭侵犯了该社区的集体财产权。³³⁰ 法院裁定，巴拉圭必须归还土地并支付补偿。若土地所有权成为武装冲突中的一个问题，那么该案件中使用的措辞可能有助于理解土著人民或其他人民同相关土地间的法律关系。

199. Rio Negro 屠杀诉危地马拉案涉及屠杀、破坏和焚烧 Rio Negro 社区的财产。法院审议了自然资源遭破坏对土著社区的影响问题。法院注意到土著人民与其土地之间的特殊关系，并认定：“依照《美洲人权公约》第 1(1)条，危地马拉对因违

³²⁵ Plan de Sánchez Massacre v. Guatemala, Judgment (Reparations), Case No. C-116, 2004 年 11 月 19 日，第 73 至 74 和 80 段。

³²⁶ 同上，第 9 页。

³²⁷ Ituango Massacres v. Colombia, Judgment (Preliminary Objections, Merits, Reparations and Costs), Case No. C-148, 2006 年 7 月 1 日，第 182 至 183 段。

³²⁸ 同上，第 375 段。

³²⁹ X ákmok K ásek Indigenous Community v. Paraguay, Judgment, Case No. C-214, 2010 年 8 月 24 日，第 282 至 284 和 321 段。

³³⁰ 同上，第 85、86、112、113、281 段和第 315-325 段。

反该公约第 22(1)条而给 Rio Negro 屠杀事件的幸存者造成的损害负有责任。”³³¹ 鉴于这些及其他违法行为，法院下令对受害者予以损害赔偿。

200. 在 El Mozote 和邻近地点屠杀诉萨尔瓦多案中，美洲人权法院认为：“武装部队不仅违法使用和享用霍拉州 El Mozote 村、Cerro Pando 州 Ranchería 村、Los Toriles 村和 Jocote Amarillo 村居民的房屋及房屋内的财物，且纵火烧毁这些房屋及房屋内的财物，还构成滥用和任意干涉私人生活和家庭……因此，法院裁定，萨尔瓦多国未能遵守禁止任意或肆意干涉私人生活和家庭的规定。”³³² 据此以及其他调查结果，法院命令：“国家必须实施有利于此案受害者的社会发展方案”，而且“为促进向被迫从原籍社区流离失所的受害者提供赔偿……国家必须保证提供充分条件，使愿意回返的流离失所受害者能够永久返回其原籍社区。”³³³

201. 从卡卡里卡河流域流离失所(Genesis 行动)的非洲裔社区诉哥伦比亚案是美洲人权法院处理的最后一个相关案件。法院在此案中解释了土著民族成员的财产权，并指出：“《公约》第 21 条保护土著和其他部落民族或社区……与他们的土地以及与祖传领地自然资源及与这些有关的非物质要素之间的紧密关系。”³³⁴ 法院还认为，由于“土著和部落民族成员与其领地间的这一内在联系，保护他们拥有、使用和享用这一领地的权利是确保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³³⁵

202. 法院最终裁定：“剥夺卡卡里卡河流域社区集体财产属非法行为；此外，有证据表明，当局未能保护集体财产权，即使它们通过一些实地访问知道正在发生非法利用该流域社区集体财产的情况。在此方面，国内行政或司法补救办法未能有效予以纠正。”³³⁶ 因此，土著社区受到了伤害，而由于土著社区与他们的土地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伤害愈加严重。³³⁷ 法院下令国家必须恢复土著人民对这些领地的使用、享用和拥有，并向他们提供一定的保证。³³⁸

203. 欧洲人权法院一直在积极处理土地等财产损害的索赔补偿案件。在 Akdivar 等人诉土耳其案中，除其他外，原告称，安全部队强迫他们搬离村子，毁坏他们

³³¹ R ó Negro Massacres v. Guatemala, judgment (preliminary exception, merits, reparations and costs), Case No. C-250, 2012 年 9 月 4 日，第 184 段。

³³² Massacres of El Mozote and neighboring locations v. El Salvador, Judgment (Merits, Reparations and Costs), Case No. C-252, 2012 年 10 月 25 日，第 182 段。另见第 195 段。

³³³ 同上，第 339 和 345 段。

³³⁴ Afro-Descendant Communities Displaced from the Cacarica River Basin (Operation Genesis) v. Colombia, Judgment, Case No. C-270, 2013 年 11 月 20 日，第 346 段。另见第 252 至 254 段。

³³⁵ 同上，第 346 段。

³³⁶ 同上，第 356 段。

³³⁷ 同上，第 459 段。

³³⁸ 同上，第 459 至 461 段。

的房屋，因此必须补偿所造成的损失。原告声称遭受了房屋、耕地、家庭的财产和牲畜损失而导致的损害。法院认定：“房屋若有记录，应根据专家提出的房屋地面面积依照专家建议的每平方米基准费率裁定补偿。法院还认定应对余下的房屋适当裁定补偿。但由于缺乏确定这些房屋面积的证据，任何计算方法都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定程度的推断。”³³⁹

204. Selçuk 和 Asker 诉土耳其案涉及安全部队在土耳其东南部烧毁房屋。原告要求对房屋、耕地、家庭财产、牲畜和一个磨坊损失造成的损害予以金钱补偿。他们还要求支付寻找其他住处所花费的费用。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裁定既要补偿金钱损失，又要补偿非金钱损失。³⁴⁰

205. 在 Esmukhambetov 等人诉俄罗斯案中，原告要求对空袭击中 Kogi 村，打死数人，摧毁房屋、牲畜和作物造成的损害作出金钱和非金钱补偿。法院在处理原告面临的提供有关被毁财产的文件的实际问题时认为“必须考虑到事件发生时相关财产物项的平均价格，公平地裁定向每个原告补偿与此相等的数额。”³⁴¹ 但关于补偿多个地块的索赔要求因缺乏证据而被驳回。³⁴² 原告的非金钱损失也获裁定予以补偿。³⁴³

国际刑事法庭的判例

206. 国际刑事法庭判决的某些案件也与本报告具有相关性，例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检察官诉 Naser Orić 案，检察官诉 Ante Gotovina 等人案。虽然这些案件未讨论武装冲突后的环境保护问题，但它们讨论了一项规则，即军事必要性原则不能成为战斗已经停止后发生的损害和破坏的理由。³⁴⁴ 纽伦堡军事法庭在

³³⁹ Akdivar et al. v. Turkey, Judgement, Application No. 99/1995/605/693, 1998 年 4 月 1 日, 第 18 段。另见下列案件: Azize Menteş et al. v. Turkey,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58/1996/677/867, 1998 年 7 月 24 日; 和 Salih Orhan v. Turkey, Chamber,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25656/94, 2002 年 6 月 18 日。

³⁴⁰ Selçuk and Asker v. Turkey, Judgement, Application No. 12/1997/796/998-999, 2008 年 4 月 24 日, 第 106、118 至 119 段。

³⁴¹ Borambike Dormalayevna Esmukhambetov et al. and Others v. Russia, Judgment, Application No. 23445/03, 2011 年 9 月 15 日, 第 206、108 至 211 段。

³⁴² 同上, 第 208-211 段。

³⁴³ 同上, 第 214-216 段。

³⁴⁴ 检察官诉 Naser Orić, 审判分庭, 判决, IT-03-68-T 号案件, 2006 年 6 月 30 日, 第 588 段;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IT-95-11-T 号案件, 检察官诉 Milan Martić, 审判分庭, 判决, IT-95-11-T 号案件, 2007 年 6 月 12 日, 第 93 段; 检察官诉 Ante Gotovina 等人, 审判分庭, 判决(第二卷, 共二卷), IT-06-90-T 号案, 2011 年 4 月 15 日, 第 1766 段。又见 IT-98-34-T 号案件, 检察官诉 Mladen Naletilic 等人, 审判分庭, 判决, IT-98-34-T 号案件, 2003 年 3 月 31 日, 第 589 段, 其中法庭指出, “因为破坏是在实际炮击停止后发生的, 军事必要性无法作为其理由。”

检察官诉 Hermann Wilhelm Göring 等人案中，审理了若干在武装冲突期间犯下但在冲突结束后造成长期环境影响的行为的例子。³⁴⁵

国内法院的判例

207. 美国国内法院已经处理过重要环境区的恢复和补救问题。美国诉壳牌石油案中的一个情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生产高辛烷航空燃料的一些石油公司自 1942 年 6 月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地点倾弃酸废物副产品。航空燃料对打赢战争至关重要，美国政府积极监督了其生产。在 1990 年代，联邦政府对该地点进行了清理，并起诉这些倾弃酸废物的石油公司，以收回清理费用。这些公司则称，倾弃的发生是为了应对一场针对美国的“战争行为”。对石油公司的论点，即因为污染是“战争行为”造成的，所以它们免于赔偿责任，地区法院予以驳回，但认为石油公司不承担清理费用的赔偿责任。上诉法院确认了这一点。³⁴⁶

208. 此外，美国一些法院的判例处理的是军事活动所造成的破坏对环境的损害。橘色剂案涉及越南一些国民和一个组织针对据称因美国在 1965 年至 1971 年越南战争期间使用橘色剂和其他除草剂而对他们和他们的土地造成的损害提出的索赔。法院驳回了这一案件，认为原告的任何索赔要求均没有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认为，在美国使用时，根据国际法，橘色剂不被视为有毒之物。³⁴⁷

209. 上诉法院在 Vietnam Association for Victims of Agent Orange v. Dow Chem. Co.案中确认了上述判决，并最终否认被告可被追究对橘色剂造成的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后对该案又进行了一次复核，确认了这一决定。原告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求书，要求最高法院审理此案。2009 年 3 月 2 日，最高法院驳回了复审令，拒绝复审上诉法院作出的判决。³⁴⁸

210.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07 年以来，美国为补救橘色剂所造成的环境损害和健康问题作出了贡献。³⁴⁹ 特别是，已拨给美国国际开发署资金用于补救这一损害。这是通过一些旨在清理“二恶英热点”的项目进行的，这些热点地区包括如岷港

³⁴⁵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Vol. 1(Nuremberg, 1947), pp. 58, 59, 60, 239-240 and 297.

³⁴⁶ United States v. Shell Oil Co., 294 F.3d 1045, 1060 (9th Cir. 2002)。

³⁴⁷ Vietnam Association for Victims of Agent Orange/Dioxin et al. v.Dow Chemical Co. et al.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Memorandum, Order and Judgment of 28 March 2005, 373 F. Supp. 2d 7 (2005), affirmed in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cond Circuit Decision of 22 February 2008, 517 F.3d 76 (2008), pp. 186, 119-124, 127-130, 132, 134, 138。

³⁴⁸ Vietnam Association for Victims of Agent Orange v. Dow Chemical Company, 517 F.3d 104, 119-20 (2d Cir. 2008)。

³⁴⁹ 见 Michael F. Martin(13 November 2015), Congressional Research Initiative。

机场环境补救项目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如 Bien Hoa 空军基地。³⁵⁰ 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在受橘色剂污染地区开展了许多残疾方案。³⁵¹

211. *Corrie v. Caterpillar* 案处理的是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地带后的局势，在占领期间以色列国防军用履带式推土机拆毁巴勒斯坦领土内的房屋。原告各家庭的十七位成员在这些拆毁过程中被杀或受伤。最后，法院驳回了这一案件。³⁵² 就该项决定提出的上诉也被驳回。³⁵³

212. 美国也有一些法院判例所处理的索赔案情况是，索赔人认为，武装冲突后的环境退化构成对人权和土著人民权利的侵犯。在 *Beanal v. Freeport-McMoRAN, Inc* 案中，印度尼西亚的一位部落首领就两家美国公司在印度尼西亚运营露天铜、金和银矿而对其提起诉讼。该案件提交法院审理时，被告提出驳回索赔的请求。虽然在该案中似乎没有发生持续冲突，但原告声称，被告的安全警卫“同第三方联合”进行了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和破坏财产行为。³⁵⁴ 虽然法院最初认定原告有资格提出环境索赔，³⁵⁵ 但法院最终驳回了环境索赔，因为美国《外国人侵权法》没有为提出这种索赔提供充分的依据。³⁵⁶ 后对这项决定提出了上诉，但上诉的结果是维持原判。³⁵⁷

马绍尔群岛核试验：索赔和提交美国法院的案件

213. 1946 年 6 月 30 日至 1958 年 8 月 18 日期间，美国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 67 次核试验。³⁵⁸ 这些核试验在美国和在马绍尔群岛引起了索赔要求和法律程序。联合国将索赔定性为战争和战后索赔。³⁵⁹

³⁵⁰ 同上，第 10 和 13 页。

³⁵¹ 同上，第 12 页。

³⁵² *Corrie v. Caterpillar, Inc.*, 403 F. Supp. 2d 1019, 1023-27(W.D. Wash. 2005) affirmed in *Corrie v. Caterpillar, Inc.*, 503 F.3d 974 (9th Cir. 2007) pp. 8 and 16.

³⁵³ *Corrie v. Caterpillar, Inc.*, 503 F.3d 974, 982 (9th Cir. 2007) para. 982.

³⁵⁴ *Beanal v. Freeport-McMoRan, Inc.*, 969 F. Supp. 362, 368-69 (E.D. La. 1997) affirmed in *Beanal v. Freeport-McMoran, Inc.*, 197 F.3d 161 (5th Cir. 1999) 197 F.3d 161 (5th Cir. 1999) p. 369.

³⁵⁵ 同上，第 368 页。

³⁵⁶ 同上，第 370 和 383 至 384 页。

³⁵⁷ *Beanal v. Freeport-McMoran, Inc.*, 197 F.3d 161(5th Cir. 1999)。

³⁵⁸ 试验发生在比基尼和埃尼威托克环礁。Nuclear Claims Tribunal Report to the Nitijela of the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Fiscal Year 1992, appendix A。布拉沃试验 1954 年 3 月 1 日发生在比基尼岛，是美国当时有史以来最大的氢炸弹爆炸。核爆炸云飘散物很多，影响到其他环礁和岛屿，如乌蒂里克和朗格拉普。

³⁵⁹ 《联合国年鉴》(1982)第 1 部分，第 3 节，第 3 章，见第 1280 页。历年的联合国年鉴见下列网址：<http://unyearbook.un.org>。

214. 第一次试验后不久，根据安全理事会和美国之间的一项协定，马绍尔、卡罗琳和马里亚纳岛链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战略托管领土，由美国负责行政管理。³⁶⁰ 托管于 1990 年终止，马绍尔群岛共和国于 1991 年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215. 为了履行其义务，管理当局，除其他外，有权在这些领土上建立海军、陆军和空军基地。³⁶¹ 管理当局的责任包括有义务“保护居民之健康”和“保护居民之土地与资源，以免损失”。³⁶² 试验方案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包括造成一些岛屿彻底消失；其他一些岛屿部分消失；一些居民须重新安置，并造成巨大的搬迁之苦；一些居民受到高辐射；普遍的放射性污染致使一些岛屿未来无限期地无法为人类使用。³⁶³ 托管理事会十分清楚其对土地和人类的影响。³⁶⁴ 在 1954 年所谓的布拉沃试验之后，来自马绍尔群岛十多个环礁的 100 多位当选领导人要求试验应立即停止，或至少应采取预防措施。而托管理事会的反应却是支持继续试验，尽管须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两年后于 1956 年又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且这一次同时还要求对比基尼岛和埃尼威托克岛人民予以补偿。³⁶⁵ 同年晚些时候，美国给予了第一份赔偿，以现金方式和通过一个信托基金支付。³⁶⁶ 托管理事会重申早先关于 1954 年试验的决议，并建议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防止任何危险，立即解决比基尼和埃尼威托克居民就他们因核试验而迁离其岛屿一事提出的所有有理由的索赔，补偿因进一步核武器试验而须暂时撤离的家庭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³⁶⁷ 继美国国会作出有关决定后，又支付了进一步的补偿。1978 年为比基尼人民设立了一个 600 万美元的特别信托基金。后又陆续设立了其他一些补偿和重新安置信托基金。美国还采取措施，清理和复原埃尼威托克。

³⁶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经国际联盟授权，该群岛由日本占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群岛被美国占领控制。在其 1947 年 4 月 2 日第 21(1947)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将原先由日本经授权占据的这些群岛指定为一战略区，并将之置于《联合国宪章》所建立的托管制度之下。

³⁶¹ 安全理事会第 21 (1947)号决议，第 5 条，第 1 款。

³⁶² 同上，分别见第 6 条，第 2 和 3 款。

³⁶³ *People of Bikini, ex rel. Kili/Bikini/Ejit Local Gov. Council v. United States*, 77 Fed. Cl. 744, 749 (2007), affirmed in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cond Circuit decision of 29 January 2009; 554 F.3d 996 (Fed. Cir. 2009) at p. 749.

³⁶⁴ 这一点反映在《联合国年鉴》的记录之中，例如，见《联合国年鉴》(1954)，第 359 页(托管理事会的运作)。历年的联合国年鉴见下列网址：<http://unyearbook.un.org>。

³⁶⁵ 见《联合国年鉴》(1956)第 1 部分，第 3 节，第 4 章，具体见第 365 页。历年的联合国年鉴见下列网址：<http://unyearbook.un.org>。

³⁶⁶ 为比基尼岛民提供的 25 000 美元现金和 30 万美元信托基金。美国提供了资料，说明赔偿总额，该资料题为“美国在马绍尔群岛核试验的后果和辐射照射”，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majuro.usembassy.gov/legacy.html>。

³⁶⁷ 《联合国年鉴》，前注 365，第 365 页。

216. 1981 年，比基尼人民第一次对美国政府提起集体诉讼。此外，数千名马绍尔岛民提出个人诉讼(人身伤害补偿)。美国索赔法院法官 Kenneth Harkins 1987 年驳回这些诉讼。³⁶⁸ 法官 Harkins 认定的事实在法院后来的案件中获得采信和重申。³⁶⁹

217. 应当回顾，马绍尔岛和美国之间所谓的《自由联系条约》于 1986 年生效。³⁷⁰ 该条约有关于核试验补偿的专门一节，即第 177 节，其中规定，美国政府接受对核试验方案造成的马绍尔群岛公民财产或人身损失损害的补偿责任。两国商定，美国将为“公正和适当地解决关于马绍尔群岛及其公民已出现但尚未得到补偿的或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索赔”提供补偿。为此目的，1987 年设立了核索赔法庭。³⁷¹ 法庭以马绍尔群岛法律运作，处理三大类索赔：个人伤害索赔、财产损失索赔(例如，丧失土地使用、环境恢复)和因困难而造成的损失。

218. 2006 年，在比基尼环礁上拥有土地权的马绍尔群岛居民对美国提起了另一项集体诉讼，指控美国违反其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而征用原告索赔的财产，违反信托责任和义务并且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热核炸弹试验而违反了事实上的默示合同。比基尼人民案被称为 1980 年代该法院审理的诉讼的“复活”，之所以向该美国法院提出该案，是因为核索赔法庭无法全额支付其裁决的损失。该案涉及马绍尔群岛岛民的土地权和财产权。³⁷² 最后，联邦巡回法院认定，未能确定案情实质，并驳回案件。

联合国赔偿委员会

219. 在这方面，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的报告也具有相关性。³⁷³ 该委员会 1991 年由安全理事会设立，作为安理会的一个附属机构，负责处理为因伊拉克入

³⁶⁸ Giff Johnson, *Nuclear Past, Unclear Future* (Majuro: Micronitor News and Printing Company, 2009), pp.20 and 23. *People of Bikini, ex rel. Kili/Bikini/Ejit Local Gov. Council v. United States*, 77 Fed. Cl. 748-749 (2007) p. 748.

³⁶⁹ *People of Bikini, ex rel. Kili/Bikini/Ejit Local Gov. Council v. United States*, 77 Fed. Cl. 748-749 (2007) pp. 748-749.

³⁷⁰ 2004 年对该条约进行了修正。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Amendments Act of 2003, Pub. L. No. 108-188, 117 Stat. 2720;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Compact, as Amended, Now Implemented* (May 4, 2004)。密克罗尼西亚和美国之间以及帕劳和美国之间也缔结了类似的自由联系条约。

³⁷¹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sect. 177 (b)-(c)。

³⁷² *People of Bikini, ex rel. Kili/Bikini/Ejit Local Gov. Council v. United States*, 77 Fed. Cl. 744, 749 (2007) pp. 744-745 and 748.

³⁷³ A/CN.4/685, 第 81 段。

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导致的损失索赔并支付补偿款。³⁷⁴ 安理会重申,“伊拉克按照国际法,应负责赔偿因其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对外国政府、国民和公司造成的任何直接损失、损害(包括环境的损害和自然资源的损耗)和伤害”。³⁷⁵

220. 安全理事会在设立该委员会的有关决议中再次重申了伊拉克按国际法对这些损失应付的责任。委员会不是一个“法院,也不是各方对簿的仲裁庭;它是一个政治机构,主要负责核实赔偿要求、核实其确实性、评估所受损失、估计偿付数额和解决争议的赔偿要求等调查职务”。³⁷⁶ 委员会在安全理事会的权力下履行其职能。³⁷⁷

221. 委员会收到大约 269 万项索赔,索赔金额约 3 525 亿美元,覆盖因伊拉克 1990 至 1991 年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造成的死亡、伤害、财产损失或损坏、商业索赔和环境损害索赔。委员会就 150 万项成功的索赔,裁决向 100 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共赔付了 524 亿美元(相当于索赔要求数额的 15%)。³⁷⁸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数量如此之多、价值如此之大的索赔,在国际索赔解决史上还没有先例。

222. 在五份关于所谓的“F 4”类索赔的报告中,专员小组建议赔付,支付以下七类之中的若干索赔:输送和扩散污染、损害文化遗产、损害海洋和沿海资源、损害陆地资源(包括农业和湿地资源)、损害地下水资源、使人离开伊拉克或科威特以及损害公众健康。

223. 专员小组的许多报告值得本报告参考。在关于第一批“F 4”类索赔的报告中,³⁷⁹ 小组回答了下列问题:“监测和评估环境损害和自然资源损耗的研究方案、研究项目和程序的费用是否能……定为‘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损耗’”?。

³⁷⁴ 关于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的信息,可在下列网址查阅: www.uncc.ch/home。关于该委员会工作的概述,见 Cymie R. Payne and Peter H. Sand (eds.), *Gulf War Reparations and the UN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³⁷⁵ 安全理事会第 687 (1991)号决议, E 节, 第 16 段。

³⁷⁶ S/22559, 第 20 段。这意味着造成赔偿责任的原因是伊拉克违反了诉诸战争权法的规则,而不是违反了战时法的规则。安全理事会第 692(1991)号决议第 3 段根据秘书长的报告第一部分(其中包括第 4 段,但不包括第 20 段),设立了委员会。

³⁷⁷ 委员会由理事会、索赔专员小组和秘书处组成。理事会是委员会的决策机构,其成员与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是其附属机构)成员相同。由三名专员组成的小组处理索赔。处理这些索赔的专员是法律、会计、损失调整、保险和工程等各领域的独立专家。技术专家和顾问则协助小组对索赔进行核实和估价。

³⁷⁸ 见委员会的网站,网址: www.uncc.ch/what-we-do 和 www.uncc.ch/summary-awards(上一次查阅时间: 2015 年 11 月 30 日)。

³⁷⁹ S/AC.26/2001/16。第一批“F 4”类索赔包括 107 项索赔,覆盖监测和评估环境损害、自然资源枯竭、监测公众健康和开展医疗普查以调查和应对增加的健康风险等。

小组指出：³⁸⁰ “监测和评估索赔是在就任何实质性索赔的可赔性作出决定之前审查的……因此，在审查索赔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证明由于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发生了环境损害或自然资源损耗。”小组进一步指出，³⁸¹ “监测和评估活动的目的是，使索赔人查找证据，证明是否确实发生了环境损害并确定所造成损失的数量范围”。小组还就如何确定是否对监测和评估活动予以补偿的问题，提出了考虑。^{382、383}

224. 在关于第二批“F 4”类索赔的报告中，³⁸⁴ 委员会认为：“伊拉克不能仅仅因为其它因素可能造成了所涉损失或伤害而免除赔偿入侵和占领直接造成的损失或损害的责任。索赔人索赔的任何环境损害或损失是否由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事件直接造成，将依据就每项损失或损害提供的证据而定”。³⁸⁵ 委员会裁决对损害予以赔偿。³⁸⁶

225. 在关于第三批“F 4”索赔的报告中，³⁸⁷ 小组处理了科威特的一项指称，即由于伊拉克部队引爆油井，超过 1 亿桶原油被释放到环境中并点燃，燃烧数月，污染了土壤、建筑物，并造成含水层的损害。含水层的损害有一部分是因为科威特在占领结束后试图灭火而使用了海水。此外，因建造军事要塞、布设和排除地雷以及军事车辆和人员流动，也使沙漠土壤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小组认定，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每项索赔应承担损害赔偿，以补偿科威特的补救措施。³⁸⁸ 小组认定，环境损害系直接因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所致，科威特提议的某些补救损害的方案是合理的。³⁸⁹

226. 沙特阿拉伯声称，其海岸线因有人将油桶故意排入波斯湾以及由于除排入石油外还有油污污染物被排入波斯湾而遭受损害。伊拉克认为，海岸线损害不仅仅是由于 1991 年的事件，而是由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早已结束后的石油排

³⁸⁰ 同上，第 25 段。

³⁸¹ 同上，第 29 段。

³⁸² 同上，第 30 段。

³⁸³ 同上，第 31 段。

³⁸⁴ S/AC.26/2002/26。第二批“F 4”类索赔所赔付的是下列措施的费用：采取措施处理因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导致的相关情况，即减少和防止环境破坏，清理和恢复环境，监测和评估环境损害和监测据称公众健康风险。

³⁸⁵ 同上，第 25 段。

³⁸⁶ 同上，第 66 至 72 段、96 至 98 段、107 至 117 段、160 和 178 段。

³⁸⁷ S/AC.26/2003/31。第三批“F 4”类索赔是为支付清理和恢复据称直接因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受损害的环境而已采取或将采取的措施引起的开支。

³⁸⁸ 同上，第 74、98 和 99 段。

³⁸⁹ 同上，第 36、38、60 和 167 段。

放造成的。³⁹⁰ 小组认定，“从科威特边界到阿布阿里岛之间海岸线的石油污染损害属于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造成的直接环境损害，对此类损害做出补救的方案构成合理的清理和恢复环境措施。”³⁹¹

227. 在关于第四批“F 4”类索赔的报告中，³⁹² 小组认为：“伊拉克不能仅仅因为其它因素可能造成了所涉损失或伤害而免除赔偿损失或损害的责任。索赔人索赔的任何环境损害或损失是否由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事件直接造成，将依据就每项损失或损害提供的证据而定”。凡证据显示，损害是由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直接造成的，但其他因素也助成了要求赔偿的损害，即对其他此种助成因素给予应有的考虑，以便确定对于直接归咎于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造成的损害相适宜的赔偿额。³⁹³ 委员会裁决应对损害进行赔偿。³⁹⁴

228. 在关于第四批“F 4”类索赔第二部分的报告中，小组指出：“凡证据显示，损害是由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直接造成的，但其他因素也助成了要求赔偿的损害，即对其他此种助成因素给予应有的考虑，以便确定对于直接归咎于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造成的损害相适宜的赔偿额。”³⁹⁵ 委员会裁决应对损害进行赔偿。³⁹⁶

229. 在关于第五批“F 4”类索赔的报告中，³⁹⁷ 小组确定可受理“纯环境损害”，即，对无商业价值的环境资源的损害引起的赔偿要求，并认为，对暂时不能使用这种资源的情况应予赔偿。³⁹⁸ 小组还确定，各国政府可要求因对公众健康的损害，如具体类别居民或一般人口的不利健康影响损失或费用(而不仅仅是“监测公众健康”和进行“医疗普查”的费用)而获得赔偿。³⁹⁹ 小组还讨论了生境等效分析法，这种方法用于依据有关资源在因战争而损害之前提供的生态服务丧失情况而确定补偿性恢复措施的性质和程度。小组认定：“凡是索赔人要求为其裁

³⁹⁰ 同上，第 169 至 193 段。

³⁹¹ 同上，第 178 段。

³⁹² S/AC.26/2004/16。第四批“F 4”类索赔是为支付清理和恢复据称直接因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受损害的环境而已采取或将采取的措施引起的开支。

³⁹³ 同上，第 39 和 40 段。

³⁹⁴ 同上，第 158 至 189、247 至 299 和 301 至 319 段。

³⁹⁵ S/AC.26/2004/17(2004)，第 36 段。如上所述，第四批“F 4”类索赔是为支付清理和恢复据称直接因伊拉克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受损害的环境而已采取或将采取的措施引起的开支。

³⁹⁶ 同上，第 58 至 131 段。

³⁹⁷ S/AC.26/2005/10(2005)。第五批“F 4”类索赔是要求补偿包括文化遗产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损害或耗竭；清理和恢复受损害环境的措施；以及对公众健康的损害。

³⁹⁸ 同上，第 57 页。

³⁹⁹ 同上，第 68 和 71 段。

定赔偿以便采取补偿性恢复措施的情况，小组都审议了索赔人是否充分证明初态恢复措施未能或不会充分补偿损失。只有在所具备的证据证明即便在采取初态恢复措施之后仍然存在或可能存在未得到补偿的损失的情况下，才建议给予赔偿。”⁴⁰⁰ 委员会裁决对损害予以赔偿。⁴⁰¹

230. 总之，可以指出的是，在许多案例中，赔偿委员会批准对为确定这些类别下潜在损害程度而进行的评估和监测活动予以补偿。历次报告作了一些重要区分。对邻近伊拉克和科威特冲突地区的国家和不在冲突地区的国家进行了明确区分。例如，科威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均获裁决对其直接接触伊拉克行动所释污染物而导致的索赔予以补偿。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则以接触据称被盛行风吹到叙利亚领土的空气传播污染物为由提出索赔。委员会驳回了许多此类索赔，但裁决补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监测科威特石油大火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的措施。

231. 在第一份报告中约旦的所有索赔均涉及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对环境的影响。⁴⁰² 委员会裁决对所有这些索赔予以补偿，包括补偿难民的水消耗对湿地的间接损害。⁴⁰³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赔委员会

232.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赔委员会审理的索赔，凡涉及武装冲突期间造成的环境损害赔偿，则具有相关性。《阿尔及尔协定》结束了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于 1998 年至 2000 年期间发生的国际武装冲突，并设立了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赔委员会。⁴⁰⁴ 委员会的任务是：

通过具有约束力的仲裁，决定……关于损失、破坏或伤害的索赔，这些索赔涉及(a) 《框架协定》、《协定执行方式》和《停止敌对行动协定》所要解决的冲突，以及(b)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包括违反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的行为，或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⁴⁰⁵

⁴⁰⁰ 同上，第 82 段。

⁴⁰¹ 同上，第 102 至 118 段、353 至 366 和 443 至 456 段。

⁴⁰² 见 S/AC.26/2001/16，第六节。

⁴⁰³ 同上。

⁴⁰⁴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政府与厄立特里亚国的协定》(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38 卷)(《阿尔及尔协定》)，第 1 条。详见 Sean Murphy, Won Kidane and Thomas Snider, *Litigating War: Arbitration of Civil Injury by the Eritrea-Ethiopia Claims Commiss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

⁴⁰⁵ 《阿尔及尔协定》，前注 404，第 5 条。

233. 委员会已经注意到，在冲突期间进行的涉及战斗和占领情况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对两国环境的大范围破坏。⁴⁰⁶ 厄立特里亚没有向委员会提出环境损害索赔，但埃塞俄比亚提出 10 亿多美元的索赔，以补偿该国各地所受环境损害。⁴⁰⁷

234. 在《部分裁决——中部战线埃塞俄比亚索赔 2》中，委员会认为，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索赔所声称 Mereb Lekhe Wereda 地区受到的环境损害。⁴⁰⁸ 委员会还驳回埃塞俄比亚的索赔所声称 Irob Wereda 地区受到的环境损害，认为：

破坏环境资源的指控和证据远远低于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广泛和长期环境损害赔偿赔偿责任标准。⁴⁰⁹

235. 在《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与厄立特里亚国间的埃塞俄比亚损害索赔案最后裁决》中，大多数的环境索赔涉及所声称阿拉伯树胶和树脂植物的损失，但也包括树木和树苗损失的索赔，以及蒂格雷梯田遭受的损害。⁴¹⁰ 埃塞俄比亚最初还有一项索赔涉及野生生物损失，但后来撤回了这一索赔。⁴¹¹ 埃塞俄比亚声称，该环境损害是由于厄立特里亚违反战时法而造成的，而若不是如此，则也是由于违反诉诸战争权法而造成的。⁴¹² 最终这两项论点均被驳回。⁴¹³ 委员会认定，该国没有举出足够证据证明所声称受损自然资源的位置及其毁坏情况。⁴¹⁴ 所提出的证据也没有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埃塞俄比亚部队或平民也可能对武装冲突期间环境所受的损害起了某种作用。⁴¹⁵ 委员会认为：

鉴于该国索赔额巨大，缺乏支持证据，没有回答关于树木位置的问题，以及对所索赔的损害计算在多方面存在错误，委员会驳回了厄立特里亚就环境损害提起的诉诸战争权法索赔。⁴¹⁶

⁴⁰⁶ Murphy, 前注 404, 第 228 页。

⁴⁰⁷ Murphy, 前注 404, 第 228 页。见 Eritrea-Ethiopia Claims Commission, Partial Award Central Front Ethiopia's Claim 2 between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and the State of Eritrea(The Hague, 28 April 2004)para. 53 and 100; Eritrea-Ethiopia Claims Commission, Final Award Ethiopia's Damages Claims between the Federal Democratic Republic of Ethiopia and The State of Eritrea(The Hague, 17 August 2009) para. 422。

⁴⁰⁸ Ethiopia Partial Award, 前注 407, 第 52 段。

⁴⁰⁹ 同上, 第 100 段。

⁴¹⁰ Ethiopia Partial Award, 前注 407, 第 421 段。Murphy, 前注 404, 第 228 页。

⁴¹¹ Ethiopia Partial Award, 前注 407, 第 422 段。Murphy, 前注 404, 第 228 页。

⁴¹² Murphy, 前注 404, 第 228 页; Ethiopia Final Award, 前注 407, 第 421 段。

⁴¹³ Murphy, 前注 404, 第 228 页; Ethiopia Final Award, 前注 407, 第 425 段。环境索赔在《部分裁决》中也被驳回, 见 Ethiopia Partial Award, 前注 407, 第 53 和 100 段。

⁴¹⁴ Ethiopia Partial Award, 前注 407, 第 423 段。

⁴¹⁵ 同上, 第 423 段。

⁴¹⁶ 同上, 第 425 段。

结论意见

236. 依据环境所受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损害和伤害而形成的判例法其所依赖的是现有国内法、国际和平时环境协定，而且(近年来)也依赖于国际刑事法，主要是《罗马规约》规定的国际刑事法。其他重要的例子来自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等特设进程。这种多样化的模式很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还要继续存在，因为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各国愿意接受一种统括性的环境罪行，如“生态灭绝”罪。虽然生态灭绝这一概念(其描述为故意导致生态系统遭破坏、毁坏或丧失)一直在使用，但尚未纳入国际协定。⁴¹⁷ 战争期间故意毁环境的行为，其描述为“军事生态灭绝”，由于前述原因，这一用语也不会为各国所接受。⁴¹⁸

237. 还有人提议将“危害环境罪”纳入《罗马规约》。赞同者讨论了在将该罪行限于武装冲突阶段问题上的利弊论据，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若试图涵盖范围武装冲突之外的罪行，则会“使法院职权延伸到指定其主要处理的案件以外。”⁴¹⁹

238. 因此提议下列原则草案：

原则草案一-1

实施和强制执行

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通过有效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防止措施，依照国际法加强与武装冲突有关的自然环境保护。

D. 战争遗留物

陆上战争遗留物

239. 武装冲突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要么是各种战争手段和方法直接造成的，要么是敌对行动的一种间接后果。武装冲突对环境的影响往往损害的不仅是环境本身，也会损害受影响地区居民的健康。此外，军事上使用战场以外的土地可能留下一些有害痕迹，使土地不宜供未来平民使用。军事基地也可能产生不利的环境影响，但直到最近这才成为领土国和基地区租赁国的一个关切事项。而部队地

⁴¹⁷ 例如，见 Richard A. Falk, “Environmental Warfare and Ecocide: Facts, Appraisal & Proposals” in Marek Thee (ed.), *Bulletin of Peace Proposals*, vol. 1(1973); Arthur Westing, “Herbicides in Warfare: The Case of Indochina” in Philippe Bordeau, John A. Haines, Werner Klein and C. R. Krishna Murti (eds.), *Ecotoxicology and Climate*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1989), pp. 337 至 357。又见 <http://eradicatingecocide.com/the-law/history-of-ecocide-law/>，内有关于这一概念历史的概述，很有用。

⁴¹⁸ Peter Hough, “Defending Nature: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Restriction of Military Ecocide” *The Global Community –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risprudence*, vol. 1 (2014), p. 137。

⁴¹⁹ Steven Freeland, *Addressing the Intentional De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uring Warfare under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tersentia, 2015), pp. 229 and 230。

位协定中很少载有关于环境管理的规定。虽然受影响的环境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或控制下的区域，也可能是一个国家专属管辖区以外的区域，如公海或国际海底。

240.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区域得到保存而未受不利影响的例子有若干。存在这一区域的情况极少，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区域可能甚至类似于自然保护区，即一个环境保护区。专门用于军事目的的区域，如军事禁区可能属于这种情况。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之间的“非军事区”，往往被称为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的天堂。⁴²⁰

241. 规管武装冲突环境后果的法律规则很少。其中最完善的是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规则。

242. 值得回顾的是，没有“战争遗留物”的法律定义。这一术语已用于大会决议，而未曾试图界定。在早期给环境署的一份报告中，这一表述被称是指在敌对行动停止时的各种遗留物、残留物或未使用或留下的装置。⁴²¹ 报告撰写人 Arthur H. Westing 认为，战争遗留物包括非爆炸装置、未爆陆上地雷、海上地雷和诱杀装置、未爆弹药、铁丝网和锋利金属碎片等材料、坦克残骸、车辆和其他军事设备，以及击沉的军舰和击落的飞机。据该报告，这一用语也被称作“武装冲突结束后留在一领土上的残留物”。⁴²² 直到 2003 年，才通过了一个不完整定义，即“战争遗留爆炸物”一词的定义。后面再讨论这一定义。

243. “遗留物”一词清楚地表明它是指一实际物体，而非实际区域。“遗留物”可移除；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因此，过去谈论战争遗留物质，是合适的，这是当时最常用的措辞。

244. 战争遗留物问题是 1970 年代备受关注的焦点。大会通过了若干决议，处理战争遗留物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问题。当时，各项决议所关涉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殖民战争期间和外国占领局势下使用地雷问题。赔偿责任问题、责任问题和补偿问题是首要问题。在 1975 年通过的第一项决议中，大会请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材料研究战争遗留爆炸物，特别是地雷和环境的影响，并于 1976 年向大会提交一份报告。⁴²³ 环境署提交了一份临时报告，大会也表示注意到

⁴²⁰ 该“非军事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非军事化区域。该区域筑有坚固工事，布满了地雷。

⁴²¹ Arthur Westing (ed.), *Explosive Remnants of War: Mitigating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85); Appendix 8: *Explosive Remnants of War: A Report to UNEP*, p.118. 该研究报告的主要重点是未爆地雷和其他未爆弹药，即可能称为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物件。联合国 1975 年至 1984 年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的活动大事年表见附录 2，第 87 至 89 页。

⁴²² 见 Gabriella Blum, “Remnants of War” in the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12) available at <http://opil.ouplaw.com/view/10.1093/law:epil/9780199231690/law-9780199231690-e390?prd=EPIL>.

⁴²³ 大会 1975 年 12 月 9 日第 3435(XXX)号决议。

这份报告。⁴²⁴ 因此，重点不在于地雷对人类的影响，而是地雷对环境和对土地的影响。鉴于当时的背景，这并不奇怪。首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于 1972 年举行，因而成为一个采取进一步举措的平台。其次，地雷本身并不在武装冲突法所禁之列，仅是限制其使用。⁴²⁵ 显然，地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后武装冲突中的广泛使用显示了其使用的后果。“造成这种情况”的国家被要求“立即补偿那些被布雷的国家所遭受的任何物质和精神损失，并迅速采取措施，提供技术援助，以清除这些地雷”。⁴²⁶ 利比亚、马耳他、埃及、越南等国，以及波兰等一些东欧国家的情况最经常成为国际关注的要闻。⁴²⁷

245. 第二项决议于 1980 年通过。⁴²⁸ 显然，这不是一个法律上可行的处理方式，尽管大会一再试图这样做。⁴²⁹ 最后一项决议，题为“战争遗留物”，于 1985 年通过。大会请秘书长提交一份关于该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没有导致任何进一步行动，因为大会只表示注意到报告。

246. 在大会处理这一问题的那些年里，其重点明显离开了一般战争遗留物而转向地雷及其对发展、生命和财产构成的威胁。保护环境问题本身则处于有关辩论和决议的边缘。重点尤其是地雷，且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其他类型的遗留物也是关注的焦点。法律和政治成果有限，其原因远远不止是由于责任与补偿挂上了钩。

247.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大会几乎与此并行。会议通过了附于《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关于地雷、

⁴²⁴ 大会 1976 年 12 月 16 日第 31/11 号决议，第 1 段。

⁴²⁵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唯一具体针对地雷武器的《公约》是《关于敷设自动触发水雷(第八)公约》，(联合国，《合并条约汇编》，第 205 卷，第 331 页)。该公约的重点是保护非冲突当事方和中立的航运。

⁴²⁶ 大会第 3435(XXX)号决议，第 4 段。

⁴²⁷ 例如，通过由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和利比亚外交研究所组织，于 1981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利比亚土地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物质研讨会。见“战争遗留物”，UNITAR/CR/26(训研所和利比亚国际关系研究所)，可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查阅。值得回顾的是，利比亚的非殖民化被列入大会议程许多年。在这方面，1950 年秘书长被要求“对战事损失问题，与利比亚可能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专门机关及秘书长申请之技术及财政协助事宜一并加以研究”(大会 1950 年 12 月 15 日第 389(V)号决议)。在欧洲委员会中也提出了职责问题，例如，见 Mark Anthony Miggiani, “War remnants: a case study in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Geneva: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1988) (not printed, available at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Geneva), p. 39, note 57。

⁴²⁸ 大会 1980 年 12 月 5 日第 35/71 号决议。

⁴²⁹ 见大会 1981 年 12 月 17 日第 36/188 号决议；1982 年 12 月 20 日第 37/215 号决议；1983 年 12 月 19 日第 38/162 号决议；1984 年 12 月 17 日第 39/167 号决议和 1985 年 12 月 17 日第 40/197 号决议。这些决议均非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第二号议定书)。⁴³⁰ 其中,关于在清除雷场、地雷和诱杀装置方面国际合作的第9条是经谨慎起草的。从本质上讲,该条鼓励各国达成协议。⁴³¹ 该条的目的显然是清除雷区或以其他方式使之失效,不论雷区的布设是否合法。而对责任问题或赔偿责任问题均未提及。

248. 经1996年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经1996年5月3日修正后的《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加强了这一上述相当薄弱的表述,其中规管了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使用。关于“排除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及国际合作”的第10条明确地规定各国义务清除、排除或销毁雷场。该条分配了相关责任(即指明谁应采取行动),而且最重要的是,该条为缔约方之间以及缔约方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并鼓励各方就技术和物质援助达成协议。⁴³²

249. 许多国家及其他论者认为,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规定是不够的。在阿富汗、柬埔寨和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之后,人们越来越关注地雷的人道主义影响。并创造了用语“人道主义排雷行动”和“人道主义排雷”。⁴³³ 该议定书就各种地雷作出了规定。国际社会缓慢但稳步地认识到,杀伤人员地雷造成的威胁将继续存在。在这些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举措推动下,1997年通过了《关于禁止使用、

⁴³⁰ 见《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1342卷,第22495号)(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号议定书)和《常规武器公约》修正案(联合国,《条约汇编》,第2260卷,第22495号。关于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规则概述,见William H. Boothby, *Weapons and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55至194。

⁴³¹ 第9条案文如下:“在积极敌对行动停止后,当事各方应在相互之间,以及在适当情况下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努力就提供关于扫除冲突期间布下的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或使其失效所需的资料和技术及物资援助——包括在适当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达成协议。”

⁴³² 第10条案文如下:

- “1. 在现行敌对行动停止之后,应按照本议定书第3条和第5条第2款立即清除、排除、销毁或维持所有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
2. 各缔约方和冲突各方对其控制区域内的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负有此种责任。
3. 对于一当事方布设在已不再由其控制的区域内的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该当事方应在其准许的限度内向本条第2款所指的控制该区域的一方提供履行此一责任所必需的技术和物资援助。
4. 在一切必要情况下,各当事方应努力在相互之间以及酌情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就提供技术和物资援助、包括在适当时采取履行此项责任所必要的联合行动达成协议。”

⁴³³ 见Lincoln P. Bloomfield, “Detritus of Conflict: The U.S. Approach to the Humanitarian Problem Posed by Landmines and other Hazardous Remnants of War” *Seton Hall Journal of Diplomacy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1 (2003), p.27. 另见哈洛信托会网站上的资料,网址: www.halotrust.org。

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渥太华公约》)。《渥太华公约》是在处理战争遗留爆炸物方面最重要的条约，因为该条约促进了受杀伤人员地雷严重影响的国家的排雷工作。据报，至少 28 个国家已完成了所有其领土上杀伤人员地雷的清除。⁴³⁴

250. 几年之后，2003 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通过了第五号议定书，即《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⁴³⁵ 该议定书于 2006 年生效，现有 87 个缔约国，包括法国、中国、俄罗斯联邦和美国。⁴³⁶ 第五号议定书作出了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定义，其中明确将地雷排除在外。⁴³⁷ 虽然该议定书背后的促成因素是战争遗留爆炸物造成的严重冲突后人道主义问题，但其目的是缔结一项“关于冲突后补救措施的一般性议定书，以便将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危害和影响减至最小。”⁴³⁸

251. 第 3 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和武装冲突当事方对于其控制之下的区域内的所有战争遗留爆炸物负有本条所规定的责任”。对于不在成为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爆炸性弹药的“使用者”控制之下的区域，“使用者”应在现行敌对行动停止后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提供技术、资金、物资或人力等方面的援助，以便利标示、清除、排除或销毁这些战争遗留爆炸物。⁴³⁹ 根据第 5 条，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在其控制下的……区域，使……民用物体不受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危害和影响”。⁴⁴⁰

⁴³⁴ 阿尔巴尼亚、不丹、保加利亚、布隆迪、刚果共和国、哥斯达黎加、丹麦、法国(在吉布提)、冈比亚、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洪都拉斯、匈牙利、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马拉维、黑山、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卢旺达、苏里南、斯威士兰、突尼斯、乌干达、委内瑞拉和赞比亚。在国际禁止地雷运动网站有便于查阅的信息，网址：www.icbl.org/en-gb/finish-the-job/clear-mines/complete-mine-clearance.aspx。该组织进一步通报说，萨尔瓦多 1994 在《禁止地雷条约》通过前便完成杀伤人员地雷清除工作，而德国 2013 年确认，已经消除原先对一前军事训练场存在杀伤人员地雷污染的怀疑。此外，约旦宣布“于 2011 年结束杀伤人员地雷清除工作，但自那以后，它仍然在其领土上发现有杀伤人员地雷”。各国所提交关于公约国家执行情况的报告，见 [www.unog.ch/80256EE600585943/\(httpPages\)/A5378B203CBE9B8CC12573E7006380FA?OpenDocument](http://www.unog.ch/80256EE600585943/(httpPages)/A5378B203CBE9B8CC12573E7006380FA?OpenDocument) 若需查阅最近的一份决议，见大会 2015 年 12 月 5 日第 70/55 号决议。

⁴³⁵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战争遗留爆炸物议定书》(第五号议定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99 卷，第 22495 号。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ldsg_no=XXVI-2-d&chapter=26&lang=en 根据《公约》第 4 条，该议定书开放供所有国家同意接受约束。

⁴³⁶ 交存秘书长的多边条约状况，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s://treaties.un.org/pages/ParticipationStatus.aspx>。

⁴³⁷ 见第 2 条第 1 款的定义，同时参看第 2 条第 4 款。

⁴³⁸ 第五号议定书，前注 435，序言部分第 2 段。参看 A/CN.4/685，第 142 和 143 段。

⁴³⁹ 同上。

⁴⁴⁰ 同上。

252. 在同意接受第五号议定书约束时，美国宣布：“美利坚合众国的理解是，《第五号议定书》将排除在未来关于解决武装冲突或与此有关的援助问题的任何安排，这些安排旨在以尊重第五号议定书基本精神和宗旨的方式分配第 3 条规定的责任。”

253. 即使地雷法规的重点越来越与对人类的保护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法规的效力对保护农业土地和财产产生了直接影响，因为这些法规使土地可供使用。冲突各方有义务在敌对行动结束时消除或以其他方式使地雷对平民无害，这一点可被视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⁴⁴¹ 因此，可能有些令人费解的是，红十字委员会习惯法研究报告中所反映的国家惯例在军事手册、国家法律和其他本国惯例中对环境因素的考虑很有限。在这方面，应当指出，消除地雷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或使之无害的义务已把保护平民作为其主要目标。因此，各国侧重于这一目的。同时，应当回顾，在武装冲突后(该时间点并不一定与现行敌对行动停止的时间点相同)的任何清除地雷或战争遗留爆炸物行动须遵守和平时期的国家和国际环境义务。

254. 上文讨论的各项公约和议定书并不追溯适用，但它们的确清楚地显示了在战争遗留爆炸物所产生的风险问题上更加开明的看法。

原则草案三-3

战争遗留物

1. 在现行敌对行动停止之后须毫不拖延地按照国际法规定的义务，清除、移除、销毁或维护所有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爆炸性弹药和其他装置。
2. 凡必要时，各方须努力相互，以及酌情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就提供技术和物质援助，包括在适当情况下采取必要联合行动履行此类责任，达成协议。

海洋环境中的战争遗留物

255. 武装冲突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武装冲突对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海上倾弃化学弹药和沉船污染造成的影响。鉴于海上化学弹药的环境威胁和后果，各国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已开始在处理这一事项。

256. 大会曾提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成果文件、《21 世纪议程》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并注意到必须提高公众对海上倾弃化学弹药所生废物环境影响

⁴⁴¹ 《红十字委员会习惯法研究报告》规则 83；见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Rules,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关于 2005 年后作出的惯例，可在下列网址查阅：https://www.icrc.org/customary-ihl/eng/docs/v2_rul_rule83。

的认识。⁴⁴² 在这方面，大会曾鼓励“通过面向公众和企业的大型会议、研讨会、讲习班、培训班和出版物自愿分享有关海上倾弃化学弹药所生废物的信息，以减少有关风险”。⁴⁴³

257. 在其第 65/149 号决议中，大会请秘书长就海上倾弃化学弹药所生废物的环境影响问题以及为评估和更好地认识这一问题而可能采取的国际合作方式，征求会员国及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的意见。根据这一要求，秘书长提交了一份报告，题为“为评估海上倾弃化学弹药所生废物的环境影响和提高对此种影响的认识而采取合作措施”。⁴⁴⁴

258. 一些国家和组织，包括欧洲联盟、海事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秘书处裁军事务厅作出了答复。这些答复显示，对海上倾弃化学弹药所生废物相关环境风险的关切日益加深。因此，各国和各组织已采取措施，以减少风险。这主要是通过国际和区域合作以及双边合作进行的。

259. 这实质上反映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结构，因为《公约》没有提供评估和追回损害赔偿的标准，无论造成损害的是一自然人或法人，还是一国。⁴⁴⁵ 这也反映出，战争法下以前并没有具体规则规定参与武装冲突的国家有义务移除战时倾弃的化学武器或弹药。相反，这种倾弃以前被认为是合法和有理由的。对沉没的军舰的态度也与此相同。任何国家都不愿接受对葬身海底有环境危害的船只负责：无论是击沉船只的国家，还是船旗国都不会。视船只沉没位置而定，其他国家，即沿海国也可能遭受影响。当今，我们可能会在并未参与武装冲突的沿海国的管辖区域内发现化学武器、泄漏船只或危险废物。事实上，受影响国在武装冲突之时甚至并不存在。

260. 在这一专题工作期间，若干太平洋区域国家提出了泄漏沉船和倾弃弹药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所产生的船舶残骸的环境影响日益令许多太平洋岛屿国家感到关切。⁴⁴⁶ 2014 年，大会赞同第三次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问题国际会议

⁴⁴² 见大会第 68/208 号决议，第 4 段。

⁴⁴³ A/68/258。在该决议通过后，由立陶宛和波兰安排，2012 年 11 月 5 日在波兰格丁尼亚举行了一次与海上倾弃化学弹药所生废物相关环境影响国际讲习班。目的是推动实施。秘书长被要求向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提交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二次报告(见大会第 68/208 号决议，第 8 段)。

⁴⁴⁴ Thomas A. Mensah, “Environmental damages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in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26 at p. 233.

⁴⁴⁵ 例如，见帕劳的发言(A/C.6/70/SR.25)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书面材料，前注 96。

⁴⁴⁶ 大会第 69/15 号决议，附件。大会还在其年度所谓“海洋法决议”中欢迎《萨摩亚途径》并重申其承诺，即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充分实施《萨摩亚途径》；见大会第 69/245 号决议，第 281 段和第 70/235 号决议，第 294 段。

的成果文件，即《萨摩亚途径》。⁴⁴⁷ 该文件承认“确认人们关切有关国家的沉船可能泄油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造成环境影响”，并指出，除其他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有关船主应继续以双边方式逐案处理这一问题”。泄漏船只和遗留弹药问题不限于许多小岛屿国家的海洋环境，因为它还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健康和潜在经济发展。⁴⁴⁸ 其中一些主要问题包括缺乏基线信息以及不愿意分享信息。后者可能是由于安全问题，或者仅仅是由于倾弃或放置有关材料的人缺乏应有的知识。世界其他区域的情况也是如此。

261. 对太平洋岛屿海洋环境目前面临的威胁，将必须以务实方式处理，而不是从法律角度处理。在倾弃时，禁止倾弃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危险材料的法律规则并不存在或很少。一些太平洋岛屿现在必须依赖其他国家的合作和捐款。

262. 然而，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太平洋岛屿。遗留爆炸物和化学武器及物质的问题要大得多。其他特别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波罗的海和斯卡格拉克海峡。这里的大量废物多为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倾弃(而且常常与运输船只一同倾弃)，当时盟军认为在这里消除其作为德国占领国缴获的物质是适当的。⁴⁴⁹ 即使在倾弃之时这被认为是一合法的解决办法，但现在看待这些爆炸物和武器，其法律环境已经不同。该区域的渔民时常遇上装填有芥子气或水雷的容器——而且通常保存良好，因为该区域的水是微咸水。当时该区域的地位是公海，现在却是一个经明确划界的海区，有 10 个国家在此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因此，弹药所在地区交通很繁忙而且建有水利工程项目，包括海底电缆和管道、离岸风力农场和隧道。各国和运营人知道适用于此类项目的法律是和平时期法(海洋法、环境法，以及欧盟法和各国制定的法律)。国家和企业在运营方面的重点是合作。

263.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化学弹药搜索和评估”项目，该项目于 2011 年启动，是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一个合作项目，由欧盟提供部分资助。⁴⁵⁰ 通过这一项目，已查明大多数弹药位置并绘制了地图。上述信息提供给所有的人自由查阅，对于那些在进行高成本水利技术投资之前需要进行强制性环境评估的公司，这是至关重要的。这项工作有至少两大支柱：一是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赫尔辛基委员会)所做的工作，该委员会是《保护波罗的海地区海洋环境公约》理事机

⁴⁴⁷ 大会第 69/15 号决议，附件，第 56 段：“确认人们关切有关国家的沉船可能泄油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造成环境影响，同时考虑到围绕作为海中墓地的那些船舶存在的敏感问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有关船主应继续以双边方式逐案处理这一问题。”

⁴⁴⁸ 据计算，倾弃于斯卡格拉克海峡的化学武器至少有 170 000 吨，而倾弃于波罗的海的化学武器至少有 50 000 吨。据推测，倾弃于波罗的海的化学武器中装填了约 15 000 吨化学战剂。

⁴⁴⁹ 见该项目网站：<http://www.chemsea.eu/index.php>。

⁴⁵⁰ 见赫尔辛基委员会网站：www.helcom.fi/baltic-sea-trends/hazardous-substances/sea-dumped-chemical-munitions。

构；二是由欧盟提供的资助。自 1990 年代初以来，赫尔辛基委员会已认真处理这一问题。⁴⁵¹

264. 太平洋和波罗的海地区肯定不是唯一受影响的区域。其他区域，如地中海、巴伦支海、大西洋和黑海也受这一问题影响。⁴⁵²

265. 除战争遗留物对自然环境显而易见的威胁外，有关答复及国家惯例中至少还显示了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似乎各国选择将应对这些威胁作为一项环境合作，而非环境赔偿责任或职责。第二，在人类健康与环境威胁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因此，建议一项关于海上战争遗留物的原则草案，案文如下：

原则草案三-4

海上战争遗留物

1. 各国和各国国际组织须合作确保战争遗留物不构成对环境、对公共健康或对海员安全的威胁。
2. 为此，各国和各组织须努力进行海域勘测并使有关信息可供自由查阅。

三. 结语和今后的工作方案

266. 特别报告员提出的三份报告的主要研究结果显示，在加强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一套实质性的法律规则。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这套法律是一个不灵巧的工具，因为其各个部分有时似乎各自为政。有时似乎缺乏一种整体的方法来实施这套法律。此外，没有任何现有或已开发的工具或进程旨在鼓励各国、各国国际组织和其他相关行为体利用这一整套已可适用的规则。

267. 特别报告员提交三次报告所依据的研究、委员会的讨论、在第六委员会中表达的意见以及与国际组织的联系均表明在适用于武装冲突爆发前阶段的法律与适用于武装冲突后阶段的法律之间有着明晰的关联。而如此认为，不应仅仅是因为这是在和平时期局势中适用的一套法律。而也是因为适用于冲突前和冲突后阶段的法律充当着贯穿武装冲突局势的桥梁。此外，和平时期法与武装冲突法在多大程度上并存，这一点并不总是清楚的。在这一背景下愈加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和国际组织往往比其国际法律义务超前一步，即它们自愿选择为保护环境的目的而制定法律或建立其他机制，以规范武装部队行为。

⁴⁵¹ 见赫尔辛基委员会网站：www.helcom.fi/baltic-sea-trends/hazardous-substances/sea-dumped-chemical-munitions。

⁴⁵² 赫尔辛基委员会发布了渔民遇到海上倾弃化学弹药早期阶段准则。若需一份便于查阅的概览，请参看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网址：www.nonproliferation.org/chemical-weapon-munitions-dumped-at-sea/。

268. 这意味着，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已经通过惯例、法律确信、判例法以及条约而不断增长，不断成熟。联合国、环境署和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环境因素已成为主流的一部分，而若我们考虑到十年或更久之前的情况与此多么不同，则会发现这一点尤为突出。

269. 这三次报告试图概述在三个时间阶段，即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适用的法律。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无法涵盖所有重要方面，而特别报告员认为，有一些事项可能值得进一步审议。这些事项包括占领的不同阶段中的环境保护、非国家行为体及有组织武装团体的责任以及非国际武装冲突。各国和各组织不大愿意提交资料说明此类武装团体的惯例，但这一点不应该阻碍委员会进一步研究这些事项。而本报告中的和平协定例子也显示，进一步研究可能是必要的。

270. 今后本专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仍是与联合国、环境署、教科文组织、红十字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机构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的协商和接触。同样重要的是，要继续积极征求各国的意见。

附件一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拟议原则草案

.....

第一部分 防止措施

原则草案一-1 实施和强制执行

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通过有效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防止措施，依照国际法加强与武装冲突有关的自然环境保护。

.....

原则草案一-3 部队地位协定和特派团地位协定

鼓励各国和各国国际组织将关于环境法规及责任的条款纳入其部队地位协定或特派团地位协定。此种条款可包括防止措施、影响评估、恢复和清理措施。

原则草案一-4 和平行动

参与和平行动的各国和各组织须考虑这些行动对环境的影响，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减轻和补救其负面的环境后果。

.....

第三部分 武装冲突后适用的原则草案

原则草案三-1 和平协定

鼓励冲突各方在和平协定中解决因武装冲突受损害的环境的恢复和保护相关事项。

原则草案三-2 冲突后环境评估和审查

1. 鼓励各国及前武装冲突各方相互合作，并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以便实施冲突后环境评估及复原措施。

2. 和平行动结束后随即进行的审查应查明、分析并评价这些行动对环境造成的任何有害于环境的影响，以努力在今后行动中减轻或补救这些有害影响。

原则草案三-3

战争遗留物

1. 在现行敌对行动停止之后须毫不拖延地按照国际法规定的义务，清除、移除、销毁或维护所有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爆炸性弹药和其他装置。
2. 凡必要时，各方须努力相互，以及酌情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就提供技术和物质援助，包括在适当情况下采取必要联合行动履行此类责任，达成协议。

原则草案三-4

海上战争遗留物

1. 各国和各国国际组织须合作确保战争遗留物不构成对环境、对公共健康或对海员安全的威胁。
2. 为此，各国和各组织须努力进行海域勘测并使有关信息可供自由查阅。

原则草案三-5

获取和分享信息

为加强武装冲突有关的环境保护，各国和各国国际组织须依照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准许获取并分享信息。

第四部分

[增列的原则草案]

原则草案四-1

土著人民权利

1. 土著人民在其土地和自然环境方面的传统知识及做法须始终受到尊重。
2. 各国义务与土著人民合作协商，并在因使用他们的土地及领土而可能对土地产生重大影响时，征求他们自由、事先且知情的同意。

附件二

选定书目

Abascal, Christine Stockins. *Protección del medio ambiente en los conflictos armados*. Dissertation.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 Chile, 2009.

Abouali, Gamal. Natural resources under occupation: the status of Palestinian water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Pac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10, No. 2 (1998), pp. 411-574.

Akande, Dapo. Nuclear weapons, unclear law? Deciphering the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8, No. 1 (1997), pp. 165-217.

Al-Shaheen, Shaheen Ali and Rashid Hamad al-Anzi.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durant les conflits armés. *L'observateur des Nations Unies*, vol. 35 (2013), pp. 235-252.

Aust, Anthony. *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cconci, Pia, and others, eds.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ity: Essays in Honor of Judge Flavia Lattanzi* (forthcoming).

Ahlström, Christer. *Demilitariserade och neutraliserade områden i Europa*. Mariehamn: Åland Islands Peace Institute, 1995.

Ajibola, Bola.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Arising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International Law*, Najeeb Al-Nauimi and Richard Meese, ed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95.

Almond, Harry H., Jr. The use of the environment as an instrument of war.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2, No. 1 (1991), pp. 455-468.

Alston, Philip, Jason Morgan-Foster, and William Abresch. The competence of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and its special procedures in relation to armed conflicts: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in the "War on Terror".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9, No. 1 (2008), pp. 183-209.

Anderson, Terry L., and J. Bishop Grewell. The greening of foreign policy. *PERC Policy Series*, vol. 20, 2000.

Antoine, Philippe.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et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n cas de conflit armé.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vol. 74, No. 798 (1992), pp. 537-558.

Anton, Donald K., and Dinah L. Shelt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Arraiza Navas, Fermín Luís, and Pedro J. Varela Fernández. Vieques: prácticas de guerra, derechos humanos y ambiente. *Revista Jurídica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vol. 70, No. 1 (2001), pp. 209-233.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Profesore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Problemas Internacionales del Medio Ambiente: VIII Jornadas, Barcelona, 2 a 5 de julio de 1984*. Bellaterra, Barcelona: 1985.

Austin, Jay. *Conflict-Environment: Questions over Accountability in Kosovo*. Geneva: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November 1999.

Austin, Jay, and Carl E. Bruch, eds.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Baker, Betsy. Legal protections for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3, No. 2 (1993), pp. 351-383.

Banerjee, Rishav. Destruction of environment during an armed conflict and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 legal analysis. In *A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5. B. S. Chimni, M. Masahiro and J. Rehman, eds.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145-188.

Bannelier, Karine. Les enjeux de la guerre aérienne pour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remarques à propos du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Air and Missile Warfare, *Guerre aérienne et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Millet-Devalle, Anne-Sophie, ed. Paris: Pedone, 2015.

_____. L'utopie de la « guerre verte » : insuffisances et lacunes du régime de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n temps de guerre. In *Permanence et mutation du droit des conflits armés*, Vincent Chetail, ed. Brussels: Bruylant, 2013.

Barboza, Julio. *The Environment, Risk and Li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1.

Barned, Ashley, and Christopher Waters. The Arctic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9, J. H. Currie and R. Provost, eds.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1, pp. 213-241.

Bassiouni, M. Cherif. International crimes: *jus cogens* and *obligatio erga omne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59, No. 4 (1996), pp. 63-74.

Bächler, Günther, and Kurt R. Spillman, ed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s a Cause of War: Country Studies of External Experts*. Chur-Zürich: Rüegger, 1996.

Benvenisti, Eyal. Water conflicts during the occupation in Iraq.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7 (2003), pp. 860-872.

Bethlehem, Daniel. The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Study. In *Perspectives on the ICRC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Elizabeth Wilmshurst and Susan Breau,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Birnie, Patricia, Alan Boyle, and Catherine Redgewell.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Björklund, Mikaela, and Allan Rosas. *Ålandsöarnas demilitarisering och neutralisering*. Åbo: Åbo Akademi University Press, 1990.

Black, Cyril E., and others. *Neutr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Blattmann, Heidi. Environmental damage from the Gulf war. *Swiss Review of World Affairs*, vol. 42, No. 3 (1992), pp. 27-28.

Blishchenko, Igor P., and Vladimir P. Shavrov. The legal basis of claims for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resulting from military action.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 40, No. 1 (1989), pp. 29-45.

Blom, Esther, and others, eds. *Nature in Wa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during Conflict*. Leiden: Nederlandse Commissie voor Internationale Natuurbescherming, 2000.

Bloomfield, Lincoln P., Jr. Detritus of conflict: the U.S. approach to the humanitarian problem posed by landmines and other hazardous remnants of war. *Seton Hall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 1 (2003), pp. 27-41.

Blum, Gabriella. Remnants of war. In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Bodansky, Daniel. *Legal Regulation of the Effects of Military Activity on the Environment*. Berlin, Erich Schmidt Verlag, 2003.

Bodansky, Daniel, Jutta Brunnée, and Ellen Hey. *The Oxford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Boelart-Suominen, Sonja Ann Joze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Naval War: The Effect of Marine Safety and Pollution Conventions during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Newport Paper, No. 15.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2000.

Boisson de Chazournes, Laurence. *Freshwater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play between Universal, Regional and Basin Perspectives*.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Water Programme.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09).

Booley, Ashraf, and Letetia van der Poll. In our common interest: liability and redress for damage caused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Law,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vol. 15 (2011), pp. 90-129.

Boothby, William H. *Weapons and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Bothe, Michael. The ethics, 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of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In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Approaches to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Relation to Armed Conflict*, Rosemary Rayfuse, ed. Leiden: Brill, 2014.

_____.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Arising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International Law*, Najeeb Al-Nauimi and Richard Meese, ed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_____.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as a method of warfare: do we need new law? *Disarmament*, vol. 15 (1992), pp. 101-153.

_____.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legal rules, uncertainty, deficiencies and possible developments.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4 (1991), pp. 54-62.

Bothe, Michael, and others.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Report to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J/110/85. 1985.

Bothe, Michael, and others. International law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gap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2, No. 879 (2010), pp. 569-592.

Bothe, Michael, Karl Josef Partsch, and Waldemar A. Solfal. *New Rules for Victims of Armed Conflicts: Commentary on the Two 1977 Protocols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949*. 2nd ed.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3.

Boutruche, Théo. Le statut de l'eau en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No. 840 (2000), pp. 887-916.

Bouvier, Antoine.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naturel en période de conflit armé.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vol. 73, No. 792 (1991), pp. 599-611.

Bruch, Carl. *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Giving Force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in Africa*. 2nd ed. Washington, D.C.: Environmental Law Institute, 2007.

Bruch, Carl E., and Jay E. Austin, eds.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Bruch, Carl, and others. Post-conflict peace build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19, No. 1 (2008), pp. 58-96.

Bunker, Alice Louis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one Gulf, two wars.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13, No. 2 (2004), pp. 201-213.

Cañas Vargas, Eileen Alina. Nuclear-weapon-free zones: the treaty of Tlatelolco and the proposal for a denuclearized Middle East. PhD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 2014.

Carnahan, Burris M. Protecting nuclear facilities from military attack: prospects after the Gulf War.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6, No. 3 (1992), pp. 524-541.

_____. The law of land mine warfare: Protocol II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ertain Conventional Weapons. *Military Law Review*, vol. 105 (1984), pp. 73-95.

Caron, David D. Finding out what the oceans claim: the 1991 Gulf War,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In *Bringing New Law to Ocean Waters*, David D. Caron and Harry N. Scheiber, 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4.

Churchill, R. R., and A. V. Lowe. *The Law of the Se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Clément, Etienne. Le réexamen de la Convention de la Haye de 1954 pour la protection des biens culturels en cas de conflit armé. I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Arising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International Law*, Najeeb Al-Nauimi and Richard Meese, ed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Condorelli, Luigi. Nuclear weapons: a weighty matt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jura non novit curi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37, No. 316 (1997), pp. 9-20.

Cortina Mendoza, R., and V. Saco Chung. La protección del medio ambiente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Revista da Faculdade de Direito da UFMG*, vol. 51, 2007, pp. 255-277.

Crawford, Alex, and Johannah Bernstein. *MEAs, Conservation and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Virunga National Park, DRC*. Winnipe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8.

Crawford, Emily.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In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Rüdiger Wolfrum,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usato, Eliana.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armed conflict and ex-post remedies: an assessment of Iraq's 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the 1991 Gulf Wa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Studies* (forthcoming).

Dam-de Jong, Daniëla. The role of informal normative processes in improving governance over natural resources in conflict-torn States. *Hague Journal on the Rule of Law*, vol. 7, No. 2 (2015), pp. 219-241.

_____. *International Law and Governance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itu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_____. From engines for conflict into engin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otential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address predatory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situations of internal armed conflict.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p. 155-178.

_____. International law and resource plunder: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during armed conflict.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19, No. 1 (2008), pp. 27-57.

Das, Onit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ecurity and Armed Conflict: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3.

_____.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rmed conflict: filling the gaps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p. 103-128.

D'Aspremont, Jean.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law of brigandage: interpretative engineering for the regul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exploitation.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No. 1 (2013), pp. 1-24.

David, Eric. The opin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n the legality of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37, No. 316 (1997), pp. 21-34.

Debonnet, Guy, and Kes Hillman-Smith. Supporting protected areas in a time of political turmoil: the case of world heritage site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Parks*, vol. 14, No. 1 (2004), pp. 9-16.

Delbrück, Jost. Demilitarization. In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3, Rudolf Bernhardt and Peter Macalister-Smith, ed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82, pp. 150-152.

Desch, Thomas. Haftung für Umweltschäden im Krieg: einige Bemerkungen zu I. P. Blishchenko und V. Ph. Shavrov.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 40, No. 1 (1989), pp. 47-71.

Desgagné, Richard. The prevention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time of armed conflict: proportionality and precautionary measure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 3, 2000, pp. 109-129.

Deutsches Rotes Kreuz, and Institut für Friedenssicherungsrecht und Humanitäres Völkerrecht. Humanitäres Völkerrecht: *Informationsschriften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Peace and Armed Conflict*, vol. 26, No. 3 (2013), pp. 111-159.

Diederich, Michael D. "Law of war" and ecology: a proposal for a workable approach to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law of war. *Military Law Review*, vol. 136 (1992), pp. 137-160.

Dienelt, Anne. "After the war is before the war": the hybrid function of art. 36 AP I.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itions from Conflict to Peace: Clarifying Norm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Carsten Stahn, Jens Iverson, and Jennifer Easterday,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forthcoming).

_____. After the war is before the war: the environment, preventive IHL measures and their post-conflict impact.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2014.

Dinstein, Yoram.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Searching for a 'Principle of Humanity'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Kjetil Mujezinović Larsen, Camilla Guldahl Cooper and Gro Nystuen,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72-85.

_____. *War, Aggression and Self-Defence*, 5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_____.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In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vol. 5, J. A. Frowein, and R. Wolfrum, eds.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1, pp. 523-549.

_____. The laws of air, missile and nuclear warfare. *Israel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 vol. 27 (1997), pp. 1-16.

Domínguez-Matés, Rosario. New weaponry technologies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heir consequences on the human being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New Challenges of Humanitarian Law in Armed Conflict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uan Antonio Carrillo-Salcedo*, Pablo Antonio Fernández-Sánchez, ed.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5.

_____. Desafío para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responsabilidad penal internacional del individuo por daños al medio ambiente durante un conflicto armado.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20 (2004), pp. 43-63.

Dorsey, Jessica. Conference notes on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armed conflict: testing the adequ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T.M.C. Asser Instituut, 7 November 2011.

Dorsouma, Al-Hamandou, and Michel-André Bouchard. *Conflits armés et environnement. Développement durable et territoires*, vol. 8, 2006.

Doswald-Beck, Louise. *Human Rights in Times of Conflict and Terror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_____.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advisory opin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n the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37, No. 316 (1997), pp. 35-55.

_____, ed. *San Remo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Armed Conflicts at S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Douhan, Alena. 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VI, Rüdiger Wolfrum,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Droege, Cordula, and Marie-Louise Tougas.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armed conflict — existing rules and need for further legal protection.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p. 21-52.

DuBarry Huston, Meredith. Wartime environmental damages: financing the clean-up.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3, No. 4 (2002), pp. 899-929.

Ebbesson, Jonas. Principle 10: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 Commentary*, Jorge E. Viñuales,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Elias, Olufemi.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Malgosia Fitzmaurice, David M. Ong and Panos Merkouris, ed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

Eniang, Edem, Amleset Haile, and Teshale Yihdego. Impacts of landmine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biodiversity.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vol. 37, No. 6 (2007), pp. 501-504.

Falk, Richard.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 by military mea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15 (2004), pp. 725-731.

_____. The inadequacy of the existing legal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wartime.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_____. Environmental warfare and ecocide: facts, appraisal and Proposals. *Security Dialogue*, vol. 4, No. 1 (1973), pp. 80-96.

Fauchald, Ole Kristian, David Hunter and Wang Xi, e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008*, vol. 1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Feliciano, Florentino P. Marine pollution and spoli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s war measures: a note on some international law problems in the Gulf War. *Houst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4, No. 3 (1992), pp. 496-497.

Fenrick, William J. The law applicable to targeting and proportionality after Operation Allied Force: a view from the outsid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 3 (2000), pp. 53-80.

Fischhaber, Hans-Bjoern. Military concep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 for EU-led military operations: real commitments or another “paper tiger”? *Energy Security Highlights*, vol. 10, No. 19 (2012), pp. 22-24.

Fishman, Akiva, and others. Peace through justic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wartime environmental wrongs. In *Governanc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Carl Bruch, Carroll Muffett and Sandra S. Nichols, eds. Abingdon, Oxon: Earthscan, 2016.

Fitzmaurice, Malgosia, David M. Ong, and Panous Merkouris,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

Fleck, Dieter. Current legal and policy issues. In *Future Legal Restraints on Arms Proliferation: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Law*.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6.0.24.

_____.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armed conflict: legal obligations in the absence of specific rules.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p. 7-20.

Freeland, Steven. *Addressing the Intentional De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uring Warfare under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ambridge: Intersentia, 2015.

French, Dunc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Malgosia Fitzmaurice, David M. Ong and Panos Merkouris, ed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

Frigo, Manilio. Cultural property v. cultural heritage: a “battle of concept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86, No. 854 (2004), pp. 367-378.

Fujita, Hisakazu. The advisory opin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n the legality of nuclear weap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37, No. 316 (1997), pp. 56-64.

Gardam, Judith G. Energy and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Journal of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Law*, vol. 15, No. 2 (1997), pp. 87-96.

Gasser, Hans-Peter. For better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armed conflict: a proposal for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9, No. 3 (1995), pp. 637-640.

Gehring, R  .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n p  riode de conflit arm  : que peut ou pourrait apporter la Cour p  nale internationale. Universit   de Lausanne, 2001.

Gill, Terry. The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jus ad bellum and the jus in bello.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2, No. 3 (1999), pp. 613-624.

Gilman, Ryan. Expand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after war: the need for universal jurisdiction over environmental war crimes. *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vol. 22, No. 3 (2011), pp. 447-471.

Goldblat, Jozef.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gainst the effects of military activities: legal implications. *Humanitäres Völkerrecht: Informationsschriften*, vol. 3, (1992), pp. 133-136.

_____.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gainst the effects of military activities. *Bulletin of Peace Proposals*, vol. 22, No. 4 (1991), pp. 399-406.

_____. The mitigation of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 by war: legal approaches. In *Environment Hazards of War: Releasing Dangerous Forces in an Industrialized World*, Arthur H. Westing, ed. London: Sage, 1990.

Gordon, Kathryn, and Joachim Pohl. Environmental Concern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 Survey, OECD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2011/01.

Green, Leslie.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law of conventional warfare. In *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9, C. B. Bourne, ed.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1, pp. 222-226.

Greenwood, Christopher. Jus ad bellum and jus in bello in the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Nuclear Weapons*, Laurence Boisson de Chazournes and Philippe Sands,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47-266.

_____. 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civil 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s caused by military ope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vol. 69,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Richard J. Grunawalt, John E. King and Ronald S. McClain, eds. Newport: Naval War College, 1996.

_____. The twilight of the law of belligerent reprisals. *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0 (1989), pp. 40-43.

Gillespie, Alexander. *Conservation, Biod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1.

Guarnacci, Emilia Schiavo. *Conflictos armados y medio ambiente*. Buenos Aires, Universidad de Salvador, 2006.

Guillard, David. *Les armes de guerre et l'environnement naturel: essai d'étude juridique*. Paris: Harmattan, 2006.

Hagmann, Tobias. Confronting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ly induced conflict. *Peace,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vol. 6 (2005), pp. 1-22.

Halle, Silja, ed. *Greening the Blue Helmets: Environment, Natural Resources and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Nairob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May 2012.

_____. *From Conflict to Peacebuilding: The Rol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Nairob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February 2009.

Hampson, Françoise. Other areas of customary law in relation to the Study. In *Perspectives on the ICRC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Elizabeth Wilmshurst and Susan Breau,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50-74.

Hannikainen, Lauri. The continued validity of the demilitarised and neutralized status of the Åland Islands.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 54, 1994, pp. 614-616.

Harwell, Emily E. Building momentum and constituencies for peace: the role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peacebuilding. In *Governanc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Carl Bruch, Carroll Muffet and Sandra S. Nichols, eds. Routledge, 2013.

Harvard University, Program on Humanitarian Policy and Conflict Research. *HPCR Manual on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Air and Missile Warf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Hawley, T. M. *Against the Fires of Hell: The Environmental Disaster of the Gulf Wa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Heintschel von Heinegg, Wolff, and Michael Donner.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naval armed conflicts. In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7, Jost Delbrück, Rainer Hofmann and Andreas Zimmermann, eds. Berlin: Duncker and Humblot, 1994, pp. 281-302.

Henckaerts, Jean-Marie.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for the rule of law in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87, No. 857 (2005), pp. 175-212.

_____. International legal mechanisms for determining 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Henckaerts, Jean-Marie, and Louise Doswald-Beck, ed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s. I and II.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Herczegh, Géza.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naturel et le droit humanitaire. In *Etudes et essais s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humanitaire et sur les principes de la Croix-Rouge en l'honneur de Jean Pictet*.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4.

Hough, Peter. Defending nature: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restriction of military ecocide. *The Global Community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risprudence*, vol. 1 (2014), pp. 137-152.

Huang, Ling-Yee. The 2006 Israeli-Lebanese conflict: a case study for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Florid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0, No. 1 (2008), pp. 103-113.

Hourcle, Laurent R. Environmental law of war. *Vermont Law Review*, vol. 25, No. 3 (2001), pp. 653-681.

Hulme, Karen. Taking car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gainst damage: a meaningless oblig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2, No. 879 (2010), pp. 675-691.

_____. Natural environment. In *Perspectives on the ICRC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Elizabeth Wilmschurst and Susan Breau,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04-237.

_____. *War Torn Environment: Interpreting the Legal Threshold*.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4.

Ichim, Octavian. *Just Satisfaction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Institut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Report from the Expert Meeting on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14-15 September 2015. Helsinki: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Institute, 2015.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Institute.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armed conflict: an empirical study. Report 12/2014, Oslo: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Institute, 2014.

Jacobsson, Mari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air and missile warfare: some reflections. *Israel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 vol. 45 (2015), pp. 51-66.

Jensen, David.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UNEP's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In *Assessing and Restoring Natural Resources in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David Jensen and Steve Lonergan, eds. Abingdon, Oxon: Earthscan, 2013.

Jensen, David, Alec Crawford and Carl Bruch. Water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Environmental Peacebuilding*, Policy Brief, No. 4, 2014.

Jensen, David, and Silja Halle, eds.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An Inventory and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Nairob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November 2009.

Jensen, David, and Steve Lonergan, eds. *Assessing and Restoring Natural Resources in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New York: Earthscan, 2012.

Jensen, Eric Talbot.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environmental warfare: active and passive damage during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 38, No. 1 (2005), pp. 145-186.

Jensen, Eric Talbot, and James J. Teixeira, Jr. Prosecuting members of the U.S. military for wartime environmental crimes.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17, No. 4 (2005), pp. 651-671.

Jha, U.C. *Armed Conflict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2014.

Johnson, Giff. *Nuclear Past, Unclear Future*. Majuro: Micronitor News and Printing Company, 2009.

Jorgensen, Nikolai. The protection of freshwater in armed confli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2 (2007), pp. 57-96.

Joyner, Christopher C., and James T. Kirkhope. The Persian Gulf war oil spill: reassessing the law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4, No. 1 (1992), pp. 29-62.

Juste Ruiz, José. Derecho de los conflictos armados y protección del medio ambiente. In *Estudios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en homenaje al profesor Ernesto J. Rey Caro*, vol. 2, Zlata Drnas de Clément, ed. Córdoba: Marcos Lerner, 2002.

_____. Derecho de los conflictos armados y protección del medio ambiente. In *Cursos de derechos humanos de Donostia-San Sebastián*, vol. 3, Juan Soroeta Liceras, ed. San Sebastián: Universidad del País Vasco, 2002.

Kabai, Michael. An international call for moratorium on the use of depleted uranium in military weap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Peace and Armed Conflict*, vol. 26, No. 3 (2013), pp. 137-141.

Kalshoven, Frits. *Reflections on the Law of War: Collected Essays*.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Serie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7.

_____. *Belligerent Reprisals*, 2nd e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Serie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5.

_____. Belligerent reprisals revisited. *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 (1990), pp. 43-80.

Karuru, Njeri, and Louise H. Yeung. Integrating gender into post-conflict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In *Governanc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Carl Bruch, Carroll Muffet and Sandra S. Nichols, eds. Routledge, 2013.

Kearns, Brendan. When bonobos meet guerillas: preserving biodiversity on the battlefield.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24, No. 2 (2012), pp. 123-168.

Kellman, Barry. 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a verification and enforcement model for determining legal responsibilities for environmental harm caused by war.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Kirchner, 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ime of armed conflict. *Europea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9, No. 10 (2000), pp. 266-272.

Kiss, Alexandre.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vol. 31, Nos. 4-5 (2001), pp. 223-231.

Knox, John H. Assessing the candidates for a global treaty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vol. 12, No. 1 (2003), pp. 153-168.

Kohen, Marcelo G. The notion of 'State survival'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Nuclear Weapons*, Laurence Boisson de Chazournes and Philippe Sands,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Koppe, Erik V. The principle of ambiguity and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excessive collateral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p. 53-82.

_____.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uring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8.

Koroma, Abdul G. Law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ecurity, Jonas Ebbesson, and others, eds. Leiden, Boston: Brill Nijhoff, 2014, pp. 189-201.

Kreß, Clau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hristian J. Tams and James Sloan,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Landel, Morgane. Are aerial fumig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war in Colombia a violation of the rule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ransnational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 19, No. 2 (2010), pp. 419-513.

Lanier-Graham, Susan D. *The Ecology of War: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Weaponry and Warfare*. New York: Walker, 1993.

Lavaux, Stephanie. Degradación ambiental y conflictos armados: las conexiones. Documento de investigación, No. 7. Bogotá Centro Editorial, Universidad del Rosario, 2004.

Lavieille, Jean-Marc. Les activités militaires,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Revue juridique de l'environnement*, vol. 4 (1992), pp. 421-452.

Lijnzaad, Liesbeth, and Gerard J. Tanja.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the Iraq-Kuwait War.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40, No. 2 (1993), pp. 169-199.

Lord, Janet E. Legal restraints in the use of landmines: humanitarian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25, No. 2 (1995), pp. 311-355.

Low, Luan, and David Hodgkinson. Compensation for wartime environmental damage: challenges to international law after the Gulf War.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5, No. 2 (1995), pp. 405-483.

Lubell, Noam. Challenges in applying human rights law to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87, No. 860 (2005), pp. 737-754.

Lujala, Päävi, and Siri Aas Rustad, ed. *High-valu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New York: Earthscan, 2012.

Lundberg, Michael A. The plunder of natural resources during war: a war crime (?)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9, No. 3 (2008), pp. 495-525.

Lung, Wan Pun. Pre-conflict military activities: environmental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tate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4, No. 3 (2015), pp. 465-496.

Mahfoudh, Haykel Ben. *L'environnement, l'humanitair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Manouba, Tunisia: Centre de publication universitaire, 2010.

Mahmoudi, Said. Foreig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Swedish economic zo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11, No. 3 (1996), pp. 365-386.

Mainetti, Vittorio. L'intérêt culturel internationalement protégé: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culture. PhD thesis No. 881,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11, pp. 71-136.

Makhijani, Arjun, Howard Hu, and Katherine Yih, eds. *Nuclear Wastelands: A Global Guide to Nuclear Weapons Production and its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 By a Special Com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and the Institute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95.

Malviya, R. A. Laws of armed conflic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 analysis of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ISIL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nd Refugee Law*, vol. I. New Delhi: Indi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1.

Marauhn, Thilo, Georg Nolte, and Andreas Paulus.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Human Rights Law Journal*, vol. 29 (2008), pp. 216-226.

Marauhn, Thilo, and Zacharie F. Ntoubandi. Armed conflict, non-international. In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Rüdiger Wolfrum,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Marsh, Jeremy. *Lex lata* or *lex ferenda*? Rule 45 of the ICRC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Military Law Review*, vol. 198 (2008), pp. 116-164.

Martin, Michael F. U.S. Agent Orange/dioxin assistance to Vietnam.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3 November 2015.

McCarthy, Conor. *Reparations and Victim Support i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McCormack, Timothy L. H.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on the ICRC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study. In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vol. 82, *The Law of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Weaponry and the Use of Force*, Anthony M. Helm, ed. Newport, Rhode Island: Naval War College, 2006, pp. 81-97.

McNeill, John H.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military practice. In *Hagu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 1993, A.-C. Kiss and Johan G. Lammers, ed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94.

Melvin, Neil, and Ruben De Koning. Resources and armed conflict. In *SIPRI Yearbook 2011: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Mensah, Thomas A. United Nations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UNCC). In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X, Rüdiger Wolfrum,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_____. Environmental damages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Mésa, R.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t armes de combat: étud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enal. *Revue trimestrielle des droits de l'homme*, vol. 85 (2011), pp. 43-57.

Miggiani, Mark Anthony. War Remnants: A Case Study in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Genève: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1988 (not printed, available at HEIDI, Geneva).

Miles, Cameron. Content and enforcement. In *Provisional Measures before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Mitchell, Ronald B.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a survey of their features, formation, and effects.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vol. 28 (2003), pp. 429-461.

Mohr, Manfred and Alexander Stöcker. Summary report of workshop: Exploring a Legal Framework for Toxic Remnants of War,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22 June 2012.

Mollard-Bannelier, Karine.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n temps de conflit armé*. Paris: Pedone, 2001.

Momtaz, Djamchid. Les règles relatives à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au cours des conflits armés à l'épreuve du conflit entre l'Irak et le Koweït.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37 (1991), pp. 203-219.

Moneta, Carlos J. *La Antartida en el sistema internacional del futuro*. Buenos Aires: Grupo Editor Latinoamericano, 1988.

Moussa, Jasmine. Can jus ad bellum override jus in bello? Reaffirming the separation of the two bodies of law.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0, No. 872 (2008), pp. 963-990.

Müllerson, Rei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s ad bellum and jus in bello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Advisory Opin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Nuclear Weapons*, Laurence Boisson de Chazournes and Philippe Sands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67-274.

Murphy, Sean D., Won Kidane, and Thomas R. Snider. *Litigating War: Arbitration of Civil Injury by the Eritrea-Ethiopia Claims Commi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Nafziger, James A. R. UNESCO-centered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over cultural property. *Hastings Law Journal*, vol. 27, No. 5 (1976), pp. 1051-1067.

Nevitt, Mark P. The commander in chief's authority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In *Cardozo Law Review*, vol. 37, No. 437 (2015), pp. 437-502.

Nystuen, Gro, Stuart Casey-Maslen, and Annie Golden Bersagel, eds. *Nuclear Weap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Okorodudu-Fubara, Margaret. Oil in the Persian Gulf War: legal appraisal of an environmental warfare. *St. Mary's Law Journal*, vol. 123 (1992), pp. 204-206.

Okowa, Phoebe. Sovereignty contests and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conflict zones. *Current Legal Problems*, vol. 66, No. 1 (2013), pp. 33-73.

_____.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In *Environmental Law and Justice in Context*, Jonas Ebbesson and Phoebe Okowa,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_____.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situations of armed conflict. In *Criminal Jurisdiction 100 Years after the 1907 Hague Peace Conference: 2007 Hague Joint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W.J.M. van Genugten, M. P. Scharf and S. E. Radin, eds. The Hague: T.M.C. Asser, 2007.

Oviedo, Gonzalo, Luisa Maffi, and Peter Bille Larsen. *Indigenous and Traditional Peoples of the World and Ecoregion Conserva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nserving the World's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Gland: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2000.

Özerdem, Alpaslan and Rebecca Roberts. *Challenging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Burlington: Ashgate, 2012.

Oxman, Bernard H. Comment: developing the environmental law of armed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vol. 69,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Richard J. Grunawalt, John E. King and Ronald S. McClain, eds. Newport, Rhode Island: Naval War College, 1996.

Pantazopoulos, Stavros-Evdokimos. Towards a coherent framework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24, No. 1 (2013), pp. 131-165.

Parsons, Rymn James. The fight to save the planet: U.S. Armed Forces, "greenkeeping," and enforcement of the law pertaining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uring armed conflict.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10, No. 2 (1998), pp. 441-500.

Pavoni, Riccardo. Environmental righ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vestor-State case law: a critical appraisal. In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Arbitration*, Pierre-Marie Dupuy, Ernst-Ulrich Petersmann and Francesco Francioni,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ayne, Cymie R. Defining the environment.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itions from Conflict to Peace: Clarifying Norm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Carsten Stahn, Jens Iverson, and Jennifer Easterday,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forthcoming).

_____.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of environmental repar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ransitions from Conflict to Peace: Clarifying Norm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Carsten Stahn, Jens Iverson, and Jennifer Easterday,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forthcoming).

Payne, Cymie R., and Peter H. Sand, eds. *Gulf War Reparations and the UN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ejic, Jelena. Status of armed conflict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ICRC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Elizabeth Wilmshurst and Susan Breau,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77-100.

Perna, Laura. *The Formation of the Treaty Law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6.

Pertile, Marco. *La relazione tra risorse naturali e conflitti armati nel diritto internazionale*. Milan: CEDAM, 2012.

Peterson, Ine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a concern for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law?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2, No. 2 (2009), pp. 325-343.

Pimiento Chamorro, Susana, and Edward Hammond.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in Post-Cold War Conflict: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Military or Any Other Hostile Use of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Techniques (ENMOD) and Related Agreements*. Edmonds, Washington: Edmonds Institute, 2001.

Plant, Glen, 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Law of War: A "Fifth Geneva"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 of Armed Conflict*.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2.

_____. Legal aspects of marine pollution during the Gulf War.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stu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7, No. 3 (1992), pp. 217-231.

Plant, Roger. *Land Rights and Minorities*.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Report 94/2.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1994.

Popović, Neil A. F. Humanitarian law,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rights. *Georgetow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8, No. 1 (1995), pp. 67-89.

Prawitz, Jan. The concept of NWFZ with a comment on East Asia. In *Proceedings of the Forty-fifth Pugwash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 Hiroshima, Japan, 23-29 July 1995: Towards a Nuclear-Weapon Free World*, Joseph Rotblat and Michiji Konuma, ed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1997, p. 24.

Prescott, Jody M. NATO gender mainstreaming and 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The Georgetown Journal of Gender and the Law*, vol. XIV, No. 1 (2013), pp. 83-133.

Prescott, Michael. How war affects treaties between belliger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Gulf War.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7, No. 1 (1993), pp. 197-201.

Quénivet, Noële and Shilan Shah-Davis, eds. *International Law and Armed Conflict: Challe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Hague: T.M.C. Asser, 2010.

Quinn, John P., Richard T. Evans, and Michael J. Boock, United States Navy development of operational-environmental doctrine.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Rayfuse, Rosemary.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relation to armed conflict. In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Approaches to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Relation to Armed Conflict*, Rosemary Rayfuse, ed. Leiden: Brill, 2014.

Reuveny, Rafael, Andreea S. Mihalache-O'Keef, and Quan Li. The effect of warfare on th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7, No. 6 (2010), pp. 749-761.

Rich, Andy. The environment: adequacy of protection in times of war. *Penn State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12, No. 3 (2004), pp. 445-558.

Rieu-Clarke, Alistair, Ruby Moynihan and Bjørn-Oliver Magsig. *United Nations Watercourses Convention User's Guide*. International Hydrological Programme-Hydrology for the Environment, Life and Policy Centre for Water Law, Policy and Science, 2012.

Roach, Ashley J. Certain Conventional Weapons Convention: arms control or humanitarian law? *Military Law Review*, vol. 105 (1984), pp. 3-72.

Robb, Cairo A. R., e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Reports*, vol. 3,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Roberts, Adam. The law of war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Robinson, Nicholas.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e in the Gulf War.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vol. 21 (1991), pp. 216-220.

Roch, Philippe, and Franz Xaver Perrez.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strive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coheren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 *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vol. 16, No. 1 (2005), pp. 1-25.

Rogers, A.P.V. *Law on the Battlefiel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Romson, Åsa. *Environmental Policy Spac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PhD thesis, Stockholm University, 2012.

Roscini, Marco. The cases against the nuclear weapons States.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sights*, vol. 19, No. 10 (2015).

_____. Prote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ime of armed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 Anthology*, Jahid Hossain Bhuiyan, Louise Doswald-Beck and Azizur Rahman Chowdhury, eds. Nagpur: 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09.

Roselli, Carina.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raq's southern marshes. Doctor juris thesis, Vermont Law School, 2014. The thesis is on file with the Special Rapporteur.

_____. Bordering on desuetude: are Additional Protocol I's environmental provisions no longer serviceable? 17 January 2013. The article is on file with the Special Rapporteur.

_____. Restoring Iraq's southern marshes: uncertainty in post-conflict Mesopotamia. Dissertation, Vermont Law School, 20 December 2012.

Ross, Marc A. Environmental warfare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 possible remedies to combat intentional destru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ickins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No. 3 (1992), pp. 515-534.

Saalfeld, Michael. Umweltschutz in bewaffneten Konflikten aus völkerrechtsgeschichtlicher Sicht. *Humanitäres Völkerrecht: Informationsschriften*, vol. 5, No. 1 (1992), pp. 23-32.

Sadeleer, Nicolas de. *EU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Internal Marke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Sancin, Vasilka. Peace operation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ontemporary Concerns and Challenges*, Vasilka Sancin, ed. Ljubljana: GV Založba, 2012.

_____, e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ontemporary Concerns and Challenges: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First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onference, Ljubljana, June 28-29 2012*. Ljubljana: GV Založba, 2012.

Sand, Peter H. Environmental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Japanes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4 (2011), pp. 151-189.

_____. Compensation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from the 1991 Gulf War.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vol. 35, No. 6 (2005), pp. 244-249.

Sandoz, Yves, Christophe Swinarski, and Bruno Zimmermann. *Commentary on the Additional Protocols of 8 June 1977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of 12 August of 1949*.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and Martinus Nijhoff, 1987.

Sands, Philippe. Lia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the report of the UNEP Working Group of Experts: an introductory note. In *Li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Alexandre Timoshenko, ed. Nairobi: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1998.

_____. The Gulf war: environment as a weap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8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5, G. C. Denny and S. F. Bassuener, ed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1.

Sands, Philippe, and Jacqueline Peel.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3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Sari, Aurel. Status of forces and status of mission agreements under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the EU's evolving practi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9, No. 1 (2008), pp. 67-100.

Schafer, Bernard 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laws of armed conflic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need to re-evaluate what types of conduct are permissible during hostilities.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19, No. 2 (1988-1989), pp. 287-325.

Schiefer, H. Bruno, ed. *Verifying Obligations Respecting Arms Control and the Environment: A Post-Gulf War Assessment — Final Report, Workshop on Verifying Obligations Respecting Arms Control and the Environment: Post-Gulf War Assessment*. Saskatoon: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1992.

Schmitt, Michael N. ed. *Tallinn Manual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Warf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_____. Humanitarian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vol. 28, No. 3 (2000), pp. 265-323.

_____. War and the environment: fault lines in the prescriptive landscape.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_____. Green war: an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law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2, No. 1 (1997), pp. 1-109.

Schmitt, Michael N., Charles H. B. Garraway, and Yoram Dinstein. *The Manual on the Law of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With Commentary*. San Rem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Humanitarian Law, 2006.

Schwartz, Priscilla. The polluter-pays principle. In *Research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Malgosia Fitzmaurice, David M. Ong and Panos Merkouris, ed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

Scobbie, Iain. The approach to customary law in the Study. In *Perspectives on the ICRC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Elizabeth Wilmshurst and Susan Breau,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5-29.

Shambaugh, James, Judy Oglethorpe, and Rebecca Ham. *The Trampled Grass: Mitigating the Impacts of Armed Conflict on the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Biodiversity Support Program, 2001.

Sharp, Walter. The effective deterrence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during armed conflict: a case analysis of the Persian Gulf War. *Military Law Review*, vol. 137 (1992), pp. 1-67.

Shelton, Dinah L., and Alexandre Charles Kiss. Strict li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In *Law of the Sea, Environmental Law and Settlement of Disputes: Liber Amicorum Judge Thomas A. Mensah*, Tafsir Malick Ndiaye and Rüdiger Wolfrum, 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7, pp. 1131-1152.

_____.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3rd ed.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2004.

Shelton, Dinah L. and Isabelle Cutting. If you break it, do you own i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egal Studies*, vol. 6 (2015), pp. 1-46.

Shraga, Daphna. The Secretary-General's bulletin on the observance by United Nations force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 decade later. *Israel Yearbook on Human Rights*, vol. 39 (2009), pp. 357-368.

Singh, A. P.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during armed conflict: is a new frame of laws necessary? *Journal of the Indian Law Institute*, vol. 52, Nos. 3-4 (2010), pp. 453-466.

Sjöstedt, Britta. The role of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in armed conflict: "green-keeping" in Virunga Park — applying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in the armed conflict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p. 129-153.

Smith, Tara. Creating a framework for the prosecution of environmental crimes in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In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Critical Perspectives*, William A. Schabas, Yvonne McDermott and Niamh Hayes, eds.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13.

Somer, Jonathan. Jungle justice: passing sentence on the equality of belligerents in non-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89, No. 867 (2007), pp. 655-690.

Soons, Alfred H. A.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Law of the Sea*. Utrecht: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1982.

Spieker, Heike. Medical transportation. In *Max Planck Encyclopa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vol. VII, Rüdiger Wolfrum,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_____. The conduct of hostiliti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Frieden in Freiheit — Peace in Liberty — Paix en liberté: Festschrift für Michael Bothe zum 70. Geburtstag*, Andreas Fischer-Lescano and others, eds. Zürich: Dike Verlag, 2008.

_____. *Völkergewohnheitsrechtlicher Schutz der natürlichen Umwelt im internationalen bewaffneten Konflikt*. Bochum: UVB-Universitätsverlag Dr. N. Brockmeyer, 1992.

Stahn, Carsten, and Jann K. Kleffner, eds. *Jus Post Bellum: Towards a Law of Transition from Conflict to Peace*. The Hague: T.M.C. Asser, 2008.

Stahn, Carsten, Jennifer S. Easterday and Jens Iverson, eds. *Jus post bellum: Mapping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Subedi, Surya P. *Land and Maritime Zones of Peace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Tams, Christian J. The contentious jurisdiction of the Permanent Court. In *Legacies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Christian J. Tams and Malgosia Fitzmaurice, 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3.

Tarasofsky, Richard G. Protecting especially important areas during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a critique of the IUCN draft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hostile military activities in internationally protected areas.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_____.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uring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4 (1993), pp. 17-79.

Thieffry, Patrick. *Droit de l'environnement de l'Union européenne*. 2nd. ed. Brussels: Bruylant, 2011.

Thomas, Carson. Advancing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relation to armed conflict: Protocol I's threshold of impermissible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alternatives.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1 (2013), pp. 83-103.

Ticehurst, Rupert. The Martens Clause and the laws of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37, No. 317 (1997), pp. 125-134.

Tignino, Mara. Principle 23: the environment of oppressed peoples. In *The 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 Commentary*, Jorge E. Viñuales,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_____. The right to water and sanitation in post-conflict legal mechanisms: an emerging regime? In *Water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Erika Weinthal, Jessica J. Troell and Mikiyasu Nakayama, eds. New York: Earthscan, 2014.

_____. *L'eau et la guerre: éléments pour un régime juridique*. Brussels: Bruylant, 2011.

_____. The right to water and sanitation in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Water International*, vol. 36, No. 2 (2011), pp. 241-248.

_____. Wate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2, No. 879 (2010), pp. 647-674.

_____. Water security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s. In *Fac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Environmental, Human, Energy, Food, Health and Water Security Concepts*, Hans Günter Brauch, and others, eds. Berlin: Springer, 2009.

_____. Reflections on the legal regime of water during armed confli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Pan-Europ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 The Hague, 9-11 September 2004.

_____. Water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In *Re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Water Disputes*, Papers Emanating from the Sixth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Law Seminar (8 November 2002),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ed.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3.

Tir, Jaroslav, and Douglas M. Stinnett. Weathering climate change: can institutions mitigate international water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49, No. 1 (2012), pp. 211-225.

Tolentino, Amado S., Jr.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 vis-à-vis the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Law: New Actors, New Concepts — Continuing Dilemmas: Liber Amicorum Boidar Bakoti?*, Budislav Vukas and Trpimir M. Šošić, 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10.

_____. Armed conflict and the environment: legal perspectives. *Philippine Law Journal*, vol. 81, No. 3 (2007), pp. 377-389.

Toman, Jiří. *Cultural Property in War: Improvement in Protection — Commentary on the 1999 Second Protocol to the Hague Convention of 1954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Publishing, 2009.

_____.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Commentary on th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 and its Protocol, Signed on 14th May 1954 in The Hague, and on Other Instru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concerning such Protection*. Brookfield: Dartmouth Publishing, 1996.

Trouwborst, Arie. *Evolution and Status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Series, vol. 62.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Tucker, Matthew L. Mitigating collateral damage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naval warfare: an examination of the Israeli naval blockade of 2006. *Naval Law Review*, vol. 57 (2009), pp. 161-201.

Türk, Helmut. The negotiation of a new Geneva-style convention: a government lawyer's perspectiv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Law of War: A "Fifth Geneva"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 of Armed Conflict*, Glen Plant, ed.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2.

Unruh, Jon, and Rhodri C. Williams, eds. *Land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New York: Earthscan, 2013.

Van der Vyver, Johan D. The environment: State sovereignty, human rights, and armed conflict.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23, No. 1 (2009), pp. 85-112.

Venturini, Gabriella. Disasters and armed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sponse Law*, Andrea de Guttry, Marco Gestri and Gabriella Venturini, eds. The Hague: T.M.C. Asser, 2012.

_____.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sponse law in relation to other branch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sponse Law*, Andrea de Guttry, Marco Gestri and Gabriella Venturini, eds. The Hague: T.M.C. Asser, 2012.

Verwey, Wil. Observation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In *Hagu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 1994, A.-C. Kiss and J. G. Lammers, ed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95, pp. 35-52.

_____.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in search of a new legal perspective.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 No. 1 (1995), pp. 7-40.

Vialle, Anne-Cécile, and others. Peace through justic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wartime environmental wrongs. In *Governance, Natural Resources,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Carl Bruch, Carroll Muffet and Sandra S. Nichols, eds. Routledge, 2013.

Viikari, L. V. *Studies in Space Law*, vol. 3, *The Environmental Element in Space Law: Assessing the Present and Charting the Future*.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8.

Viñuales, Jorge E. Cartographies imaginaires: observations sur la portée juridique du concept de “regime special” en droit international.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140, No. 2 (2013), pp. 405-425.

Voigt, Christ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ving Conflicts between Climate Measures and WTO Law*.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9.

Vöneky, Silja. *Die Fortgeltung des Umweltvölkerrechts in internationalen bewaffneten Konflikten*. Beiträge zum ausländischen öffentlichen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 145, Max-Planck-Institu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Berlin: Springer, 2001.

_____. A new shield for the environment: peacetime treaties as legal restraints of wartime damage.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 9, No. 1 (2000), pp. 20-32.

_____. Peacetime environmental law as a basis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caused by war.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Waleij, Annica and Birgitta Liljedahl. *The Gap Between Buzz Words and Excellent Performance: The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Actors in Crises and Conflict Settings*. Swedish Defence Research Agency, Stockholm, 2016.

Walker, George K. ed. *Definitions for the Law of the Sea: Terms not Defined by the 1982 Convention*.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1.

Warner, Frederick.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Gulf War. *Environment*, vol. 33, No. 5 (1991), pp. 6-26.

Weinthal, Erika, Jessica Troell and Mikiyasu Nakayama, eds. *Water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New York: Earthscan, 2014.

Weir, Doug. Environmental mechanics: re-imagining post-conflict environmental assistance, report from the Toxic Remnants of War Project, 2015.

Weiss, Edith Brown. *International Law for a Water-Scarce World*.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3.

Westing, Arthur H. *From Environmental to Comprehensive Security*, SpringerBriefs on Pioneers in Science and Practice Texts and Protocols, vol. 13, Hans Günter Brauch, ed. New York: Springer, 2013.

_____. *Pioneer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ar*, SpringerBriefs on Pioneers in Science and Practice, vol. 1, Hans Günter Brauch, ed. New York: Springer, 2013.

_____. In furtherance of environmental guidelines for armed forces during peace and war.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_____. Constraints on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 during the Gulf War. In *War and its Consequences: Lessons from the Persian Gulf Conflict*, John O'Loughlin, Tom Mayer and Edward S. Greenberg, ed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4.

_____. Protected natural areas and the military.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vol. 19, No. 4 (1992), pp. 343-348.

_____. *Environmental Hazards of War. Releasing Dangerous Forces in an Industrialized Worl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_____. Herbicides in warfare: the case of Indochina. In *Ecotoxology and Climate*, Philippe Bordeau, and others, ed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89.

_____. *Global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Strategic Policy and 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_____. *Explosive Remnants of War: Mitigating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85.

_____. *Environmental Warfare. A Technical, Legal and Policy Appraisal*.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84.

_____. *Warfare in a Fragile World: Military Impact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80.

_____.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76.

Wilmshurst, Elizabeth, 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nflic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Wilmshurst, Elizabeth, and Susan Breau,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ICRC Study on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Whittemore, Luke. Intervention and post-conflict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Liberia. *Minnesot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 No. 2 (2008), pp. 387-433.

Wyatt, Julian. Law-mak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humanitarian and criminal law: the issue of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in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2, No. 879 (2010), pp. 593-646.

Zemmali, Ameer. The right to water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In *Making the Voice of Humanity Heard*, Liesbeth Lijnzaad, and others, ed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2004.

_____. La protection de l'environnement en période de conflit armé dans les normes humanitaires et l'action du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 I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 Arising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of International Law*, Najeeb Al-Nauimi and Richard Meese, ed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95.

_____. The protection of water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No. 308 (1995), pp. 550-564.
